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中國共產黨之來源

沈雲龍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沈雲龍著

中國共產黨之來源

胡適題

沈雲龍著

中國共產黨之來源

中國共產黨之來源序

——論研究中共歷史之必要及其基本原則

(一)

我們中國人是一歷史最悠久的民族，同時也是一最重視歷史，並在史學上最有成就的民族。我們有兩個史學傳統。一是國家的。中國自有記載之日起，自有政府組織之日起，即有太史、左史、右史之職。至今存有「堯典」爲最古之公家史記。二是私人的。這傳統開自孔子。孔子述而不作，古代文獻唯一經過他之修正的，是「春秋」。自此而後，由于前一傳統，歷代皇朝在開國之初，總以修前代之史爲文化上第一大事。由于後一傳統，無論在盛世或亂時，總有無數的文人學者，將治亂興亡的事實和道理寫下來，以爲後世資治資鑒之用。而我們能有這樣一個悠久的歷史，也就是這些著作，發生了很大教化作用。中國歷代亡國之奇異慘痛，無有過于明末者。所以明末清初的人，關於當時亡國的經過，當時朝政之昏亂，黨爭之發展，太監之慘毒，流寇之蜂起，滿清之入關，以及鄭氏之舉義等等，留下極豐富極沉痛的史料。如「先撥志始」、「綏寇紀略」、「崇禎長編」、「明季北略」、「南略」、「揚州十日記」、「賜姓始末」等，加上當時私人文集有關記載，即被清人焚滅之餘，傳至今日者，總不下二百種之多。而顧黃王諸大師，也莫不以一腔忠憤，畢生精誠，對此一代興亡，作苦心研究。他們爲了什麼？「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顧亭林書序黃黎洲「明夷待訪錄」語。）用今日語言，便是教育下一代的人，記取血的教訓，毋蹈失敗覆轍，善自保國安民而已。無論如何，這些著作，對民國之創造，有莫大啓發之功。

，是大家都知道的。

值得驚奇者，是我們民國之人，在歷代中國人中，似乎是表現得最爲麻木，最爲懶惰。何以言之？中華民族所經之慘禍浩劫，還有過于今日共黨之亂的嗎？即使今日到了臺灣，也不過如當年南明諸朝之流徙；然而也因為到了臺灣，畢竟又能喘息一定。今天有多少人對這一慘禍浩劫之來源，發展，意義，教訓，來作記載，作研究的呢？昔人譴責「南渡君臣輕社稷」，只是說他們不能渡河反攻而已。今日縱渡海反攻，在事勢上尚有所不能，然對此慘禍浩劫竟「不屑」記載、研究，不遑足證明我們根本無反攻復國之志嗎？世間有不研究失敗而可望成功的嗎？今日我們知道中共在進行所謂「人民公社」了。我們也知道這是化神州爲地獄極人間之奇慘。然如我們不去認真的追尋此一大奇慘之由來，只罵幾句「匪幫」便爲了事，而不覺有責任之感，而甚至不免一種隔岸觀火之意；那麼，後世千秋，豈僅說我們是陳叔寶之流而已。再者，今日反共國家不只我們。我們可以反共最早且最堅決自豪。我們的確常以反共三十餘年之歷史經驗自豪。然吾人反共經過，頗有得失，而最後成績，乃一失敗；此無可否認之事。如我們對於自己反共失敗之故，無所檢討；對於自己的過失，無所承認；而徒然標榜反共資格與決心，小則爲人所笑，即以敗軍言勇；大則沮各國反共之氣，即以吾人反共如是之力，尙且失敗，何況其他？這將有何等之損失！

我們雖不研究，別人可在研究了。首先，中國共產黨除了盛誇他們的「武功」以外，並以研究現代史爲名，一批一批的書出來。這些書的目的無他，證明他們賣國殘民政權是中國「正統」之繼承人而已，證明共產主義「不可抵抗」而已。

另外，其他各國學界實在不明白一事，即爲什麼一個有高度文化的中國，竟爲共產黨所征服，所統治。他們認爲這是二十世紀之奇事，不，簡直是人類史之奇事。今日各國，特別是美國，如果還有漢學，那不是西域史和南海史——這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間西洋漢學之主題；而是中國現代史。而中國現代史之

大謎，就是爲什麼中國以五千年古國，五強地位，五百萬國軍實力，竟讓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他們現在還沒有結論，所以他們還沒有一個堅定的政策。如果他們有一結論，而如果這一結論是傾向于承認中共政權在中國歷史上之合理性或無可避免性；那麼，一個可怕的事便可能實現，那便是對中共政權之承認！他們怎樣研究呢？這自然是一方面研究中國歷史，另一方面，關於中共之發生和發展找事實，找材料，找說明。他們自然要由中共出版物找材料，也由我們的出版物找材料。但我相信，如我們只有「匪幫」之類宣傳，三十年反共資格之標榜，而不能提供具體的事實，合理的說明，他們是連看也不會看的。如有事實或說明，其中只要有一點不確實之處，他們也會全部不信用的。

(二)

自大陸淪陷以來，關於中共發生、發展之史料，在政府方面，除了蔣總統之大著「蘇俄在中國」以外，國史館或黨史委員會在出版的「革命文獻」中，曾公布若干初期中共的史料。此見于「革命文獻」中史料，在一般人看，似無甚新穎之處。而據一般人推想，其所存資料，是當不止此的。此外，據我所知，至少還有兩個機關，曾印行很多有關共黨研究的材料，而且好多是很有價值的。然不知何故，對外並不公開。而據我所知，共產黨會印有很多關於臺灣書籍。他們不但公開發行，在他們所引參考書中，亦不諱言引證臺灣出版的書籍。

關於私人著述方面，除了若干涉及中共歷史的單篇文章，或見于有關俄帝侵華歷史中，以及「今日大陸」、「民主評論」、「祖國」諸雜誌上者外，專門研究中共歷史著作，以臺灣兩地計，也是寥若晨星。據我所知，大陸淪陷之次年，民主評論社出版了一本萬亞剛先生的「中共簡史」。六七年前，王新衡先生曾有意邀約若干作者，共同編纂一部中共歷史，不知何故，沒有進行下去。聽說張國燾先生寫了一本回憶

錄。最近香港有司馬聯先生正在寫一本中共歷史尚未成功。此外，便是沈雲龍先生的這一本「中國共產黨之來源」了。

上說我們的著作界有點麻木懶惰，自是「責備賢者」或有「激將」之意。事實上書籍之少，決非缺乏有心之士；而在寫中共歷史，實有甚大難關。一般而言，寫當代史是困難的。因為事涉現存人物，除非文章都寫成壽序格式，難免引起當世之恩怨。特別是中共問題，要牽涉到兩個問題。首先是中華民國主要創造者，以及中國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先生。不但先生親自訂下「聯俄容共」政策；不但在先生的「三民主義」演講中說到「俄國革命是人類大希望」，「民生主義即是共產主義」，即至今日在國民黨集會中以及許多國民集會中不可或缺儀式之一的總理遺囑中，其所說「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一語，其所指者，原是今日我們舉國所反對之俄帝，是盡人皆知之事。一方面，認為孫中山先生的一切不可批評，因此，當年之聯俄容共自必須認為正確。另一方面，今日反共抗俄不但是國民公意，且為政府鐵的國策。此前後完全相反之事，如何能同樣肯定呢？這問題在實際政治家看，也許無大問題；因為「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在若干人也可不求甚解；因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是，對於研究歷史的人，便是一大難題了。歷史所以為歷史，歷史家之所以為歷史家，在其「秉筆直書」。否則便是「曲筆」，便是「穢史」，便是一錢不值。儘管今天印出，歷史是有歷史評定且必待後世歷史家公評的。但要一個負責歷史家證明前後政策皆為合理，乃絕不可能之事。因為，如要證明孫中山先生政策正確，必須證明沙俄與蘇俄不同。這是不能證明的。即使能夠證明這一點，則今日抗俄又將自失論據。無論如何，要想證明聯俄與抗俄均為合理而必要，而兩全其美，在邏輯上事實上，都是萬不可能的。這便是一般不願談這問題的第三個原因。

還有一個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問題。即自十三年孫先生聯俄容共後，到十六年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即開

始反共剿共，而且自是以來，以反共爲根本政策了。如上所言，雖有成功，最後竟不免失敗，至少至今爲止，是大失敗的。假如我們不說「此天亡我也，非戰之罪」，就不能不研究反共失敗之原因。特別是歷史家，其責任主要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說到這一點，我們試以科學態度，將一切有關因素都收集起來，加以排列，可以將失敗原因或責任歸于下列諸組之任何一個項目：一、責任或在孫先生（即假定自聯俄容共後，即難有辦法），或以後的人們。二、責任或在政府，或在人民（即假定人民不反共）。三、責任或在中國，或在外國（如日本之發動九一八及七七事變，如美國之政策）。四、責任或在執政黨，或在政府（即假定政府不能執行黨的政策）。五、責任或在中央，或在地方軍人（如自唐生智，馮玉祥至張學良等）。我想，這都有關係，但都不是根本原因，更都不是唯一原因。因爲試將任何一項作爲唯一原因，不但在政治上有害，在事理上亦說不通，大家試一推論即知。即令歸于任何一個原因，只要再進問此又「何以故」，又都不够了。因此，此將都不能爲歷史家所完全採取。如是便可歸到這第六個選言命題：問題或在反共目標，或在反共方法。我想大家無人認爲反共原則有問題，那麼問題勢將落到反共方法了。研究這一點是否充分，姑且不論，但如說到反共三十年成效與預期相反之故，任何一個有頭腦歷史家必然要走到這一點，其他研究始爲可能。而這顯然是不好談的。這便是一般人不願談中共問題第二原因。

因有這兩大難關，使大家對此大問題有所忌諱而不願談，其來源不好談，其經過也不好談，那麼，這一代悲劇，就根本沒有認真研究可能了。而如果我們不研究，以「難得糊塗」爲貴，不但天下後世將莫知其得失，而即現在，我們都要吃大虧；於道義於利害兩俱嚴重。這是前面已經略爲提到的。

對於這一難題，在中國國民黨一方面應取如何態度，那除了國民黨的領袖和最高幹部會議以外，非其他任何人所能置喙。但是，站在國民的立場，特別是站在思想家或歷史家的立場，要就迴避這一問題，否則他只有說老實話。其他的歷史家可以不談。例如研究古代史，如史前史，殷商史，兩漢史，禪宗史專家

們。或研究一般文化史，像我這一類的人；也可以不必多談。但是，對於研究現代中國史特別是當代中國史的人，這却又是一個非碰不可的題目。這便是中國當代史特別荒蕪的原因。然而歷史家特別可貴之處，就在其能談當世之事。太史公之所以了不得，不僅在其能整齊秦漢以前之歷史，尤在其能够記載和評論當代之歷史，乃至於武帝時代之歷史。必如是，始能「通古今之變」。由於現代史有這一不便，所以不但我們現代史顯得荒蕪；一般史學，也顯得生氣不足了。結果所至，史學最昌明之國，可能成爲無史之國了。這是何等之損失！

(三)

沈雲龍先生即是今日從事這一吃力不討好，或難能而可貴的工作之一人。他關於清末及民初人物寫了若干傳記，凡研究現代史者，皆予重視。而這一本書則逕涉及最麻煩而重大的題目，我相信大家一定更予重視。他涉及的，即是西洋「怪物」或中國「妖孽」之始源。歷史家之第一事，是對一切問題窮源。治河者必窮河源，治病者必究病源。不知共源，是不能反共的。

我不一定以爲沈先生的這一本書，業已將這一問題完全解決。這只是中共歷史初步之嘗試。我們知道，中共病毒，是俄國帶來的。他始於民國九年優林來華下卵，翌年孵化而出。至十三年國民黨聯俄容共後，寄生于國民黨內而發育，直接毒化國民黨，間接毒化全中國。自此以後，中國以衰病之軀，復爲中毒之人了。以後雖經清共剿共，毒已上身。加以治療培補之不得法，及外傷外感之頻來，其病毒時輕時重，復經抗戰而大爲蔓延，終將中國巨人毒倒了。此一病毒之詳歷，即中共歷史的全部真相，恐怕要等到將來打開莫斯科的檔案室才能全部明瞭。沈先生之書，主要是將至今爲止若干有關人物親自提供的回憶，加以整理。這不是史料的唯一來源，但亦爲重要來源之一。在我們還沒有原始檔案資料之前，這不失爲重要材料。

，或重要材料之一部分了。

歷史始于資料事實之搜集，然不止于此。歷史必須客觀。然絕對客觀是不可能的。因為即使述而不評，觀察者的地位和觀點，必然影響他的觀察。研究歷史的人，也正需要各種角度之觀察，來形成一個整個的圖像。沈先生是青年黨人。因此，他自能由共產黨和國民黨的主觀解放。然亦因此，他難免有青年黨的主觀。如有之，那也應該不足為奇。然作為一個歷史家，主觀總當力求愈少愈好。在這一點，我以為沈先生之書，因根據非青年黨資料為多，並無特別主觀之處。也許讀者可以看出他以青年黨對反共特有先見之明。然這一點，却是事實，並非誇張。平心而論，中國青年黨與中國共產黨恰恰是同時起來，而前者之立黨，實對後者而發。若說中國有組織反共運動，當推青年黨為先，確為不爭之事實。當青年黨宣傳反共之時，西山會議之運動尚未起來。而國民黨內之反共運動，是西山會議以後之事，亦為不爭之事實。沈先生在談到中共毒害發展之原因時，對於國民黨有「責備賢者」之意，對青年黨有「吾謀不用」之歎，是很顯然，也應該同情與諒解的。如因沈先生之書，對這一點引起討論，則無論見仁見智，使這一大家迴避的問題不去迴避，而終使這一悶葫蘆終得打開，則沈先生此書開路之價值，便也在他的著書本身上了。所以，凡志在求是求真之人，無論對沈先生言外之意觀感如何，對其求是求真之誠意，必定能予尊重。

(四)

但問題還不止此。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容共一事，關係中國國運至為嚴重，自係無可諱言之事實。然我不以為這全是當時決策者之責任。因使當時國民黨作此決策者，原因自不簡單。不僅此也。共產、青年兩黨同時發生而興衰不同，除國民黨政策之抑揚外，應該還有一般的原因。此猶中日維新，都始于同治時代，而後果大不相同者，除當時中日政府性質之原因外，也還有兩國社會原因。不僅此也。縱孫先生決

策有大問題，他的一般親密的後繼者是在事實上力圖補救了。此後反共之力，世所共知。事竟不成者，如我們不能說大錯鑄成，無可補償，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如上所言，便必然歸到反共方法問題。這便是沈先生之書後半所討論的。然此非沈先生書之主要部分。他所說的，我相信見仁見智可以不同，但值得重視，當亦無問題。然而，使反共方法竟如此而不如彼者，又必有其原因。我堅決相信，中共之勝利，決不是不能阻止的。換言之，共禍不是不可避免的。然另一方面，反共其所以失敗，反共方法之無效，亦非少數人之責。速者不說，民初以來，各種盤根錯節，陰錯陽差，竟使中共開始，其興也暴；繼而長期剿共，共黨失敗，然已毒流於全國；最後，乘抗戰機會，再燎原于垂亡者，皆非少數人之責。此無以名之，只好說是「國運」；或者「中國之悲劇」。此一悲劇之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三個因素是：一、中國國際的國內的政治環境。二、中國思想界之主要狀況和傾向。三、新俄羅斯帝國主義東方政策。當第一個因素影響第二因素、使其沒有力量，或不能產生一個力量，來對抗第三個因素時，共產主義才能在中國得勢。這就是說，在俄國革命以後，在民國十三年前後，中國的精神空氣，是有利於共產主義之傳播的。當時社會上一般領導人物，——這些人物是不行的人物，而是最有聲譽人物，傾向共產主義，自無怪乎一般青年之風從或投火了。而任何一個運動，總是不斷將青年捲入，才能成功的。中共亦復如是。我願坦白聲明，我在國民黨北伐之前，乃一傾向共產主義而反對國家主義之青年；到民國十五年國民黨北伐軍到達武漢後，我開始對共產主義有多少之反感；到九一八前後，我認為馬克斯主義應該而且可能用自由主義加以補充和修正；然直到民國二十四年我受共產國際之歡迎，由歐洲到莫斯科，目擊共產主義之真相，因有對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比較研究之機會以後，才深信中國有發展資本主義之必要，因而才能確定的拒絕共產主義，因而看不起中國共產黨。此上距中共結黨，已十五年，而國家已在抗戰之前夕了。我其所以提這一點，不僅意在表彰青年黨反共之早，亦在指出在思想上抵抗共產主義並不簡單，因而想對中國共產主義毒害

發生發展的原因，亦即反共方法失敗的原因，作一補充說明。

我由我個人經驗——一個在中共結黨之日，年已十一歲，喜歡求知，並進而關心國事的青年；此後始終在出版界教育界及政治邊緣，目擊近四十年間中國與中國青年思想之變化。——對於中共竟「得天下」之故，自謂見之甚明。我曾作過一點分析。將來還預備作一較詳細分析。現在想乘此機會，略言若干要點，以就正此書作者與讀者之前。

我深信當初一般提倡共產主義乃至贊助共產主義的前輩，包括孫中山先生在內，其動機原是很純正的，我甚至不否認當初從事共產運動之青年大多是理想主義的。大家傾向共產主義，一由于客觀上國際局勢和國內形勢之無望。當時共黨宣傳的帝國主義與軍閥之罪過，雖多誇張，而不少都是事實，不可否認。如是蘇俄及共黨遂能日益得到敬意。二則由主觀上畢竟中國人政治上無經驗，思想上不成熟。此無經驗與不成熟，不僅在大家看不出蘇俄與中共所要做的，正是赤色帝國主義與赤色軍閥之事，而此比舊帝國主義舊軍閥更爲可怕。而且在于大家在政治上思想上缺乏一種定見，一種定向，因而失去立國的信心和希望；心中無主，遂不覺爲共黨理論所壓伏，向其低首投降。由于思想投降，共黨就能不斷招兵，因而屢蹶屢起。由于在思想上不能超越共黨，即令要反共，也就找不出一個有效的反共方法了。而此一思想投降，乃是中國近代建國運動悲慘失敗過程中精神崩潰之結果。而此一崩潰又是與中國歷史傳統，近代西洋文化之衰弱，整個世界形勢之變化，有極複雜關聯的。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傳統。一是帝王專制，八股主義，太監主義之傳統。二是知識份子自由民主之傳統。由于中國資本主義之不發達，中國不能形成一個有力的中產階級，智識份子遂亦無支援，所以前一傳統常壓倒後一傳統。亦由于此，也反過來使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發達。所謂資本主義者，即國民資本主義，即人人可以合法手段將本求利主義。中國過去有相當的國家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或太監資本主義；而

這都是危害資本主義的。

如是中國問題之解決，常取革命方式，而結果，又只是專制之再建。所以中國關鍵問題，應該是發展資本主義之一事。自西歐資本主義及其文化輸入中國，使中國舊社會舊文化解體。在此情況下，中國有兩條道路。一是自動適應世界環境，以求生存求進步的道路。近百餘年我們的國際環境誠極惡劣，但也不是毫無機會。只要國民在精神上有一中心，國家的產業能够發達，中國不但無根本危險，亦必能團結進步。此即須使中國自由民主傳統與西方自由思想傳統結合，重建國民文化；同時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自己資本主義，安定國民經濟。這需要相當內外和平，即使是苟安也好。這也就需要政治民主化，集中和培養人才。此即資本主義道路。二是讓中國精神物質被解體，經濟崩潰，精神真空，形成混亂之局。此即破產亡國之路。

不幸我們走的是第二條路。今日共產之禍，即是俄帝收穫我們崩潰、真空、與混亂之後果。致此之由，最大關鍵還是精神上的。其一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沒有結合起來，使國民有一新精神中心。我相信中國文化之真精神與西方文化之優良成分決無矛盾。我們也應該吸收西方文化之長，建設我們的新文化。真正的中國派與真正西方派恰恰是應該合作的。由于缺乏這一合作，一個新的思想產生不出來，遂無以對抗所謂馬列主義的哲學、歷史學、經濟學及其政治理論，社會主義之「系統」。而且，雙方還要互相攻訐。結果恰為共產主義製造機會。

其二，自鴉片戰爭以來，我們日益了解自己貧弱，一般仁人志士，無不痛心于「富強」。我們談富強談了八十年。新政，變法，乃至五四運動，皆由此而來。但大家不甚了解，富強之基本而正常道路是發展資本主義，而民主政治與科學是其手段亦其結果。資本主義在工業先進國家的價值如何是另一問題。唯其中國落後，中國第一步必須發展資本主義。大家不深知西洋各國富強之由來，也不反省清廷用官僚資本以

求富強完全失敗之教訓。如是對富強幻滅。恰恰世界大戰以後，社會主義又大為流行。社會主義潮流來後，不但資本主義視為落伍之談，富強二字都根本忘記了。只要將孫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與遺囑加以比較，就可看出三十年間思想上之一大變化。然不可忽視當時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在中國「革命」的最高理論，即是「爭取中國非資本主義前途」。我們不自知一切痛苦乃由無資本主義而起，並非有資本主義或其過多而起，回想起來，實在甚為奇異。對中國必須發展資本主義始能立國於今日之世這一點了解愈深，我想社會主義之根據就愈不存在。然當社會主義潮流起後，除梁啟超先生對資本主義作輕微辯護外，很少人能以雄辯反對社會主義的。如是便經由社會主義思想，崇拜蘇俄。因蘇俄號稱社會主義祖國也。後來又由社會主義提倡國營事業；而不知秦漢以來我們即有國營事業，不知國營事業必為官僚資本，而清朝之亡，及辛亥革命之爆發，即由鐵路國有及其反對而起。我們何以如此健忘，也是很奇異的。

沒有新的國民文化，國家便無靈魂；沒有資本主義，國家便無骨幹。於是民國以來，國家便形成軍人混戰之局。而軍人官僚資本，更使國困民貧。至此中國便只能在舊傳統中翻筋斗了。

筋斗之一，是革命萬能觀。革命原與戰爭一樣，所謂「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我們因為歷史上革命太多，及辛亥革命不成，常以革命可為家常便飯。革命成為神聖之名詞，萬能之咒語。此時蘇俄宣傳「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而「第三國際是世界革命大本營」。革命既然神聖，那當然愈大愈佳。如是乎便經由革命，崇拜蘇俄，蓋視為革命「老師父」矣。

筋斗之二，便是專制主義，八股主義，太監主義這一套東西。民國成立不到六年，我們有一次帝制，一次復辟。此可見專制遺毒之未淨。而數百年八股積習，數千年太監餘風，亦有未能一朝而去者。故每經革命，往往見其復活。蓋革命本無權階級之事。革命者得政權後，覺得之不易，必務求其勿失。故革命政權必為專權政權，此中國歷史上所皆然，而西洋諸國亦不例外。除非一時領導份子皆有謙讓之風，必經長

期演化，始能趨于憲政常軌。而在革命專制之下，革命八股革命太監之抬頭，亦在所不免。至于共產主義雖以社會主義及革命之說，得知識份子之同情；然共產黨之制度，本高度專制八股太監三位一體之結晶。此在有自由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與其接觸後，原不應不感不堪。正因中國專制八股太監之遺毒未淨，始不甚以爲怪。此所以卓絕之士如陳獨秀等先生必待最後忍無可忍，始能經綳而去。等而下之者，遂流連而不返，終甘之而如飴。西人有謂共產主義在中國有歷史根據者。其實所謂根據，即此腐敗之根據而已。

此外尚有一事，亦有助于共產主義之流傳。中國以亞洲傳統大國，百餘年間備受外侮之餘，養成一種不正常心理，即自卑感是。此種自卑，又與不正常自大不可分離。如是在下意識中有一種排外與媚外之錯綜。此種錯綜，必須由中西文化之正當認識，確立中國民族精神之正當的自尊自信，具有處當代世界中之正當的知己知彼，始能克服。而中西文化之爭，只足以加深此種錯綜。我們富強之目標，原極正大。只是不知富強之本，在於發展國民精神物質之創造才能，因而未得其道。中國過去的文化，證明中國人確有創造才能，只是已不够應付一個新的環境。所以，中國問題只是一個再發展自己的才能國力問題而已。不在乎此，長期失敗之後，失望焦急，遂不信任中國問題終須由中國人自己解決，而又不甚了解此一解決，乃一極複雜細膩而艱鉅之過程。如是一面自暴自棄，怨天尤人，一面尋求奇跡單方，救國捷徑。如是再經一段失敗之後，便造成中國人一種極矛盾之情緒：一方面甚爲浮動，容易激發爲排外行爲；另一方面亦甚爲萎靡，不甚以媚外爲恥。（此亦即周佛海、陳公博之類與毛澤東、周恩來之類，在精神氣質上爲同一典型，可以換質換位之故。）俄人深知此理，乃有計劃的予以操縱。俄人信譽，本在中國最劣。中國人本不易親俄。唯俄人革命以後，既挾其社會主義以東來，自稱非復沙俄，高談「友好」。國人初尚將信將疑。而他初並不要求中國馬上親俄，但慫恿反英，反日，反美，以洩中國人排外之氣，同時再在口頭上力表「友好」。如是者既久，無論如何，俄國人也是洋人，于是由一般崇拜洋人心理，進而特別崇拜蘇俄，進而化

爲俄國之繞指柔，至于今日中共甘爲俄帝而作抗美援朝之自殺而不辭，而嘆觀止矣。

以上是我們思想投降的過程與情況。如果我們再想到民國十年以後，世界的一般政治思想狀況，將更明白俄人利用中共，築成「運河」，將中國一般知識份子精神導流到俄國之工程，有極大便利的環境。其一，便是西方正統文化的自由主義開始受到有力挑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先後抬頭。此外，東方民族運動亦從此大興。西方人已自有沒落之感了。其二，第一次大戰後美國威爾遜總統會以民族自決大義宣告世界，這是美國取得世界領導權之絕好機會。然歐洲不合作，美國人民亦不予支持，美國退到孤立主義。其三，一次大戰後，日本益強，徒逞愚狂，向中國作深入之侵略。歐洲對日本侵略予以合作，美國雖表反對，然缺乏積極行動。其四，這時蘇俄以反帝爲號召，以援助弱小民族，以平等對待中國自稱，其能得中國人之同情，是無怪其然的。其五，及羅斯福扭轉美國中立主義，參加世界戰爭，大增美國威望。然同時却又因日本之愚蠢，史達林之奸滑，與俄訂下雅爾達密約，使俄取得東歐到東亞之戰略優勢。此時中國即有善者，已難爲力，況八年抗戰之後亂象四伏乎？

內外形勢固然如此，決非說振衰起敝，旋乾轉坤，絕無可能。然這需要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前者作準備，後者成事功。故共產主義之勝利，畢竟要歸于人才不足，領導人物思想不成熟，政治無經驗。我們現代國家立國治國之經驗。此非輕視民國以來政治人物之才能。然須知我們的擔子太重，我們的問題，是前所未有的。我們今日批評美國政治家不成熟。此非指其不能治國，而是指其領導世界一事，尙感經驗不足而已。民國以來，如袁世凱輩，只可謂之十足愚蠢，連不成熟都說不上。至於在野人物，決不少公忠體國之士。然如何在當代世界環境中保持中國之安定進步；如何結集國民力量，去腐生新，如何發展國民力量，足與并世周旋，以應付險惡世局；因爲既無先例可循，他們又不曾掌握國家實際權力，則其經驗不足，亦無怪其然。自民國之初，在朝者懷不可告人之私心，甚至訴諸暗殺；在野者遂挺身革命。而所謂議員

，非無潔身自好之士，然不少實爲劣紳變相，甚者下流爲豬仔而不辭。既不知爲國家謀，亦不知爲人權民生計。代議政治之信譽，因此破產。故蘇維埃之說，遂視爲良法矣。一般軍閥官僚，寡廉鮮恥，反日以尊孔讀經爲言。則「打倒孔家店」，亦不過稽康「薄周孔」之意，正有激而發。此原不重要。當時所積極提倡者，爲西方文明，爲民主與科學，此亦無可非難。然不甚了解民主與科學精義，實在人格獨立與理性自由；而此二者，非與中國文化無緣，又此二者必賴資本主義爲之支持，始能有效。僅有空洞之概念，遂亦不能抵抗「科學社會主義」矣。又國人向讀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言，又身受帝國主義侵略之苦。及聞工業革命以後勞資鬥爭之害，又聞列寧所謂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最後階段之說，能不對共產之教，爲之心折乎？我們不知道如何立國于今日國際環境中，如何才能建立自己與各國同等甚至更強的國力應付世界問題，始爲根本。也不知道在日俄兩位「惡鄰」之前，如何保持太平洋均勢，才是大事。我們對十九世紀以來所謂「遠東問題」之大背景不去探討，對俄國歷史及其遠東政策，社會主義在歐洲之起源以及共產主義在俄國之形成與發展，也只有道聽途說，而無本源研究。一旦對共產心折之後，往往事事師俄；即令反共，不但在方法上常步其後塵，甚至在根本心理上，亦不免有點佩服共黨「確有一套」。如是反共變爲政權問題，實逼處此；有如過去朝廷之剿匪滅寇。即令從前剿匪滅寇，亦必注意人心政治，專從軍事着眼，亦罕不失敗。况共黨者，不過俄帝遠東政策之工具。不由對俄着想，即令軍事勝共，自耗國力，已落入俄帝圈套，況不能乎？最致命之事，乃在外交。自漢以來，我們只有以夷制夷這一套。此在中國盛時，未嘗不可用，如漢唐是。然在中國衰時，行之無有不敗；如兩宋是。清人仍襲此智，幾成瓜分之慘。民國以來，日俄之害最大。吾人之策仍不外聯日拒俄或聯俄抗日二途，而忽於修明內政，團結國力，然後謀遠東之安全與均勢，進而發展實業與教育，以不斷提高國力；始爲根本遠大之計。而中國之敗，遂亦以此爲最鉅。諸如此類，即我所謂無經驗，不成熟也。

我常想，民國之初，是國家復興機會，不幸而袁氏不知大體。然如果國會諸人及一般知識份子能維持國會之尊嚴，不自相爭，予袁氏以口實及可乘之機，或與其鬪智而不與鬪力，也許袁氏之肆惡，不至如是其極。及袁氏叛國身死，安福柄政以後，又中國可爲之機。如果五四諸先生能在文化思想上能予國民以一種創造的信心，示國民以立國之大道，使知中國問題或中國文化問題之根本，不在於手段或方法之守舊維新，而在將中國文化之從來水準繼續提高發展，到現代國際之水準，以適應世界環境；使知和平統一爲立國基本條件，民富然後國富，國富然後國強，此則社會主義斷無益于國家；我相信國民心理決不至如後來之浮動。十三年後，北洋軍閥已成瓦解之局，如果孫中山先生不聯俄容共，而與一般知識份子合作，即以廢督裁兵，廢除不平等條約，召集國民會議，實行憲政爲號召，即不要俄國那些爛槍砲，如先生自言，用「語言文字的奮鬥」，我相信國民黨亦終能統一中國。我並相信孫先生多活數年，亦必反共。他之早死所給後繼者負擔之重，以及其後繼者終能毅然反共之決心，皆未可等閑視之。及國民政府統一以後，又國家可爲之機。雖有日本野心，共黨稱亂，如果能開誠布公，勵精圖治，貫徹「七分政治」政策，以及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并以自由主義破共產之說，以憲政結集全國人心，我相信內戰可以避免，共黨可以消滅，而舉國一致對日，和戰之權皆能操之在我。及抗戰發生以後，雖外有強敵，內有隱憂，然政府威信空前提高，如果能貫徹一面抗戰，一面建國政策！而所謂建國，實即政治之民主，軍隊之國有，經濟之資本主義；我相信國力能充實，人民能歸心，政府能有效能，則只要能隔絕蘇俄與中共，政府必立于必勝之地。等到雅爾達密約與中俄同盟條約訂立，滿蒙不保，俄帝中共接壤，中國大禍臨頭了。然國家地位一時空前提高，政府亦挾戰勝之威望。如果在中共尚未公然叛變之前，完成憲政體制，外堅美國之信，內固人心之歸，與一切非共之人竭誠合作，以孤立共黨，而不爲共黨所孤立，一面對東北採取實際政策（即國際化），一面在江南建設新力，只要能不浪戰，以逸待勞，我相信至少一個南北之局，未嘗不可苟保。如果凡此一

切，「如果」成爲事實，中國豈僅沒有共禍，而且早已富強了。所以共產主義不是必然的。這也許有人要說是事後先見之明。然一則，這些話過去並非無人說過，甚至是政府也會說過的。再則，所貴乎思想政治家者，無非是事前有先見之明而已。此明不足，即是無經驗不成熟之徵，未能否認。

以上所言，不是責備任何人，反之，即如我常說的大家都有責任。正如喬治桑女士所云，「了解一切，即原恕一切。」我不但能諒解過去的許多領導人物，甚至對今日身陷共黨而不得自拔者，有原恕之意，即是我了解國運之艱辛。不過，因爲對任何人未可責備過甚，也就不必崇拜過甚，從前幽默作家林語堂先生云，「愛之尊爲父固不可，惡之罵爲賊也不必。」（大意如此。）固談言微中，亦足解紛。其次，經驗不足，是可原的；然不知不足，或知而不改，不求進益，且不承認失敗，及不將失敗之經驗，告訴後來的人，則是另一問題。此則中國大聖人伊尹之所痛戒，而孟子之所深斥，又不可不知的。

因此，我必鄭重的說，僅僅反共，是不够的。反共二字既不能代表一種思想，也不能形成一種可以壓倒共產主義的力量。以「反共」二字反共，至多打一平手，稍有錯誤，便要失敗。所以專談反共以及有反共老資格，並無用處，反共必有最深最高最廣的精神道義學問背景。必有比共黨相反而又更强的精神物質武裝。然則今日應如何反共呢？簡單言之，我以爲必須在學術思想上將中西正統文化和思想結合起來，在政策上必須將五個原則——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民主主義，資本主義，國際主義結合起來，且提高其標準，以發展國民之聰明才智，和農工商業。否則，即是反共空談，旁門左道，而甚至敵人末技；豈僅無益有害，甚至是一幫倒忙的。

（五）

由于共產主義在中國之勝利，並非由于中國之需要，而只是蘇俄利用中國外部形勢之困難，內部精神

之弱點，塞進來，騙進來的；由于反共之失敗，並非反共之目標不對，而是因我們無經驗，不成熟，因而方法薄弱拙劣而來的；由于共產主義雖在中國非無一定陳腐根據，而是與中國文化世界文化之主流根本不合的；因此，共產主義終必失敗，此我堅信不移之事。然而，由于共產主義洪水已成，由于一代的人自動的完全改革其缺失甚為困難，且為時已晚；因此，推翻共產主義者，主要的必靠下一代之人，特別是大陸之人，此亦我堅信不疑之事。然則我們的責任何在呢？這除了依照上述五原則發展國力，并與世界民主國家竭誠合作，準備隨時策應國際的反俄運動，大陸同胞反共運動之外，就是要將我們痛苦的經驗，失敗的教訓，痛痛切切的，詳詳細細的，清清楚楚的，毫不掩飾誇張的，告訴下一代的人，首先告訴此處的海外的青年，繼而啓發大陸的青年，讓自由世界的中國青年好好同大陸青年合作，完成復國建國之最後任務。因此，研究中共發生發展的歷史是非常重要的，而此一研究基本原則又必須絕對無諱無隱，才有價值；就非常明白了。所以我不但推薦沈先生此書，並祈望一切有志之士，都能將他們對此一時代興亡，就自己見聞觀察感想之所及，誠實的寫下來，說出來。這是當年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諸先生的苦心孤詣念念不忘之事。今日政治家軍事家應當抱負如何，非我所敢贊一詞。但為學之人，特別是從事文史哲學之人，我則敢說一句，只能以此數先生自許自期；唯有如此，庶無愧于前修，無慚于後世，而有偷生苟活之理由！

最後我舉二事以見歷史之重要，以及歷史必本說實話原則始有價值。一是胡宗憲之「籌海圖編」。宗憲為明朝嘉靖間負責剿倭之人，然當時所謂「倭寇」，根本是中國海商而非日本人。故俞斌之功雖高，而戰爭實無意義。當時是可以取消海禁（即閉關），完全不戰而解決的。宗憲本人深知此理，但為自己個人利害，誘殺倭寇領袖王直（實安徽海商），並盛誇其謀略。後來真「倭寇」——豐臣秀吉進攻朝鮮了。明人還是用宗憲辦法。而八年朝鮮之戰，終為明亡先聲。所以徐光啓批評胡宗憲最大過失，是他「掩昧事實，貽誤來世。」宗憲之書，成于大作家茅坤之手。雖有掩飾之處，如善讀其書，仍可看出真相。然究因意

存掩飾，貽害竟至于亡國。二是「明史」。「明史」價值，即大體毫無掩飾。明末清人急圖攻入關內之時，袁崇煥爲其最後勁敵。如是清人利用明朝太監設反間計，謂與崇煥有約。當時崇禎中計，明朝亦皆中計，人皆以崇煥爲漢奸，將他活剮而死，都人且爭啖其肉。甚至大儒朱舜水在其集中，還咬定崇煥是大漢奸。這是清人最可恥陰謀，而說出來亦易引起漢人之公憤的。奉命修「明史」者，多明之遺民，得許一切據實直書。他們乃得根據清人實錄，關於崇煥一事，「明史」遂大書「我大清設間」云云。此不僅爲崇煥一人雪冤，亦所以垂戒後世。清代惡政雖多，然從未聽太監情報，冤誣忠良，即由于此。而此其所以有國三百年之久。然則歷史之重要，歷史必說實話，亦可知矣。

考究歷史，始不盲目。史無諱飾，始不爲誑。知鑒知戒，成功津梁。盲說若張，國乃滅亡。這是我在介紹沈先生書後，願進而爲我同胞鄭重一言的。

胡秋原

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自序

自蔣總統新著「蘇俄在中國」一書於去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版以後，在旬日之內接連看到聯合報兩篇專欄報導，一是黃季陸先生談往事：題為「當年容共一幕」（六月二十九日）；一是羅家倫先生談中共匪黨的創始，題為「邪惡的種籽」（七月三日）。這兩篇採訪專稿，似可為蔣總統大著第一編第二章第八節和第四節作一簡要的補充。但前者是其及身參與其事的回憶，自有其相當的真實性，後者則沒有超過一般對中共初期歷史所知道的以外，而且有些是出之於隨意揣度的想當然爾。果然在第二天便有兩點重要的更正，說是與原詞意有出入。實則應該更正的，何止兩點！本來，談中共最初創立的經過，最好由曾經滄海的過來人，如當年參與創建中共而後又脫離中共的人來現身說法，也許有其比較充實的內容（至於中共自己誇張宣傳和故意掩飾的那一套，就不大靠得住），若是以局外人談局中事，時隔多年，純憑一些近於模糊的記憶，而又不根據可信的資料來敘述，結果是很難令人滿意的。

作者篤信國家主義及民主政治，於三十年前初中學生時代，即加入中國青年黨矢志反共。自大陸淪陷，渡海來台，始致力於民國史及現代政治人物的研究，因而對於這一方面的史料，曾有若干的搜集。爰於去年七月開始整理手頭所有資料，費數個月的功夫，寫成本書，曾分期刊載於民主潮半月刊，以供反共人士之研討。果能緣此對中共禍國致亂之由來，得一明晰的概念，則「邪惡的種籽」之得以生根成長，誰為之？孰令致之？就不難探索其本原了！

作者撰述本書的動機，可以說是有感於黃季陸、羅家倫兩位先生對「蘇俄在中國」一書所發表的談話而起。所引述的多是根據若干可靠的原始資料（但個人能力有限，缺漏是在所難免的），把它綜合起來，

依照「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治史方法，將近三十年來由容共到反共這一段慘痛歷史的根源，尤其是最初爲蘇俄誘騙而「開門揖盜」和「引狼入室」的若干曲折經過，真實地呈現於讀者之前。其中是非功罪，成敗得失，他日史家，自有定評。但我們這一代，身受其禍，有切膚之痛，決不可以瞞天控誑，自欺欺人的。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其重要意義即在此。何況中共竊據大陸以後，即行大事篡改歷史，製造歷史，有如滑鑿自珍古史鈎沈錄所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墮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其用心是可恥的，其手段是毒辣的，我們怎能不嚴加警惕！

可是一般寫民國史的人，受三十年來國民黨「黨治」之影響，心理上鑑敵未能完全祛除，多半是詭隨流俗，迎合趨時，往往以「黨統」爲主，把「國史」與「黨史」混而爲一，預存有一功則歸己，過則委諸他人」的成見，使民國以來若干重要史實，在故意抑揚輕重之間，完全失去真象，而且全非。以致立國近半世紀，幾乎是祇有「黨史」而無「國史」，這是何等的缺憾！假使這本小書能够在這方面稍有彌補，那麼，對於當前我們所致力之反共抗俄復國中興工作，也就不算毫無裨益的。

本書之能出版，極得成舍我、雷徽襄、夏濤聲諸先生之鼓勵與協助，并承胡適之先生賜予署簽，胡秋原先生作序及校閱全稿，指示若干改正意見，特附此致以誠摯之謝意！

沈雲龍

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中國共產黨之來源目錄

胡秋原先生序	一八
作者自序	二六
一、中共的前身	一
二、「南陳北李」	四
三、「社會主義者同盟」	七
四、中共的產生	一〇
五、初期的內爭	一五
六、馬林的活動	二〇
七、中共二全代會	二五

八、孫、越聯合宣言……………二九

九、聯俄容共之決心……………三四

十、「國共合作」的實現……………三七

十一、西山會議派之反共……………四三

十二、反共與聯共之對立……………五一

十三、中共的裸姆——鮑羅廷……………五八

十四、中共毒害之蔓延……………六五

一、政治環境有利發展……………六六

二、誤敵為友自食其果……………六八

三、反對容共不受重視……………七二

四、迷途知返孤掌難鳴……………七四

五、思想中毒必須根治……………七九

十五、反共抗俄之道……………八三

附錄：

一、黃季陸先生：談當年容共一幕……………八五

二、羅家倫先生：談「邪惡的種籽」……………八九

中國共產黨的來源

一、中共的前身

中國共產黨於民國十年七月一日在上海籌組成立。它的前身是民國九年五月的一「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和同年七月的一「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以後蛻化而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而馬克斯主義研究會的前身，則淵源自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後的一「社會主義研究會」。據最初策動這個社會主義研究會組織的張西曼(湖南長沙人，遜清學部尚書張百熙之族弟，曾留學於海參威的帝俄東方語文專科學校，並任北大教授)在其所著歷史回憶一書中說：「自從民八(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爆發了全國性的青年愛國運動，我就在前一年往俄國遠東藉考察安福系根據無恥的「中日軍事協定」而實行所謂「對俄共同出兵」醜劇真象的機會，分別致書於國父和在北京的革命元勳萬福華先生(民元前被囚上海西牢八年)，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博士等積極主張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接受蘇俄偉大十月革命的組織方法和經驗，以促進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萬、蔡兩先生聯電促我由俄回京，不幸此時萬先烈因獄中痼疾不治逝世，祇好由我聯合蔡、李(大釗)諸先生和由各地集合的前進知識份子百數十人，秘密成立了一「社會主義研究會」，初期分組開會的地點却未定，但以後多半設在北大圖書館中。當時祇求小心翼翼地推動實際對青年革命政治思想有效的的工作，成立各地分會，絕不誇張宣傳，極力避免北洋軍閥的非法干涉。」又說：「蔡校長因為北大在五四運動中已經遭受北洋軍閥的痛惡，仇視，同時他個人也無且不處於危疑叢生的環境，所以祇願以護道者自居，不能直接參加社會的領導。當時內外的敵人窮於環攻，詩賦並攻，只使不得蔡先生的完全同意和

多方維護，又何能在北京大學的範圍內立足。不過，我們要注意到個中份子的構成，也正像五四運動參加份子一樣，不一定都和北大有關，就因為蔡先生一貫開明的作風，不知不覺中使北大員生在這些運動上佔了主導地位。尤其在使五四精神得到政治思想史上的合理延續，擴大和推動了一九二三——二四（民十二三）年中國國民黨的光榮改造——這原是我們對於一個富有新生命的革命政黨所豫期的必然效果了。」

張西曼所言或稍誇張，而有意暗示蔡元培先生贊成他們，尤近招搖。萬福華先生是他的岳父，當然可以標榜一番。但所說社會主義團體一事，自係事實。其次，他又指出當時先後參加社會主義研究會的積極份子，有：「李守常，（大釗、北大圖書館主任），毛澤東、周恩來、陳願遠、范體仁、易克巖、郭夢良、徐六幾、易家鉞、（君左）、孟壽椿、張國燾、鄧仲夏、瞿秋白（北京外交部俄專學生）、朱謙之、費覺天、陳獨秀（北大文科學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教授）等百數十人，分會也分布於全國大都會。但以後因少數個人觀念和主張的差異，發生了一時局部分離作用，所以隨即有其他近乎曇花一現的組織應運而生，舉其舉舉大者（北京方面）如下：①基爾特社會主義研究會——郭夢良、徐六幾等；②工團社會主義研究會——陳願遠等；③無政府主義研究會——朱謙之等。」這與香港祖國周刊二二七期易君左「五四人物雜憶」一文，可以相互印證的。大概社會主義研究會的構成份子，因為信仰和主張的不同，故成立不久便有一部份宣告分離。而這個研究會之為五四運動的副產物，則是無可置疑的。

由社會主義研究會進而為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再進而為中國共產黨，張西曼也有簡要的說明，他說：「到了「八二〇（民九）年，社會主義研究會因鑒於聲勢日趨浩大，北洋軍閥更未敢橫加干涉，也進一步成立了「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和「俄羅斯研究會」，它們共同的具體促進了——①一九二〇（民九）秋季北大俄文系的成立，和北京各大學俄文班（包括民十三的交通大學俄文班）的紛紛設立；②一九二一（民十）中國共產黨的成立；③一九二三——二四（民十二三年）中國國民黨的統一領導。」其中有關於北大俄

文系的設置，據他說是「立意培植專材，充份介紹這新興革命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溝通兩國的文化。」經過蔡校長的大力排衆議和俄使館的協助，始告成立。蔡打算請他擔任系主任，他不就，才改由教務長顧孟餘兼任。聘有俄使館漢文秘書伊鳳閣（Ivanov），詩人鐵捷克（Tretjakov），作家伊文（Iven）等爲教授。並且提到俄籍教授之中「另有一敗類，華名柏烈偉，他自命爲研究中國詩經的專家，來到中國鍛鍊普通語文的。十月大革命後他運動當上第三國際駐天津的文化聯絡員。對於民國十年前後秘密從華北入蘇的中國青年（瞿秋白、俞頌華、李仲武、凌鉞和其他多人），都給以綢製長方小塊的秘密入境證件，但對於中國境內的路費等絕未發過絲毫補助。他却對第三國際報上了許多花帳，侵蝕了若干公款。等到他的上司發現了他的舞弊，就要調他回國查辦。他震於黨紀國法的森嚴，就聲明脫離蘇聯國籍。混到日寇進陷北平的時候，他似乎短期被捕，以後就聲請入了美國籍，束裝渡海了！」

柏烈偉是旅居中國多年的白俄，他另外的譯名是鮑立維（見三十七年中華年鑑）或是布魯威（見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自由人載海隅孤客：「解放別錄」），豈但民十左右嘗往於馬克斯主義和蘇俄政制的中國智識青年，由他祕密負責輸送赴俄，就是民九春間第三國際派來中國的胡定斯基（Gregori Voitinsky），也先經他介紹認識李大劍，再轉折至滬與陳獨秀取得聯繫，然後才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的「催生」工作。他並且利用世界語致書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晦鳴學舍所出版之「民聲」週刊負責人，想藉通信來促進彼此的聯絡，可以說在中國搞「統戰」工作的第一人。他不僅是最早深入中國的赤色第五縱隊，而且是拿羅布造報銷企圖出賣中國的「先進同志」，就這一點說，他是爲中共奸黨們首先起了「帶頭作用」的。我們要了解第三國際如何來製造中共，就不能忽視最初「穿針引線」的這個傢伙！

作者按：關於胡定斯基 Gregori Voitinsky，「蘇俄在中國」書中說是共產國際東方部長，即胡定康。但在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書中，述及民國十二年蔣氏訪俄時，「九月七日

下午見遠東局長胡定斯基。……九日上午往訪黨部之東方局長胡定康。……十一月二十五日晚，共產黨第三國際開會，公由遠東局長胡定斯基導見主席團。『似乎又像是兩個人。而在美的地方所見到的，其譯名及英文拼法，亦頗有歧異。如中華年鑑譯為威金斯克；解放別錄譯為倭挺斯基；毛以亨的「俄蒙回憶錄」譯為浮丁斯基；周佛海的「我的奮鬥」及「往矣集」中譯作吳庭斯基；陳公博的「我與共產黨」中譯名與周相同；吳相湘的「俄帝侵略中國史」中為 V. oitinsky，譯作維丁斯基；張其鈞的「中華民國史綱」中譯名與吳相同；羅家倫編「革命文獻」第九輯前言，則譯作伏丁斯基；蔣廷黻的「三年控蘇的奮鬥」附錄中，則依全名音譯為格勒哥雷、窩依丁斯基。以上俱說他是第三國際駐遠東代表，或是共產國際派來中國專負策動中共組織之責的。下面如引述各該原文時，譯名一仍其舊，無法強求一致，這裏列舉出來，藉供參考。

二、「南陳北李」

在中共初期有所謂「南陳北李」之說：陳指陳獨秀；李指李大釗。民國七年一月，陳、李同在北大任教，與胡適之、錢玄同、沈尹默、劉半農等接辦「新青年」雜誌，即由其六人輪流編輯，以提倡白話文為主，成為文學革命的急先鋒。是年十二月，陳、李又創刊「每週評論」，開始介紹馬、恩學說，作「階級鬥爭」「勞工專政」之鼓吹，頗予次年「五四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的浪潮以不少衝激，遂為高喊「打倒孔家店」渴求思想解放的智識青年所崇拜的「偶像」，未幾而有「社會主義研究會」的祕密組織成立。民國八年六月中，陳因在市場散佈傳單被捕，「每週評論」的隨感錄欄，且譽之為「出研究室進監獄，出監獄進研究室，是學者的任務」云云。旋「每週評論」於同年八月底為北京當局所封禁，僅出至三十六期止。其時胡適之先生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對於「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所謂

「新輿論界」頗爲不滿。他說：「孔丘、朱熹的奴隸是減少了，却添上一班馬克斯、克洛泡特金的奴隸！」但因此却爲「北方的社會主義者」和「兩方的無政府主義者」所痛詈，可見五四以後的文化思想界本身已不能自主，開始走上「投降」之路了！而今天中共之必須清算「胡適思想」者，其根本原因，也就在此。

陳獨秀在北京關了八十多天，經人保釋出獄後，曾一度赴武漢講學，以回京爲警察當局查詢，即秘密去滬，藉學術研究爲名，集合施存統、俞秀松、袁學濂、李漢俊、金家鳳等多人組織「馬克斯主義研究會」。此時僅以共產理論爲研討對象，尚無實際行動，故不爲人重視。然自胡定斯基來滬以後，此一組織漸與第三國際互通聲息，至民國九年九月，始由陳主持召集「中國共產黨」創立準備會，積極展開工作。在胡定斯基之前，莫斯科會派另一名叫斯脫洛米斯基者至滬，借一旅俄海參威華僑楊明齋同來，爲之翻譯，與陳晤面洽商。以後即推楊在滬組設俄文學校，招收青年，在國內或選派赴蘇俄東方大學學習，作爲工作幹部。並由斯脫洛米斯基交出二千元，開辦「又新一印刷廠於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出版共產主義宣傳書籍，其時陳望道翻譯馬克斯、恩格斯的「共產宣言」就是在這裏印刷，是爲共產黨聖經以中文出現在中國的第一部。這個內幕，見之於海隅孤客的解放別錄，應該是可信的史實。

關於準備組織中共的籌劃經過，周佛海有較詳的追述，那時他是留日鹿兒島高等學校的學生，但已參加社會主義研究會爲會員，他於民國九年暑假回國，他說到了上海之後，「去時事新報館訪張東蓀，他（指張）是「解放與改造」的主持人，我因爲投稿的關係，和他常常通信。……張東蓀告訴我，陳仲甫（獨秀）要見我。仲甫本是北大教授，主辦「新青年」，鼓吹新思想，爲當時的當局所忌，所以棄職來滬，「新青年」也移滬出版。有一天我和張東蓀、沈雁冰、去環龍路漁陽里二號，去訪仲甫。當時有第三國際遠東代表俄人吳庭斯基在座。吳大意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

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民主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爲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太多，實際行動一點也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他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當天討論，沒有結果，東謀是不贊成的，所以以後的會議，他都沒有參加。我和雁冰是贊成的。經了幾次會商之後，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負責，北方由李守常（大劍）負責。當時所謂南陳北李。上海當時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廬等。戴季陶也是一個。不過他說，孫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別黨，所以「中國共產黨綱」的最初草案，雖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沒有加入。這個時候，只有籌備組織，還沒有正式成立。預備在一年之中，於北京、漢口、長沙、廣州等地，先成立籌備性質的組織，然後於第二年夏天，開各地代表大會，正式成立。」這就是他最早策劃組織中共而於民國十三年脫黨最後以漢奸下場的「坦白」自供！據周說當時全國中共黨員不過三十餘人而已。

在周佛海的追述中，提到戴季陶與中共創黨的關係，陳公博也有同樣的說明，陳是民國十年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廣州代表，他說：「在上海選聽見一件關於戴季陶先生的軼事，季陶和仲甫約定共同發起共產黨，到了成立之前一日，季陶來了一封信，說他和國民黨的關係太深，的確不能參加共產黨組織，不過他是同情共產黨的，他正在創辦交易所，打算以交易所的贏餘，來幫忙共產黨的黨費。」這可以作爲周說的補充。至於邵力子，雖在民國十三年上海民國日報公開聲明脫離共黨關係，但不久，又往莫斯科孫逸仙大學，接受俄共訓練，始終隱藏身份在國民黨內混了二十餘年，很得黨的信任和扶植，內而參預密勿，職司宣傳，外而封疆大吏，出使俄國。到民國三十八年任和談代表，給露出狐狸尾巴，投靠紅朝。人多斥其髮節無恥，其實，他原是一個老牌共產黨。不過，他的障眼法，却一直把人迷糊住了！

其次，沈玄廬即沈定一，民國十二年八月，他隨從今總統蔣公和張太雷、王登雲等，奉孫中山先生之命，組訪問團赴俄考察（作者按：另外尚派有邵元冲，於十一月四日至莫斯科）。據「蘇俄在中國」書中

述及「本團四人之中，三人都是國民黨。只有張太雷一人是共產份子，訪問團一到俄國，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誘到他一邊，與我們對立起來。於是代表團各種計劃，考察工作，對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見和主張，都不能一致。」其實，當時沈定一是具有雙重黨籍的，表面公開是國民黨，而秘密身份是共產黨，未爲人所覺察，故到俄以後，即使無張太雷的分化和引誘，也必然是倒在共黨一邊的。可是沈定一於民國十四年忽又參預西山會議派，從事反共工作，不久便在原籍浙江蕭山以組織農民協會爲人暗殺，也許是他最後覺悟了吧。近三十年來的政壇，我們看到不少先是共產黨而後改入國民黨的，也有從國民黨一變而爲共產黨的，甚至起初附和容共後來激烈反共的，或是原先反共最後又投共的。形形式式，反反覆覆，像沈定一也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中共現正製造黨史，如胡喬木寫「中共卅年」，即謂中國共產黨係由若干小組所結合，毛澤東代表湖南小組，周恩來代表法國小組云云，藉以否定陳獨秀、周佛海、沈定一等史跡。這是由於陳獨秀以後成爲托派，被開除黨籍，周、沈亦離開共黨而反共，中共們對於這一段的歷史，與俄共黨史故意抬高史達林之辦法，如出一轍。不好意思道出真象，祇有捏造事實，歪曲一番了！

三、「社會主義者同盟」

當馬克斯主義研究會未成立之先，陳獨秀還在上海另搞了一個「社會主義者同盟」的組織。這個組織的構成，目的是在把信仰馬克斯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自稱是自由社會主義者）集合起來攜手合作，而最初從中牽線的便是前述之白俄布魯威。因爲在當時的蘇俄，也是把無政府主義者當做「友黨」的。

按無政府主義理論輸入中國，始自民國紀元前七年李石曾、吳稚暉、張靜江在巴黎刊行之「新世紀」週刊；嗣又有張繼、劉光漢與日人大杉榮在東京刊行之「天義報」。辛亥革命告成後，同盟會員支那暗殺

團長劉師復在廣州組織晦鳴學舍，鼓吹無政府主義，編譯蒲魯東，克魯泡特金學說而為晦鳴叢書，並刊行「民聲」週刊，以四分之一篇幅用世界語寫作，是為國內宣傳無政府主義的首創刊物。民國二年，龍濟光入粵，封閉晦鳴學舍，劉思復乃將之遷移上海，旋劉於民國四年病逝杭州，而「民聲」週刊，仍時有出版，與國內外同志通訊聯絡，並未中斷。布魯威即利用此方式，毛遂自薦，而達其目的。

據海隅孤客的解放別錄說：「一九二〇年春間，接到一封用世界語寫的信，署名布魯威，說他是布爾什維克黨人而久居華北，他又說由閱讀「民聲」世界語版，知道自一九一二緊跟辛亥革命後即有自由社會主義者一羣，在華南恣力宣傳，結果則現代最健全的思想體系，深入人心，實為五四學生運動的原動力。數年來中國的社會運動，再沒有其他派別的人領導着。他相信中國的自由社會主義者對蘇聯的革命領導者布爾什維克黨人不會生疏，或許會樂於携手，這是他發來這封信的緣故。那時留守學舍的鄭佩剛，把布氏的信寄與北大黃超海，讓他們就近接洽。黃氏約同陳獨秀、李大釗與布氏在京在津叙話幾回，結果產生一「社會主義者同盟」，沒有分什麼派系壁壘，只要是傾向同一大目標的都先團聚起來，共推陳獨秀為領導者，北大和其他大學學生，投身這旗下的衆多而熱烈。」陳獨秀南下至滬之後，此一同盟工作，遂積極展開。上海方面，由陳主持，參加者有沈定一、李漢俊、尉克水、袁震瀛、俞秀松、鄭佩剛，及朝鮮獨立黨領袖金九等。莫斯科派來的斯脫洛米斯基，則居中策劃一切。北京方面，由李大釗、黃超海、華林、王竟成等主持；廣州方面，由梁冰弦、區聲白、李少陵、黎昌仁等主持，共同從事於學生和工人的組織，並致力刊物、宣傳小冊的編印和散布。這一明知不是伴一的兩派人馬，居然水乳交融，幹得非常起勁，結果竟為共產勢力通向華南鋪下一條道路，這是無政府主義者所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當時國內政局適值是南北對立時期，北方是安福系國會所擁戴的徐世昌為大總統；南方是政學系為中心以岑春煊為首的合議制軍政府，孫中山先生是七總裁之一，其嫡系粵軍二十餘營由陳炯明以援閩名義

統率駐軍漳州，擁有閩南二十六縣的地盤。陳在清末同盟會中，原爲劉恩復領導的暗殺團團員，因而受劉的思想影響很大。他震撼於五四運動的澎湃，頗思吸引新思潮導入自己轄區，從事社會改革，予國人以新的觀感，從而促進全國的革新。於是他就致書晦鳴學會舊人主持華南區「社會主義者同盟」的梁冰弦邀其前來策劃教育文化的改進工作，梁抵漳後，與陳傾談甚洽，首先創辦「新聞學」書局，及「閩星」日報、週刊等，主張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同時並進，並建議成立教育局直隸「援閩」粵軍總部，召開全區二十六縣教育會議，邀請李石曾、吳稚暉、胡漢民至漳講演。起初梁打算請陳獨秀爲教育局長，陳以上海工作開展，未允南來，乃由梁擔任。其後又由布魯威介紹負有特別使命之列甯至友V某（據海隅孤客說全名已忘，祇記得其首音是V）携有列寧簽名贈送陳炯明之照片至漳，與陳密商合作，如供給軍械，派遣軍事顧問等。V某獲得協議後，歸國覆命，行至伯力，暴斃途中。不然的話，國共合作一幕，將提早三四年上演，而陳炯明也將以扮演主角身份登場了！

民國九年十月，陳炯明奉命回師討岑，攻克廣州，迎中山先生回粵，重組軍政府，不久被推爲非常大總統。中山先生任陳以陸軍兼內務總長，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等職。陳以手握重權，睥睨一切，益信取得粵桂兩省地盤，自將受蘇俄之重視，而獲得援助，遂漸萌異志，乃邀陳獨秀至廣州主持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共三人，另二人爲許崇清，陳伯華。其時，莫斯科另派一名敏諾者偕譯員波爾西至粵，以經商爲名，暗中聯繫。而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三人適亦自北大畢業回粵，得梁冰弦之協助，在陳炯明處每月取得津貼二千元，辦一「羣報」，作爲華南區「社會主義者同盟」的準機關報。同時，陳公博等三人更得陳獨秀之同意，開始組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廣州分部，公開成立，吸收共產份子，展開廣州工運學運活動，陳公博更以廣東高師及法專教授身份，主持一切，以後著名共黨林祖涵、劉爾崧、阮嘯仙、楊勉安等，都是由這個外國組織吸收進來的。另外，吳稚暉亦得陳炯明的贊助，在法國里昂成立中法大學，回國招

選學生，
次歐戰的
織。所以
由於胡定
「苟合」
還有
他們的鈎
不久也發
產黨人包
。可見中
以及國外

中共
的周佛海
「接
快，不單
陳炯明在
持。廣東

；漢口是陳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達、李漢俊；濟南是誰，記不清了（按：周在另一文裏說，出席的尚有譚平山和鄧仲夏）。丁默村雖不是代表，却是C.Y（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活動份子，也在上海。我便是日本留學生的代表。其實，鹿兒島方面，沒有一個人參加，東京只有施存統，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兩人。第三國際加派馬令來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澤東等三四人，住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學樓上。當時學生放了暑假，所以我們租住。沒有床，我們都在樓板上打地鋪。伙食，當然是吃包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馬令和吳庭斯基也出席。開到第四晚時，究竟是馬令有經驗，他說：「明晚一定要換個地方，我們在此一連開了幾晚會，一定使巡捕注意。」我們說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時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緊，於是決定仍在原地。那天下午，我忽然肚子大痛大瀉，不能出門，一個人睡在地板上想工作進行的步驟，糊糊塗塗也就睡着了。大約十二時左右，忽然醒來，看見毛澤東探頭探腦進房來，輕輕的問我道：「這裏沒有發生問題嗎？」我駭了一跳，問他，纔知道是出了事。

「原來他們正在開會的時候，忽然有一個面生的人跑進房來，因為當時既沒有衛兵守門，而漢俊家又是和同鄉合住，所以此人上樓，沒有人去阻止。他進房來一看，便道：「對不起，走錯了。」說完，立即退回。究竟是馬令機警，他說：「快散了吧，一定是偵探。」於是立即散會，只有公博還留着與漢俊閒談，不到一刻鐘，法國探目，安南巡捕，中國包打聽，把房子圍住，一湧上樓。探捕問他們為什麼開會，他們說大家都是北大學生，因為要出一種雜誌和叢書，所以開會商議。探捕又問為什麼有兩個外國人。他們說兩人是北大教授，請他們指導。一個中國探捕指着公博道：「你不是日本人嗎？」經過好久的說明纔證明他是廣東人。巡捕看到漢俊的書架上，全是社會主義的書，於是大教訓了一頓，說不應當看這些書，問了一刻，也就去了。僥倖巡捕沒有搜身。他們兩人衣袋內，都放有共產黨綱草案，如果搜出，還有不進巡捕房的道理。毛澤東以為博文女校也一定被發現了，嚇得不敢回去，在遠遠的地方，探頭探腦偵察了半天。

敢進去。這些話，都是我以後聽見他們說的。

「我聽了毛澤東的報告以後，覺得助虧一贊，實在可惜，和他商量明日一定繼續開會，但是上海租界內恐怕不行了。我忽然想起李鶴鳴（達）的大人是嘉興人，何不去嘉興開會。於是便力疾跑到漁陽里去商量，因為鶴鳴住在仲甫家裡的。我們商量決定，鶴鳴夫人明日早車赴嘉興，先雇一隻大船等着，我們第二班車去，乘船遊南湖。於是連夜分頭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兩兩的到北站上車，我也抱病前往。到了嘉興，早有鶴鳴夫人在站等候，率我們上船。當地的人，以為是遊南湖的。也不注意。我們把船開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我們就在船上開起會來，通過黨綱和黨的組織，並選舉陳仲甫為委員長，我為副委員長，張國燾為組織部長，李鶴鳴為宣傳部長。仲甫未到滬的時期內，由我代理。「中國共產黨」就這樣在煙雨蒼茫、湖波浩渺的孤舟中，正式產生了！」

這是中共匪黨創始的實錄，有資格能道出此中真相的，十之八九都已登鬼錄，現在除在香港的張國燾和在大陸迄尙老而不死的李達及包惠僧之外，知道毛澤東那時「探頭探腦」張皇失措一付醜態的，恐怕沒有幾個人了！

中共首屆中央組織成立後，在周佛海代理委員長（民國十一年以後改稱總書記）主持之下，一面指派各地的負責人，分頭前往工作，一面在上海首先活動起來，組織一個「勞動組合書記部」，以發動指揮上海勞工運動。這個組織的名稱，是由一個日本名詞和一個俄國名詞湊合起來的，可見其不倫不類。其下手的方法，是藉日本紗廠替工人補習日語為名，進而操縱其組織，再擴及其他工廠。至於當時的經費，是由蘇俄供給的。據周佛海自己說：「……經費呢？不待說是盧布換成的鈔票。他們給我每月八十元大洋的生活費，此外還有點活動費。九月中旬，陳獨秀返滬，與馬林大鬧意見，不肯和馬林見面。因為馬林說一年以來第三國際在中國用了二十餘萬而成績如此。中國同志，未免太不努力。在我代理委員長長期內，不到兩

月，經手還用了一萬兩三元，而張國燾所組織的「勞働組合書記部」還直接去領，不經我手。」可見中共是由俄共用盧布一手製造出來的，而周佛海與實際負責指揮的第三國際代表馬令見面，不是在新世界，大世界，便是在永安公司的屋頂花園，那些著名打野雞的遊樂場所以避人耳目。不久，因為暑假快結束，周急於回日上學，乃電催陳獨秀由粵回滬接替。其時，美國正在召開華盛頓會議，第三國際認爲這是宰割弱小民族的會議，乃在伊爾庫茨克召集遠東弱小民族會議，以謀抵制。中國方面要召集工人、農民、商人和青年的代表六七十人，派去出席。於是中共中央便決定以廣州爲中心的南方各都市，和以北京爲中心的北方各都市，都派人去召集，長江一帶的任務，便由周佛海負責。這件事對後來中共發展，有極大的關係。他對此也有一段追述：

「我於陳獨秀返滬之後，便親自冒着危險到當時軍閥勢力最大的長沙、武昌、安慶、蕪湖、和南京五處，去秘密活動，召集代表。在我離開長沙十二小時後，我故鄉的當時的當局，便派兵捉我。我在長沙勾留了四天，得到毛澤東的援助，在長沙召集了十幾個青年，送到上海轉赴西伯利亞。在武昌等地也找了許多代表。在長江一帶由我召集送到西伯利亞去的，約有五十人左右。這些人中間，有三十多人，便到莫斯科去留學，以後回國，便成爲共產黨最堅強，最有力的幹部。回到上海之後，我立即把經手的事務交清，回鹿兒島上學，這時學校開學已一個多月了！」

周佛海另外還提到他到長沙的情形，說是一住在當時有名的大吉祥旅館，連夜去看毛澤東。他那時在會公祠辦了個自治大學，沒有教授，也不上課，而名之爲大學，可見得五四運動後當時又化界之混亂了。他就住在校內。我進去後，遠遠看見他在燈下看書，原來是用紅筆圈李後主的詞。他看見我忽然到來，駭了一跳。我告訴了原委，便連夜商量辦法。三天之內，召集了十餘人。當然大部份是青年學生，農民一個沒有，工人却有兩三個。我分別見面，指定了集合的日期和地點，並分發川資後，就離開了長沙。當時軍

閱雖然沒有特務工作，也沒有藍衣社，但是却也有他的偵緝隊，不過不大靈敏罷了。我上船走了半天，趙恆惕纔派人到大吉祥去搜查。」可見中共初期的秘密活動，周佛海是很賣過一番氣力的。

其後，周於十三年五月，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尚未畢業，即應戴季陶之約，赴粵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時兼任部長，嗣周又兼任廣東大學教授（周至十五年春始畢業京都帝國大學）。是年冬，遂宣告脫離中共，加入國民黨，以後一直在黨國中扶搖直上，終因參加汪政權而身敗名裂。他在抗戰勝利前兩年公開上述一段往事之後，復又感慨的表示：「當初我們對於這個黨，是懷着滿腔希望，而且舉全副精力去奮鬥的。那知道以後參加了惡劣份子，越變越壞，竟變成殺人放火，屠城洗寨的流匪，和張獻忠李自成一樣的殘忍。所以當時第一次全國代表的人物，大部都先後宣告脫黨。公博回粵不久，就赴美留學，無形的退黨了。李漢俊、李鶴鳴和我，在十三年前後，都先後脫離了，劉仁靜被開除變為托派了。我們當時最高領袖陳仲甫，在十八九年的時候，也脫離了。張國燾在國民黨與剿共之師後，在鄂東還活躍了許久，但是二十六年也脫離了。現在在重慶和陳立夫一起，做反共的工作。我以後於二十六年秋，和仲甫在南京見面。二十七年春，在漢口和國燾見面。回憶前塵，都有隔世之感。我們發起共產黨的時候，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惡化到變成流匪。作俑的人，實在是罪孽深重。」又說：「我現在想起來。真是對不住國家，對不住人民。國家弄到現在這樣危險惡劣的情形，我們不能單責軍隊和官僚，當時在嘉興南湖的小船中的幾個青年，也要負很大的責任的。」這種懺悔，應該是良知發現罷！

我們看周佛海筆底下的毛澤東，原不過是「探頭探腦」的毛手毛腳之流，至多也不過是在燈下用紅筆圈點亡國之君李後主詞的所謂「風流人物」。在中共一全代會後，他祇是湖南區委員會書記，到十二年六月，中共舉行三全代會，才當選中共中央委，及至十三年一月，國共合作，亦僅是國民黨候補中委而已。然而三十餘年來，他竟由井岡山打家劫舍的流匪頭領，進而躍登宰制大陸江山的秧歌王朝的寶座；在最近的

「鳴放運動」中，且更成爲投靠紅朝一羣自稱「小和尚」所要請教的「老和尚」。這些變化，就非抗戰勝利以後狹斃南京老虎橋獄中的周佛海所能意料得到的了！

五、初期的內爭

中共原是俄共的分店和翻版。一方面對黨外需要殘酷的鬥爭去奪取政權，一方面對黨內也利用不斷的人事磨擦和傾軋來爭奪領導權。在中共成立之初，即顯示內部意見紛歧，這就種下了後來凡是參預創黨的都紛紛脫黨的原因。陳公博就是當時參加中共一全代會首先表示不滿的一個，他曾詳細地指出：

「上海利用着暑假，要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廣東遂舉了我出席，這次大會給我的壞印象不少，大概我後來脫離共產黨，要以這次大會給我的惡劣的印象爲起因，而以仲甫和我的一重公案爲後果。」

「七月初旬，法專和高師都放了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轉上海。我們是住在大東旅館，各代表也有住在博文女學的，也有住在別處的。周佛海、李鶴鳴、李漢俊、張國燾、包惠僧，都在那時認識，而毛澤東則因爲在北大圖書館辦過事，可以說是比較熟的朋友。當時的代表大會，所謂共黨的南陳北李都沒有參加，爾時仲甫以主持廣東教育會的關係，且爲上海租界當局所注意，故未來滬，而李大劍尚主持北大圖書館，也未南來。短短會期四五日，使我發生極大的反感，其中有幾件事，最使我極端不滿。」

「第一件事就是開會地點問題，當日原議每日開會均須更換地點，以免注意。但一連四日都在李漢俊的貝勒路家內開會，我覺得有些詫異，那天恰恰早上張國燾來找我，我問他爲什麼與原議不符。他說李漢俊是有問題的，他的主張，不是列寧理論，而是柯茨基理論，他是黃色的，不是紅色的。我們在他家內開會，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們偏要在那裏開會。我聽了這句話，默然不答，心想：呵！原來如此！我以爲同志間應該相見以誠，相規以義才對。國燾這樣做法，簡直是和漢俊爲難，連同志的安全都不顧

，現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便有這些傾軋現象，以後惡果，可想而知。我看上海儼然分爲兩派，互相磨擦，互相傾軋，我心內冷然，參加大會的熱情，頓時冷至冰點，不由得起了待機而退的心事。

「第二件事，因爲張國燾去過短期俄國的關係，故推他做大會主席，國燾那時不免趾高氣揚；然而國燾那時是沒有主見的，一切都准俄國代表馬令和吳庭斯基的馬首是瞻，當時有兩件案子竟把我氣得差不多退席，一件是禁止共黨人員參加政治，甚至於不許當校長。我爭辯着，共產黨是應該鬥爭的，爲甚麼連校長都不可幹？國燾硬要通過，而多數居然贊成。可是到了第二晚開會，國燾提出取消昨夜的決議，我質問爲什麼大會通過的案子可以取消，他說是俄國代表的意見。我真氣極了，我說昨日我本來不贊成，而會內倒否決我的意思，今則議案通過，祇由一個俄人反對，又取消議案，這樣不必再開大會，祇由俄人發命令算了。這次衝突，兩俱不歡。

「第三件是通過宣言，內中對於孫先生和徐世昌（那時孫先生是廣東非常國會選出的臨時大總統，徐是北洋軍閥左右下的國會所選的大總統）相提並論，批評得一文不值。這一篇宣言，我根本反對，辯論很久，宣言終於通過了。我直急得跳起來，找佛海、漢俊商議補救的辦法，後來到最終會議，才提出一個折衝方案，將來這篇宣言應否發出，授權新任的書記決定。我回廣東之後，向仲甫先生痛陳利害，才決定不發。因此中共第一次大會的文獻，沒有宣言。不過當日共黨是祕密組織的，有無宣言，世間也不注意罷了！」

從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明瞭中共最初的幾個主要份子，自始即存着礙慮我詐的心理，而首先受到排擠的便是李漢俊，這個人後來於十六年冬武漢分共時，和詹大懋一起被殺於漢口。其次，中共原主張側重社會運動而不欲參加政治，但由於馬令和吳庭斯基之反對，一夕之間，竟推翻前案，可見其對第三國際和俄國主子的意旨，自始即養成不敢違拗的奴才根性。而尤其值得注意的，他們原打算繼續走「南聯陳炯明

，北聯吳佩孚」的路線的，故，希望寄生於國民黨中求發展。到下節，再為詳說。

至於陳公博所說與陳獨秀之張有所歧異而起。陳公博對這梧州，陳炯明下野退居惠州，秘書長，許崇智率了梁鴻楷、在攻廣西時任了總指揮，是時，那時形勢真可說是劍拔弩張，

「倏然仲甫先生又由滬來。仲甫又找着陳炯明的秘書黃人是有感情的，仲甫既由陳炯明仲甫對我說，他和居素不大熟，而以不同見陳炯明為條件。但起行（作者按：陳秋霖時任羣）「時間是記不起了，總在在船上過了一夜，早上到了惠州城內亂逛。……夕陽啣止，我

了。在船上仲甫告訴我，陳炯明不像下野的樣子，室內排滿了軍用地圖，桌上架滿了軍用電話，恐怕廣東不免有事，我聽了默然。居素和秋霖都目爲陳系的人，我在仲甫面前，不好表示什麼意見，更不好說什麼話。

「仲甫先生在同滬之前一日，約我在宣講所談話。他說廣東不久必有變故，我們應知有所適從，論道理是應當聯孫，論力量是應當聯陳，問我有什麼意見。仲甫先生到底是刺探的還是真要問我主張，我至今不敢判斷。但我正色對仲甫說：我們暫時不說道理和力量，孫先生到底是中國人，陳炯明縱然了不起，也祇是廣東一個人，何去何從，先生當知所擇。仲甫先生聽了我的話，默然一回，說我們看罷！」

「我看見廣東的緊張局面，更使我急於離開廣州，於是立即籌備赴美。……陳炯明終於叛變砲擊觀音山總統府，並通電請孫下野了！叛變那天上午，孫先生率了兵艦回泊白鵝潭，砲擊陳軍，這樣砲火連天的綿亙了數十日，孫先生遂回滬上，陳炯明扭捏了許久，才從惠州回廣州。……那時上海消息非常之消沉，平山雖然吊兒郎當，但聰明却不後人，和我商議要舉他赴滬探聽消息。趁早脫離這個是非之地，我自然聽他的話，開了一次會舉他爲廣州共黨代表赴滬（作者按：譚於四十五年四月病斃北平）。……在陳炯明叛變之後，我祇在報上得一個消息，說上海孫先生已派了許多委員籌備改組國民黨，陳仲甫是委員之一，其餘都不知道了。」

據海兩孤客的解放別錄說：那一次惠州秘密談話，陳獨秀是力勸陳炯明加入中共，領導華南發展，謂要幹不能全靠軍隊，必須以廣大的工人羣衆爲基礎。陳炯明則表示反對，認爲不能拿勞工做政治本錢，這惡風氣一開，往後將不可收拾，他所同意的，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那一套，因此雙方談得無結果，陳獨秀才快快而返，這是後來中共不堅持聯陳轉而聯孫的最大原因，但由於陳公博的態度格格不入，中共乃謂其有聯陳的嫌疑，調其赴滬，陳公博不肯接受，依然出國赴美，中共遂指其不聽命令，決議留黨

察看，而陳公博自己則說是從此聲明脫黨了。他說：「我候船出國，恰在這時張太雷啣了上海中共之命，並携仲甫先生手書來粵見我，希望我立刻離粵往上海，因為上海，盛傳我有幫助陳炯明的嫌疑。我看見仲甫的信，問張太雷是根據了甚麼證據，他說上海許多國民黨員都那樣說，而且香港的報紙也登載過。……張太雷又勸我，要留學何必去美國，何不去莫斯科，我的肝火已動了，我爲什麼要到美國的理由也不願再申說，祇說我聯陳不聯陳，陳仲甫應該知道，剛去上海的譚平山也應該知道，何以兩人知而不言，他們不止够不上做朋友，而且更够不上做人。至於我要到美國，也早在仲甫在粵時候決定，何以贊成於前，而阻撓於動身的俄頃，是不是跟我開玩笑，我一口拒絕了張太雷，祇託他帶一封信給仲甫，這封信長至千餘言，問他還記不記得他問我聯係或聯陳，問他還記不記得我的答覆，末後附帶罵平山，說我在廣東的行動是公開的，他對我是最知道清楚的，上海這樣無稽之言，爲什麼默無一語。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似這種賣友之人，逆做尋常的朋友都不配，還能論乎共同艱苦奮鬥。我聲明自今以後獨立行動，絕不受黨的羈束了，我也從此脫離共產黨了。」這是中共創始之初，於張國燾排擠李漢俊之後，又發生陳公博與陳獨秀、譚平山之間的裂痕，其勾心鬥角相互傾軋的情形，陳公博的自白，便是最好的證詞。

此外，周佛海還提到陳獨秀於第一次剛由粵回滬時，和馬令的齟齬，但沒有詳舉事實。祇說是：「不知爲一件什麼事，仲甫和馬令，雖然沒有見面，意見却不一致。仲甫是一條硬漢，一定要馬令認錯，纔肯見面，而馬令却不肯認錯。」「馬令託我帶一封信給仲甫，竟把第三國際代表的頭銜拿出來，信中對仲甫說：如果你是真的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命令。」適值上海租界捕房因注意陳獨秀的活動，一度將其拘捕（司時被捕者有邵力子、包惠僧、楊明齋等人），等他經人保釋出獄後，纔和馬令見面，大概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把他壓住，不由他不接受了。直到民國十六年武漢分共，中共舉行「八·七」會議於南昌，陳獨秀卒被指斥爲機會主義的領導，開始失勢，其總書記一職，由瞿秋白取而代之，譚平山亦被擯棄

是年十二月，廣州暴動失敗後，陳、譚均被開除黨籍，隨之而去者有劉仁靜、彭述之、高語罕、施存統、譚伯鈞等。十七年六月，瞿秋白領導兩湖秋收暴動失敗，又被指以盲動主義的罪名，由第三國際派遣向忠發、李立三回國主持中共中央，向任總書記，而實權則操之李手。十九年九月，李立三繼續領導暴動失敗，遂為反立三路線之陳紹禹，何夢雄追其下台，而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則在江西井崗山取得根據地，聲勢逐漸壯大。二十年六月，向忠發，何夢雄由於內部告密而被捕，陳紹禹乃得以控制中共中央，繼任總書記。其間中共最重大的內部鬥爭，為富田、贛陂二事變，其相互殘殺之慘酷，在農村及都市，有極駭人聽聞者（如兩人同住一室，翌晨房東只看見一死人，被五寸鋼釘釘死之類）。二十一年夏，陳紹禹至瑞金視察，為毛、朱所拘捕，由第三國際來電釋放，由中共中央改組，由秦邦憲負責。不久，秦亦失勢，毛澤東遂逐漸取得領導地位，經政府大軍五次圍剿，始於二十三年由江西流竄陝北，殘部所餘，不過五千人左右。照理說，中共自創始以來，內部不斷發生血淋淋的人事磨擦，到達陝北後，已經是日暮途窮了！然而政府由於日本的侵略東北，對於這僅有五千人的「窮寇」，却從二十三年底，即開始以政治方法來解決，（詳見「蘇俄在中國」第七三頁）這一下子，中共便從死亡邊緣復甦過來，終於「養癰貽患」到今天！

六、馬林的活動

前面提到中共成立後的政治策略，由聯陳而聯孫，希望寄生於國民黨中求發展，完全是俄國主子的意旨，換言之，也就是第三國際的命令。但第三國際為什麼有道一違反馬克斯主義原則的做法，則係採納奉命指導中共創立的馬林（G. Maring，即周佛海，陳公博所稱之馬令）這個人的建議。如果說：中共的成立，是「邪惡的種籽」在中國播種的開始，那麼，馬林之主張中共加入國民黨，就是為這些種籽們物色了一間氣候和暖適宜培育的溫室，以後中共的發展，便是由此逐漸繁殖推廣起來的。我們推究近三十年來大

動亂的主要關鍵，對於這樣一個陰鷲狠辣的國際特務，是應該來一次「鞭屍」的（按馬林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入尼德蘭時被殺）。

馬林是荷蘭人，原名 H. J. F. M. Sneevliet，陳公博譯稱斯里佛烈，鄭學稼先生譯為斯尼非立。他是荷蘭社會民主工黨的左派，於第一次歐戰前來到荷屬殖民地爪哇，組織「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於三寶壟，宣傳馬克斯主義，鼓吹階級鬥爭，他倚恃當時荷印最大政黨——回教聯盟，作為掩護活動的外圍組織，而在回教聯盟之內，大量吸收左傾份子，並利用它深入羣衆，建立基層力量，一面挑撥回教聯盟內部左右派分裂，儘量打擊右派，而使左派獲致領導地位。嗣後因左派策劃暴動，荷印政府乃將他驅逐出境。他先後在爪哇住了五年，憑其自身鬥爭的經驗，遂成爲第三國際遠東問題的權威者（詳見鄭著「馬林與兩個共產黨」，載民主評論三卷十八、十九兩期），民國十年春他以第三國際的民族及殖民地小組委員會秘書身份，奉命來華，協助中共組織成功，即赴各地游說（據說和吳佩孚也見過面），並去廣州，再至桂林，訪晤中山先生。他到廣州，首先提出國共合併問題，與各方面交換意見。陳公博對此曾有紀述：

「在仲甫離滬之後，第三國際的代表名叫斯里佛烈的偕着張繼先生自滬來粵。斯里佛烈化名西門 Dr. Simon 博士，他是一個荷蘭人，在爪哇宣傳共產而被當地政府放逐，故改派來中國負了代表第三國際的任務。張溥泉先生和他約在長堤的西濠酒店談話，提出國民黨共產黨合併問題，當時他們所談的還不是國民黨容共問題。大約這個問題是斯里佛烈和溥泉先生已經談過，並且有成議的。當日擔任翻譯的是張春木，後來改名爲張太雷，做了鮑羅廷的翻譯。他也是北大的學生，去過俄國，也是中共的委員，至十六年廣州共黨暴動時在戰爭中被我砲艦擊斃。他們問我的意思何如？我當時很詫異，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不是他們還要發宣言要反對孫先生的嗎？爲何變得那樣快！

「我不贊成這個提議，因爲我有我的理由：第一：國民黨的主義和共產黨的主義究竟不同，今日即合

，終久必分，與其將來分，倒不如各行其是，祇在黨外合作，第二：我尤其堅持我的意見，我先問合併之後共產黨是不是存在？他們說不解散，我說，共產黨既然不解散，則是黨員有了兩個上級機關。我承認國民黨是革命黨，共產黨也是革命黨，如果兩個上級機關有不同的命令時，黨員服從了國民黨即是對於共產黨叛黨，倘服從共產黨時即是對於國民黨叛黨。兩個黨是革命黨，叛黨即是反革命，叫黨員何以自處？當時我的立論完全從黨的主義和立場去辯論，却從未想到共產黨要加入國民黨實在是要吸收國民黨份子，和假着國民黨招牌來擴展共產黨活動的陰謀。假使當時我就知道的話，我也還是反對。因為我的主張以為一黨的革命就在於取得廣大羣衆的同情，光是用策略和陰謀，只是一種旁門左道，而非正當革命的方法。

「斯里佛烈雖然提出這個合併主張，却和我的辯論很少，他是比較沉着的，而且他還要去桂林見孫先生商議這個問題，在未有結果以前，他不大願意發表意見。但張溥泉先生呢，却非常熱烈的和我爭辯，他說國民黨已老朽了，須要增加新的血輪，所謂新血輪就是共產份子，而且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沒有什麼不同，現在列寧在蘇俄實行的新經濟政策就是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同是革命黨，則所發命令自然更不會不同，因之黨員也不會發生反黨和反革命的事實，我們辯論了兩個鐘頭，我還是堅持我的主張，這次辯論祇是私人間交換意見，當然沒有結論。末後斯里佛烈要我介紹見汪精衛先生，並在教育會會堂作一次公開演講，宣傳俄國革命後種種進步。過後他就跟着溥泉去桂林，回粵之後也不找我，逕自回滬。傳來的消息，他們此行，沒有什麼結果，焉知道當日熱心主張國共合併的張溥泉先生倒成爲後來元老派中的反共大將，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了！」

陳公博和馬林、張繼先生在廣州交換國共合併問題意見的時候，中山先生在桂林主持北伐，陳炯明尙未叛變。他本人也沒有和陳獨秀測驗，還是以純粹共產黨員身份，反對國共合併，並且說那時陳獨秀已離粵去滬。但鄧家彥先生說法微有不同，他說馬林應是馬丁Marling之誤，馬在廣州曾由陳獨秀介紹和陳炯

明見面後纔到桂林謁孫，也不是張繼先生陪去的。據鄧氏「馬丁謁總理實紀」云：

「民國十年總理統率北伐軍駐節桂林，十二月忽有荷蘭人馬丁者隨帶一中國青年來謁，聲稱奉第三國際使命，而此青年張其姓，春木其名，常熟人，實馬丁之通譯也（馬丁能操最流利之英語）。先是馬丁奉第三國際使命來華，專誠拜謁總理，乃行抵廣州，適總理已出發赴桂。於是陳獨秀介紹與陳炯明晤談。是時獨秀方以中共領袖滯留廣州，與炯明過從甚密。每欲利用炯明權勢以傾總理而陷國民黨，獨秀認爲臭味相投，不讓其偏向國民黨。同時且譏議國民黨如何腐化，而孫公如何空虛無力，以此聳恿馬丁接近炯明。詎意炯明頭腦頑固，與馬丁言論意旨互相乖迕。馬丁頗感失望，乃求護送赴桂，一識荊州爲快。」

可見馬林在廣州是作多邊性的試探活動的。除了他和汪精衛怎樣談話尙無文獻可考外，他看到張溥泉先生贊成國共合併的渾然天真，陳炯明那樣頑梗不化，陳獨秀一味走單線的聯陳排孫，陳公博又如此的認乎其真，可以想像他是暗中不免竊笑的。他原準備有中共加入國民黨的腹稿，不過是以國共合併作試探的幌子。但他所接觸到這一班人的政治智慧，都天生的帶着東方傳統的老實人的氣質，誰也不能了解他骨子裏的鬼打算，所以也就不便深談，少作辯論。至於他到桂林謁孫的經過，鄧氏也簡略的述及：

「馬丁旅桂僅三日，與總理會談約兩次，但總理一日萬幾，而馬丁又匆遽未能久留，其來華之目的：①認識革命黨；②交換意見；③聯絡感情。其任務雖似重要，而亦有伸縮性存焉，故彼此接談殊寥寥。總理第一次與馬丁談話，余適有事，未參加，其第二次則參加者不獨余一人，胡漢民、許崇智、陳少白、孫科、林雲陔、曹亞伯、朱卓文、皆是夕會議之重要人物也。當時馬丁宣布第三國際意旨，力促國民黨與之聯盟，可謂語重心長。總理顧謂黨人曰：諸同志亦有說乎？衆默然。總理於是鄭重答覆馬丁曰：蘇聯革命甫四載，其事蹟世罕能言者，文獻闕然，莫由聞知焉。吾儕革命黨人也，詎不同情革命？願革命之主義各國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扞格而不通，故共產黨之在蘇俄行之，而在中國則斷乎不能。况吾師次桂林，志

在北伐。今吳佩孚屯軍洞庭以逆我，吾奪洞庭闕武漢，直取長江，實侵英國勢力範圍。英知我聯俄，必力圖遏我，吾北伐之師，從此殆矣！爲安全計，今僅能與蘇聯作道義上之聯絡。一俟義師北指，直搗黃龍，再謀具體合作，未爲晚也。總理之爲是言，與其後對越飛互簽宣言，反對共產主義，詞嚴義正，天下莫不聞之，當時馬丁欲辯未能，欲求不得；翌晨沮喪頓首率其小共產黨離桂而去。」

依鄧先生這段敘述，馬林在桂並無結果，似乎還碰了釘子，但孫、馬談話，並非毫無影響，至少引起了國民黨「聯俄」的興趣。據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書中，謂「蘇聯專使馬林，訪謁總理。由是總理得知彼邦政情，心焉嚮往，聯俄之議以起。」（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以，馬林此行還是有收穫的。

馬林離桂，返至廣州。據鄒魯先生「中國國民黨史稿」有謂：「厥後馬林由桂抵粵，一視廣東情形，頗爲失望，彼以爲總理之實業計劃與俄之新經濟政策相類，固甚可爲中國革命前途之光，然對於廣東之陳炯明與國民黨組織宣傳之鬆懈，認爲不能負起實行之責任，並認陳炯明必與總理不相容。」馬林觀察當時廣州政局甚爲清楚，看穿了國民黨的弱點和中山先生「聯俄」的心情，愈益堅信以中共加入國民黨的主張，實現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他同俄覆命，分析中國政局，認爲聯陳聯吳都不如聯孫，以中山先生的革命紀錄，廣博的國際知識，對於社會主義理論的透澈了解，不僅是唯一的中國革命的領袖，而且是第三國際應該爭取的最理想的戰友。根據他在印尼鬥爭的經驗，主張仿照「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的黨員以私人名義加入「回教聯盟」的辦法，由中共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利用國民黨組織宣傳的鬆懈，對於中共的黨勢擴張和發展，更易於成功。這個說法，在第三國際發生很大的影響力量。後來，陳炯明於民國十一年六月叛孫，聯陳更不可能；吳佩孚於民國十二年二月使用武力鎮壓共黨策動之京漢鐵路工潮，並槍殺長辛店罷工工人，與吳關係亦告斷絕，這更證明馬林的見解正確，愈使第三國際重視他的意見。所以，中共之所

以能够在創黨後一二年即行壯大成長，站穩脚跟；以及近三十年來我們之所以嚐不盡的苦果，莫不由於馬林此一建議而來，我們怎能隨便把它健忘呢？

七、中共二全代會

民國十一年七月，中共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杭州，馬林再度來華參加，此時已取得第三國際同意，特提出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的辦法，陳獨秀等反對甚烈，以國民黨所代表者不只一個，而為許多階級；馬林則以為可藉國民黨吸收羣衆，並可拉攏其左派以拆散國民黨。最後乃以第三國際命令強其通過。

據周佛海所述陳獨秀給他的信說：「這是第三國際定的策略，令共產黨實行的。……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有兩個作用，第一、利用國民黨的招牌，發展共黨的實力，因為如拿着共產黨的招牌出來，一定到處碰釘子，因為人家一見共產黨三字，就會望而却步，拿國民黨的招牌，就可和各方面接近，拿國民黨的名義，做共產黨的工作，這便是第一個作用。第二、就是使國民黨共產化，因為共產黨員既取得國民黨黨員的資格，就可在國民黨內掌握黨權，操縱黨務，製造黨論，煽動黨員，而使國民黨漸變為共產黨。」其用心是够狠毒的。鄭學稼先生對此有詳細的說明：「一九二二年七月，馬林參加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所謂「西湖大會」中，中共接受馬林的建議：加入國民黨。依一九三五年馬林在荷告伊羅生（Harold R. Issacs，著有「中國革命之悲劇」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的話，他的真正目的，是利用國民黨的散鬆組織，供共黨活動——這是在荷印的經驗。他又對伊氏指出，當時中共的中委，大多數贊成。反對者的唯一的理由是懷疑國民黨的政治力量，可發展為羣衆運動，也就是並無後來之所謂「違反馬克斯主義的組織原則」的主張。馬林又說：中共首領陳獨秀是贊成者之一，但依陳氏後來的辯白，中共當時所以通過那提案，是馬林用共產國際紀律威脅的結果。馬林對這一點也有反駁。他告伊羅生，

當時他並未奉到莫斯科的特別訓令，如中共不服，可上訴於共產國際，究竟實情怎樣呢？馬、陳二人都已去世，無由作證。但……馬林決不敢自作主張要中共加入國民黨。……」

「又依共產國際歷史家的文獻，一九二二年西湖大會的參加者達林（Dalin），曾以俄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表資格向中山先生建議國共兩黨合併，被拒。但當年六月陳炯明叛變，八月九日孫大元帥離粵赴滬（十四日至滬），馬林大概於八月半後又會見中山先生。據說：馬林勸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因得廖仲愷附議被接收，但對於羣衆運動，仍未被重視，依伊羅生的話，中山先生注意的是俄援。可是有一點却屬事實，即在此次會談後，中山先生許中共黨員個別加入國民黨。談到俄援，似乎有了頭緒，因馬林本人曾主張，以武力奪回廣東。事後，馬林曾把這次談話的情況，報告第三國際。」

馬林第一次在桂林和中山先生談話，雖引起中山先生「聯俄」的嚮往，但「依共產國際史家的記載，馬林會勸中山先生改組黨，及從事民衆的工作，並未被採納。」（見鄭文）事實上早在中共未創黨以前，張西曼即於民國八年向中山先生有過同樣的建議，他說：「我爲提供中國革命方略上的改造起見，就着手將俄國共產黨綱擇要的節譯下來，並將俄國蘇維埃政權下所有黨政結構和各方民衆運動的方案詳加闡明（民十三以後國民黨的形式改造就利用了這些參考資料）。更利用民八正月俄國共產黨等組織號召於三月召開國際會議的機會（作者按：即第三國際第一次成立會），由海參威繞道大連秘密南來上海，謁見中山先生，建議以社會主義的內容改造中國革命的政黨，效法俄國共產黨建立廣大民衆基礎，民主集權制和嚴明的紀律，同時響應國際會議的號召，派遣富有時代政治學養的代表參加，共同策進消滅帝國主義和其走狗的偉大業績。祇以當時中山先生受了胡漢民、伍朝樞等頑固份子的蒙蔽，同時誤於帝國主義者反蘇宣傳的流毒，對於俄國蘇維埃政權堅強建立的信念還有問題，同時對於香港對廣州的威脅和日寇黑龍會操縱中國革命的陰謀以及其他內在障礙等等，依然有許多顧慮，不能直捷了當的解除，所以在「詳加考慮」的答

辭下將這時代的偉大改造任務臨時放棄。「張西曼因爲遊說沒有成功，遂開始策動「社會主義研究會」的組織。中山先生雖於是年一月十日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爲中國國民黨，但對黨的根本改組問題，也許因爲外交方面和內部意見尙有不同，以及對蘇俄亦尙未能遽加信任之故，迄未加以考慮。

一直到馬林二次和孫談話，已是陳炯明叛變之後，中山先生始接受馬林的意見，不僅允許「容共」，並且決心將黨改組，其目的自然是在爭取俄援。據張西曼追述，他在這時候也會再度向中山先生建議：「最後到了國父一手提拔的革命心腹陳炯明非常逆謀實現以後，我又利用了北京各大學的暑假趕到了上海，首先保證了個人祇求貫徹偉大革命導師救國救民的主張，絕對要糾正不肖黨人祇知破壞國家民族利益而爭權奪利的卑劣心理。……此次經過了嚴密的檢討，國父以陳炯明的變生肘腋，深切感到健全領導組織鞏固民衆基礎和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必要，於是正確的認識到在帝國主義的百年壓迫和加緊的環攻中，祇有效法當時土耳其和外蒙古，爭取國際的革命盟友蘇聯，共同奮鬥以求實現中國自由平等的偉大使命。關於這一着，國父雖曾在桂林接見過「社會主義研究會」介紹的蘇俄代表馬林，但是沒有任何決定。此次國父却下了最大決心，不但虛心參考了我所提供個人編譯的蘇俄黨政建構的各種資料，而且英明奠定了民十二三的改造機構，同時指示了用盡一切力量促進兩大革命國家領袖和民衆間相互認識與友誼以期收到「聯蘇決策」的豫期的偉大效果。」從張西曼所用的這些自我誇大和非常激動的字眼來看，可以知道左傾智識份子「親蘇」熱狂到如何程度。大概他向中山先生是從側面建議，馬林則是從正面交涉。中山先生當時自稱是「租界亡命客」（見十一年十一月致今總統蔣公書），他構衡中外形勢，熟計革命大業，於是始有心理上及決策上之重大轉變。然假如沒有陳炯明之背叛，或者陳雖背叛而英美日等國予中山先生以支援的話，也許「聯俄容共」政策，不致迅速見諸實行的。

中共二全代會既然決定了「以個別方式加入國民黨，利用國民黨的鬆散組織，以發展共黨宣傳及羣衆

活動」；是年八月，中共中央便決議接受這一原則，與國民黨為有組織之合作；十二年一月，更經第三國際執委會核准正式製成下列決議案：

「工人階級尚未強大起來，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一個大羣衆的黨，以應目前的需要，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議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決：中國共產黨合作，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

「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着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份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羣衆共產黨之基礎。」

「我們加入國民黨以後，……應注意阻止國民黨集全力於軍事行動，應使國民黨與蘇俄接近……。」
（見戴林 David Dalin 著俄國侵略遠東史）

蘇俄操縱下的第三國際策動中共滲入國民黨的寄生陰謀是這樣的惡毒；中山先生當時的感覺如何呢？此可於致今總統蔣公書中見之：「……兄前有志西圖，我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矣！現已大得其要領。然其中情形之複雜，事體之麻煩，悉較之福州情形（按蔣時在福州，任東路討賊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總司令為許崇智，負責改編入閩各軍），當過百十倍，此無怪吾國之志士，乘興而往彼都者，悉皆敗興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從此可日為接近。然根本之辦法，必在吾人稍有憑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所藉，則雖如吾國之青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同矣，亦奚能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勸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憑藉不可，欲得憑藉，則非恢復廣東不可。此次廣東一復，則西南必可統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數省為我憑藉，則大有辦法矣！……總之，十數年來，在今日為絕好之機會，吾人當要分途奮鬥，不可一時或息，庶不負先烈之犧牲，國人之期望也。」（見毛編「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詩日同前）第三國際及中共之決議如彼，而中山先生之認識如此。蓋俄人所以願助中山先生，即欲藉其

聲望取得廣東根據地，以便於中共之寄生。俄人復又以爲中山先生念茲在茲者，在如何迅速恢復廣東，取得憑藉；俄中共即運用此點以乘之，而遂其鬼域伎倆。我們試兩相對照，可知中山先生實在是以「君子之心」待人，對於俄中共未免過於淺視之了！

八、孫、越聯合宣言

中共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的所謂「國共合作」，馬林和中山先生所討論的祇是原則，涉及具體內容，則是由越飛（Adolf Joffe）來完成。當民國十一年八月十四日中山先生見遍於陳炯明由粵至滬時，蘇俄政府代表越飛已於十二日至北京，新潮社等十四文化團體會聯合設宴歡迎。迨越飛聞係至滬，即派人南下於是月二十五日訪晤中山先生，商量合作，中山先生遂於三十日專函邀約今總統蔣公來滬共商應付（時蔣在寧波），其函中有謂「某事近由其代表專人帶函來問遠東大局問題及解決之法，予已一一答之，從此彼此已通音訊，凡事當易商量矣。彼有一軍事隨員同行，已請彼先派此員來滬，以便詳詢軍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則當早來籌備一切。」（見毛編「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信內所稱之代表，即係指越飛而言的。

中山先生一面與越飛通函及其所派之專人進行商討，一面接受馬林之建議，積極準備國民黨之改組。其時，陳獨秀、李大釗亦因中共中央正式決定與國民黨合作，率先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九月六日中山先生指派丁維汾、茅祖權、覃振、張秋白、呂志伊、田桐、陳獨秀、管鵬、陳樹人等九人爲國民黨改組方略起草委員，旋丁、呂、田、覃赴京出席國會，改派葉楚傖、劉芷芬、孫科、彭素民繼任。至十二月十八日，宣言，黨綱，總章均告完成。十二年元旦，中山先生在滬發布國民黨改組宣言（胡漢民、汪精衛起草）。翌日召開黨員會議，宣佈黨綱及總章；並委任居正、孫洪伊、楊庶堪、廖仲愷、戴季陶、陳獨秀、

唐大悲等二十人爲參議；彭素民爲總務部長，林祖涵副；陳樹人爲黨務部長，孫鏡副；林業明爲財務部長，周佩箴副；葉楚傖爲宣傳部長，茅祖權副；張秋白爲交際部長，周頌西副；柏文蔚、呂超、蔣作賓、蔣中正、吳忠信等十三人爲軍事委員。此爲中山先生初步改組國民黨之大概。所可注意者，此項改組工作，陳獨秀不但參與起草改進方略，且以中共中央總書記身份就任國民黨參議一職，而著名共黨林祖涵，此時亦爲國民黨中央之重要幹部，是國共兩黨之合作應以此爲嚆矢了。

惟在中山先生初步改組國民黨期間，其對俄之折衝內情如何，尙乏公開文獻可考。觀於中山先生致蔣書中所說「情形之複雜，事體之麻煩」，可見其間是頗費唇舌的。十一年十一月，馬林回俄報告，並參加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陳獨秀也率領中共代表團前往出席。不久，第三國際執委會即決議有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但仍保持自身組織之命令。十二年一月十六日，越飛復自北京來滬，與中山先生直接談判。經過了十天的冗長討論，乃於是月二十六日發表聯合宣言；其要點爲：

- ① 共認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均不能施行於中國，俄願支持中國完成國家之統一與獨立。
- ② 俄願放棄帝俄時代對華之一切條約及強索之權利。
- ③ 中東鐵路之管理，由中俄協商解決。
- ④ 俄無意使外蒙脫離中國，孫亦不要求俄軍即時自外蒙撤退。

中山先生之所以與越飛聯名發表這項宣言的主要目的，是在公開取得蘇俄對中國不強行共產主義與蘇維埃制度的諾言，藉以表明其聯俄容共政策並非主張赤化的意念，以祛國人及其黨員們的疑慮，且可防杜後患。但我們知道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一向是重利害而輕信義，任何正式條約，也許在雙方國力相等時還有一點效用。斯拉夫民族素以詭詐反覆著名於世界，孫越私人之間的一紙諾言，如何能擋得住蘇俄沿着帝俄一脈相承而來的對華侵略？今天我們來看孫、越聯合宣言，當能了解蘇俄自始即是一大局。向來

容易吃虧上當的中國人，又繼李鴻章之後上了人家「幣重言甘」的暗算了！

孫、越聯合宣言發表後，中山先生「聯俄容共」的方針，大致確定；並趁越飛於一月二十八日離滬赴日本熱海養病之際，派廖仲愷陪往，繼續商討各項細節，（其實越飛至日，主要是勾結日本謀華，廖仲愷是毫未覺察的。）彼時適值陳公博正由粵赴美留學，道經橫濱，停留了三個月，（十一年十一月至十二年二月），因而曾參加過一次廖，越談話，他說：

「那時廖仲愷先生自上海來日，住在中國的公使館他的兄弟廖鳳齋先生那裏，不知道他怎樣知道我在橫濱，他派了一個中國的海員到橫濱華僑學校找我，要我到東京，和他見面。……見了廖先生之後，我遂回橫濱。一夜天氣很冷，忽然接到廖先生一封信，說希望我到熱海一行。……這次廖先生祇詢問我國共合作意見，我告訴他我和斯里佛烈、張溥泉談話經過，他沉吟了一下說，我們不妨和越飛談談。這時我才知道蘇俄駐華代表越飛也來了熱海。晚上三個人見了面，越飛告訴我蘇聯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實為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而且越飛更鄭重的說，中國祇有實行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絕不能行共產主義。我問越飛：蘇俄希望共產主義何時在俄實行？越飛只是搖頭不答。我問越飛：六十年共產主義在俄會實現嗎？越飛倒很老實，說還是一個疑問。廖先生很滑稽的笑着說：「公博，你還有什麼話說，我們要做革命黨也要做現在的革命黨，不要做一百年後的革命黨，我們努力實行三民主義，不必再討論了！」廖先生這幾句話倒使我非常感動。不過我撇開國共的問題不談，我表示我祇能做一個黨的黨員，不能做兩個黨的黨員，因為我的性格，既然不愛騙人也不愛騙自己。我回橫濱之後，在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二日附美國總統號赴美。」

越飛對廖陳所說他也懷疑共產主義能否於六十年內實行於蘇俄的一番話，是為他在孫、越聯合宣言中決不強行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於中國的保證作一註腳。換句話說，既是共產主義何時能在蘇俄行得通，連

他尚不敢肯定，自更談不上中國，你們大可放心！這可以說是一種外交辭令，但也未嘗不是真話，因為直到今天，蘇俄是否實行的共產主義，也還是問題。陳公博在這次談話中，依然堅持一個人不能有兩重黨籍的見解，中共中央便藉口他不服從命令，從留黨察看的處分，進而開除他的黨籍了，可是他在十四年回國以後，在政治派系上始終站在汪精衛的一邊，成爲革命時代的風雲人物，也是所謂「改組派」的有名大將，一直至抗戰勝利後在蘇州伏法，以身殉汪時止，他會不斷洗刷他身上所染的紅色污點，但無論如何，他之爲國民黨的左派，還是爲一般人所熟知的。

廖仲愷和越飛在熱海所商量的細節，事涉秘密，非世人所得而知，但是從民國十五年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汪精衛所作的政治報告中，不難略窺其崖略，汪的報告說：

「彼此在熱海同住了一月，此時東方人不知道的許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詳：如俄國之現狀，俄國對東方被壓迫民族之態度，與俄國何以想跟中國携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所以……廖同志由東京回廣州，幫助總理做「聯俄」工作，當時許多同志懷疑，而廖同志却勇敢堅決地去幹，……因有一個月之久，和越飛互相辯論，把各種問題通通研究過了，由此總理與蘇俄的關係更日深一日了！是年（十二年）夏間，總理更派蔣中正同志赴俄。蔣同志到莫斯科時，列寧已經病重，但也見過托洛斯基諸人，經過一番切實考察，知道紅軍的組織，共產黨森嚴的紀律，遂爲日後回國改組本黨創建黨軍之一大動機。總理從此便決定與俄携手，共同奮鬥，程度又更進一步。蘇俄也決定，要幫助東方民族革命，即非幫助本黨不可，因此才派鮑羅廷先生到廣東來。……鮑羅廷先生到粵後，與總理商量了許久，才決定改組本黨，因此才有十三年一月本黨改組之事。」

這一連串的事實，都是廖、越密談以後逐漸見諸實行的。當廖仲愷由日回國覆命之時，中山先生已因滇桂軍擊退陳炯明，收復廣州，乃於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返粵，設大元帥府；三月二日，組織大本營，下

分外交、內政、財政、建設四部；法制、審計二局；參謀、秘書二處；中山先生以大元帥名義統率一切，惟陳炯明尙盤踞東江一帶，並未肅清，隨時待機而動。這時候，國共合作的機運，已完全成熟，一切問題均告解決，中山先生遂一意致力於「聯俄容共」政策的實現；而中共復於是年六月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正式通過遵循莫斯科指示的路線，並宣言承認國民黨爲國民革命的主力，積極與國民黨合作，俾成爲一廣大羣衆的政黨；第三國際且命令中共加強力量，要求國民黨支持勞工運動，贊助土地革命。至隸屬於中共之社會主義青年團（十四年二月，改稱爲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亦議決加入國民黨後仍保持該團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份子，逐漸擴大組織，奠立強大羣衆基礎。迨至八月，鮑羅廷（Michael Borodin 原名 Gruzenberg）由俄至粵，中山先生聘爲政治顧問。於是中共挾其方張之勢，益以鮑羅廷左右黨政的權力，更倚恃第三國際及蘇俄爲奧援，以全力滲進國民黨，由升堂而入室，由走私而公開，駸駸然有喧賓奪主之勢了！

作者按：越飛於十一年八月來華，九月初赴長春出席日俄會議，十月初與北京政府外交部作初次接觸，表示將依蘇俄政府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〇年兩次宣言的精神與原則（即放棄帝俄時代一切條約及特權），討論兩國間有關問題。十一月六日，越飛又以節略遞送北京外部，謂「中東鐵路係西伯利亞鐵路之一部分」，並非無條件交還中國，毫不索償。北京政府以蘇俄自食前言，未予理會，至是越飛企圖召開之中俄會議，遂告失敗。十二年一月，越飛始扶病南下至滬與中山先生談判，而有孫、越聯合宣言之發表，嗣後中山先生復派廖仲愷陪同越飛赴日療疾，密商一切。惟據毛編「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書中所述，謂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總理初會蘇俄代表越飛。」又謂「十月四日，越飛赴日本熱海，廖仲愷奉命偕往，日與縱談中外大勢，暨革命策略。」其時日與一般記載不同。或者越飛曾兩次赴日，廖仲愷均曾偕往亦未可知，茲一併錄出，以待研證。

九、聯俄容共之決心

鮑羅廷抵粵後，積極督促國民黨實行改組，中山先生遂於十月二十五日委任鄧澤如、林森、廖仲愷、譚平山、陳樹人、孫科、許崇清、謝英伯、楊庶堪九人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林直勉、謝良牧、徐蘇中、林雲陔、馮自由五人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依照上年改進之初旨，進而為澈底之改組，並籌備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俾能容納共產份子，共同合作。據半粟著中國六十年大事紀載：「國民黨決定根本改組方針：①國民黨的組織須採用共產黨的組織方法，加以改變；②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黨綱，對於與共產主義相通之民生主義，尤須特別注意；③容納共產黨員。以此根本方針，特設國民黨改組籌備處，命馮自由（右派）譚平山（左派，以國民黨員而加入共產黨者）作成改組案。」至是國民黨之改組遂由醞釀而漸臻於實行階段！

先是中山先生「聯俄容共」之決策既定，黨內一部份老同志，即共產黨人所指稱之國民黨右派者，頗以蘇俄及中共之動機及用心，表示疑懼，尤其對於陳獨秀，在他主持廣東教育委員會時粵人即盛傳其提倡共產公妻，並主張「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之說，甚至改其名為「陳毒獸」，已見其為輿情所不滿。至是益感中山先生澈底改組國民黨之積極，以為完全出於鮑羅廷及陳獨秀之策動，深覺惴惴不安，因此，鄧澤如，林直勉等十一人乃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向中山先生提出檢舉鮑、陳之陰謀，有謂：

「竊以本黨改組，其動機雖出自我總理之乾綱獨斷，惟組織法及黨章黨綱等草案，實多出俄人鮑羅廷之指揮。然此表面文章，尚無大害。惟探聞俄人替我黨訂定之改組政策，全為陳獨秀之共產黨所議定。陳與蘇俄，本有密切之關係，其所組織之共產黨，為蘇俄政府所給養，此回改組，陳獨秀因粵人對伊感情太壞，乃避去，而以其黨徒譚平山出而任事，陳獨秀則在暗中牽線，內裏之陰謀，經為其黨徒范體仁因爭權

利而衝突，遂向國會議員徐清和詳細陳述。茲謹轉述徐議員之言，又他方面探得者，密報於我總理，以免令外人弄我如傀儡，此爲黨員等天職所在，勢難容已，非敢反對此回改組也。黨員等自問愛黨愛國，斷不減於陳獨秀，亦當爲總理信其無他也。

「此回共產黨合作之動機，發生於莫斯科第三國際大會之後，其表面宣佈者，則謂對於資本主義成熟之國家，則鼓吹階級鬥爭，促成社會革命，對於資本主義幼稚之國家，則主張聯合工農及中產階級，以完成民主革命。近東則協助土耳其，遠東則協助我國。果然如此，亦未嘗非友邦之好意，不虞陳獨秀之共產黨則利用此機會而利用我黨矣！陳獨秀本爲陳逆炯明特別賞識之人，曾自言「寧死不加入國民黨」，且嘗在學界倡言，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絕無學理的根據，指斥我黨爲落伍的政黨，總理爲過時的人物。今竟率其黨徒，羣然來歸，識者早知其別有懷抱，黨員等致疑者久矣！今已探得其利用方法。

「陳獨秀此次加入吾黨，乃有系統的有組織的加入。當未加入之先，曾在北方某地（似是海參崴）開大會議，決定利用我黨之方法。其大前提，則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其方略：（甲）則使我黨叢國際之仇怨；（乙）則使吾黨在國內斷絕實力派之援助；乃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爲標語。夫此二標語，實堂堂正正，無可非議者，然運用製爲具體政綱（如政綱草案之一二兩條，即陰謀所在），宣示世界，則我黨永無獲得國際上同情之一日，使我華僑黨人在海外無復立足之餘地。我黨對於軍閥之攻擊，祇限定於曹錕、吳佩孚；今陳獨秀派替我黨宣言，則連及於張作霖、段祺瑞；務使國中實力派因此而與我黨決裂，使我黨陷於孤立無援之地，此陳獨秀共產黨對於我黨陰謀之綱領也。

「查陳獨秀受蘇聯給養，組織共產黨之後，自知其共產黨人少力微，不能活動，其初乃依附吳佩孚，日頌吳佩孚之功德，指吳爲社會主義實行家，無恥之言，爲國人所共聞。至今年三月，京漢工潮發生，吳佩孚殘殺工人之慘劇出現，陳獨秀利用吳佩孚之假面具，乃遭揭破，因此轉而利用我黨益急，入寇亦益深

。故此次改組，陳獨秀實欲藉俄人之力，聳動我總理，於有意無意之間，使我黨隱為彼共產黨所指揮，成則共產黨享其福，敗則吾黨取其禍。又黨章草案，定總理一職為選舉職，竊恐事實隨環境變遷，五年之後，將見陳獨秀被選為總理矣！我黨無形消滅，即在此時，思之實為寒心！

「抑尤有進者，本黨向用委任之制，各局部首領之智愚賢不肖，由總理審定而別擇之，以大公無我之心，自收用當其材之效。今一變而為普通選舉之制。嘗見本黨人數眾多，品類不一，選舉運用，偶有不明，即易為奸人所利用。即如此次組織各區分部，陳獨秀之黨徒譚平山，曾預先搜羅去年請大總統下野之逆徒，使之改名，介紹入黨。迨至區分部選舉之先，乃預約其徒輩選之為委員。有此事實的證明，可知本黨試行選舉制之初期，即發生為奸人利用選舉之弊病，推其流弊之所至，他日選舉一省之執行委員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亦何難再施其伎倆，以愚弄黨人……要之，奸人謀毀吾黨，其計其毒，不可不防。」

這一檢舉報告，是國民黨老黨員們在未改組前的反共第一聲！其對中共陰謀可說已有相當清楚的認識。他們並不反對國民黨改組，但共產黨利用改組以謀篡奪的詭計，却不可不提高警覺。他們也并不反對聯俄，但唯恐因聯俄而使國民黨之勢為共產黨篡奪，則不可不早為提防。後來陳獨秀之不能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當選為中委，大概受這次檢舉的影響很大。可是中山先生對這個檢舉報告的批示，却說：「俄國革命之初，不過行民權、民生二主義而已，及後與列強奮鬥六年，乃始知其用力之最大者，實為對於民族主義；乃中國少年學生自以為是，及一時崇拜俄國革命之過當態度，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獨得俄國援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乃俄國革命黨……要彼等參加國民黨與我一致動作，且又為我曉諭之，謂民族主義正這時救時之良藥，並非過去之遺物，故彼等亦多覺悟而參加吾黨。……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蓋中山先生認為中共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他

必能以民族主義的愛國觀念去感化這批盲從蘇俄的青年，不致越出常軌，從事搗亂，必須等到「如不服從吾黨」時，然後才「我亦必棄之」，可見中山先生當時是具有控制這一局勢的最大信心的。

及至是年十二月十五日今總統蔣公自俄回抵上海，曾以對俄及黨務軍事意見上書中山先生，惟原書似未刊布，故世人莫知其詳。其後，於十三年三月十四日致書廖仲愷，述其在俄考察意見，有謂：「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祇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敬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如中國共產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本身已完全成爲一俄奴矣。……黨中特派一人赴俄，費時半年，費金萬餘，不可不為鄭重其事。而於弟之見聞報告，毫無省察之價值，此弟當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掃地，亦應引咎自辭也。」其觀察俄共之深刻，日後殆無不應驗，惜乎當時中山先生祇注重蘇俄紅軍組織及共產黨紀律之嚴密，決心引為師法，對蘇俄之包藏禍心，中共之陰謀篡奪，雖進言者有人，而均不之信，致令總統蔣公之考察見聞報告，亦未加省察，遂使俄共得以偽善面目售其奸計。追溯三十年來中國動亂之主因，實不能不致慨於聯俄容共之絕大失策也。

十、「國共合作」的實現

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代表總額一九六人，出席代表一六

五人，其中著名之共黨代表有陳獨秀、于樹德、李守常、譚平山（以上由中山先生指定）、林祖涵、夏曦、毛澤東、胡公冕、宣中華、韓麟符、劉芬、（以上由地區選出）等。中山先生經指派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李守常爲主席團。當大會進行期間，蘇俄駐北京大使加拉罕（Leo Narkhed）來電致賀，由大會表決覆電申謝；繼而接獲列寧逝世消息，又由大會表決致電莫斯科悼唁，並休會三日誌哀。大會於一月三十日閉幕。關於一人不能同時兼爲兩黨黨員的「跨黨」問題，曾經有所爭辯。李大劍代表共產份子特別聲明他們加入國民黨乃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資格加入國民革命事業，服從國民黨主義，遵守國民黨章程，絕非欲將國民黨化爲共產黨。希望國民黨的先輩諸同志，不必對他們發生疑猜和防制。因爲「聯俄容共」政策醞釀了一年多，已成定局，再經過李大劍這一番解釋之後，所謂「國共合作」，就從此正式開始了！

在這次大會中，共產份子經中山先生提名通過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候補執委十七人；中央監察委員五人，候補監委五人；共產黨員當選執委者，有李守常、譚平山、于樹德等；當選候補執委者，有林祖涵、毛澤東、于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六人，而擔任中央黨部要職的，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祖涵。其他部門，由共產份子擔任秘書隱操其實權者亦不少。因此，不待共產「思想走私」，即已升堂入室了！當時他們跋扈的情形，鄒魯回顧錄中說得最爲明白。他說：

「共產黨加入本黨之後，却假借本黨名義，擴展該黨的勢力。所有行動和言論，都違反他們的最初諾言。組織部是黨中最重要的機關，由共產黨的譚某（平山）主持，本黨一切的組織章程，由他擬訂；各地組織方面的人員，由他委派；而各地黨務的籌備員，有共產黨的就派，沒有共產黨的竟不派；並且派出去的人員，祇收容共產黨和接近共產黨的人，弄到本黨的忠實黨員，都不願登記，普通人入黨，更被拒絕。這種事情，各地常常發生。中央黨部得到這個消息，會由委員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中，屢次提出，因爲

這事屬於組織部的職權範圍，當然交組織部查辦，但組織部概以「一擱」字了之。共產黨的人數不多，各地可派的人，事實上很少，所以各地能够成立黨部，爲數寥寥。……在這種情形下，共產黨便設立講習所，宣傳所等等，以造成牠的爪牙。

「在工人部方面，部長是廖仲愷先生，而他的秘書是共產黨的馮菊坡，當時廖先生身兼十三職，因爲容共的關係，他總想得到共產黨的同情，所以一切部務，都由他的秘書主持，操縱情形，千奇百怪。那時各部都設在中央黨部之內，工人部竟在門口貼了一張「非工人部中人，不准入內」的字條，跋扈情形，可見一斑。

「農民部部長初爲共產黨員林祖涵，繼爲彭素民同志，而他的秘書彭湃，則爲共產黨員。一切部務，都爲彭湃所把持。彭素民同志逝世後，黃居素同志繼任。彭湃公然說：「若非就我範圍，則不能居此部長職」。因此，黃同志請免彭湃職，但結果黃去而彭留。後來廖先生兼農民部部長職，彭湃更把持一切。該部欲設農民講習所，突然提出黨部，通過招生，數日後即舉行考試，閱卷時祇看卷面名字，凡非共產黨的人，悉予棄置。

「婦女部初設時，部長爲廖冰筠先生，秘書爲唐允恭先生，均係本黨黨員。副部長爲何香凝先生，共產黨遂有滲入，其時提出結婚離婚絕對自由的口號，風狂一時。……」

當時鄒魯先生是任青年部長，他曾秘密叫廣州各校員生組織黨團，及女權運動會，民社、民權社等外圍團體，以對抗共產分子所組織的「新學生社」，並不斷的派人加入共產黨，去偵察他們的情形。因此，鄒先生說：「共產黨在廣東大學及其他青年界，都沒有方法醞釀重大的事情」。他又說：「海外部長林森先生，當時鮑羅廷蔑視華僑說他們是亡命之徒，國家不應予以保護，便不注意該部，因此未被設法奪取。」此外宣傳部長是戴季陶，他任職未及半載即於是年六月二十八日爲共產黨幹部排擠去粵。這一位自願以

交易所贏餘幫忙中共創黨經費的同情者，共產黨竟反臉不認帳了！

中共參加國民黨改組以後，聲勢是咄咄逼人的，手法也是毫無忌憚的，與李大釗在大會的聲明，正好成爲言行絕不一致的強烈對照，其猙獰的本來面目，是業已完全暴露了的。然而中山先生對於這些並不十分措意，他所注重的是決不能久困於廣州一隅，必須急求繼續北伐以打開出路，而根本的辦法，則在如何編練黨軍以負起國民革命的任務。因此，他對於蘇俄紅軍的組織及俄共以黨控軍的嚴密，頗深嚮往，且決心引爲師法。在全國代表大會進行期間，他就指定今總統蔣公負責籌備黃埔軍校，其時蔣公甫自蘇俄考察軍事黨務回滬。最初苦於經費尙無的數，往復磋商，斂費苦心。後來廖仲愷致電蔣公，有「軍校欸，弟不問支出，兄亦不問來源，經費不乏，儘可安心辦去」之語，軍校遂於是年六月十六日正式成立，中山先生特命蔣公爲校長，廖仲愷爲黨代表。據海隅孤客的解放別錄說：「陳炯明殘部雖尙盤踞東江，廣州中樞已得而活動，中心工作建軍，連類而及的是籌餉。那期間，廣州市面突有大批俄國煤油出售，商人據以獲利，市民樂於購用，却不明其所自來，亦無人究問其所自來。道路相傳，煤油餘利，約等於吳鐵城長公安局，奉命抽收全市房屋租捐兩個月之數，黃埔軍校於焉成立。」這些話，別無其他資料足資佐證，祇好存諸疑信之間了！

當時英帝國之香港政府近在咫尺，對於中山先生之積極「聯俄」，甚爲嫉視，遂陰助廣州商團於九月十四日私運入口槍械九千餘枝，以謀叛亂，中山先生事先得訊，下令緝獲，於是廣州商店發生罷市風潮，中山先生乃移大本營於韶關，親自指揮北伐軍事，而以胡漢民爲代理大元帥，留守廣州。不久，俄授之第一批軍械，包括山砲，野砲，長短槍枝，輕重機關槍，及各種彈藥等，即由俄艦運送抵粵，軍校員生特舉行大會以歡迎之。據毛編「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書中記載：「十月七日，俄艦運械抵埔，即時起卸，艦長詣軍校來謁，公往答之。」中山先生復自韶關致書蔣公，謂：「俄船已來過此地，以後再來當更

容易。如我確有可靠之兵，要槍來用，以後不成問題。此頭一批之械，不過到來一試耳！此後祇要問我有人耳，必可源源接濟也。」蓋此時「聯俄」已獲實效，以後俄援自可繼續供應，中山先生之愉悅，是情見乎詞的。

運械俄艦於十一月十一日啓旋離粵，軍校員生及軍樂隊，均至碼頭歡送。越兩日，中山先生亦應段祺瑞、馮玉祥電邀，自粵起程北上。時北方直奉戰爭因馮之倒戈，曹錕被囚，吳佩孚下臺，政局發生變化，段特派許世英來粵，迎孫蒞京，解決國是。中山先生初擬乘俄艦赴莫斯科，至是中止。據劉成禺「先總理舊德錄」，曾紀其與中山先生有關此事之談話情形：「中山曰：予本於九月十八日乘黃埔所泊俄羅斯號船赴海參威，由西伯利亞轉俄京，今中國有改革機會，予可中止俄羅斯之行矣！成禺曰：先生是何言也？中山曰：汝尙未知之耶？鮑顧問（羅廷）廖仲愷兩人勸予曰：俄國自列寧死後，黨事紛歧，領袖無人，以共產黨全體加入國民黨之故，甚願先生走莫斯科一行，則主持有人。以先生威望名德，必能安定共產黨事。對於中國西北東北外蒙古一帶，俄國當竭其全力，輔助經營中國。予思一隅調處，終難發展；而英美日外交不能爲友，且常爲敵，予甚以此說爲是。俄京要電屢至，且派船來迎。今俊仁（許世英字）與汝挾各方書來，中國即有大故，且可行吾所抱政策，何必多此蘇俄之行，吾意決矣！成禺曰：予有一言，若先生赴蘇俄，則吾王不復返矣！鮑羅廷聞仲愷譯言，怒目視成禺。後漢民自莫斯科歸（作者按：胡於十四年九月因涉嫌廖案被遣赴俄，十五年四月回粵，旋去滬。）謂成禺曰：汝言誠不謬也！俄人欲致先生於莫斯科，居先生於尼可拉斯宮，以先生名義，號令中國國民黨，挾天子以令諸侯，此策不成，尼可拉斯宮乃爲我居，我能獲返，吾蓋非王也！」按鮑羅廷傳達莫斯科意旨邀請中山先生訪俄一事，在「蘇俄在中國」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二節中亦有述及，此則根據國民黨老黨員劉成禺的紀錄。劉氏之言，或稍戲劇化，所記時日，亦不免有誤，然俄共曾有一種「俘虜」中山先生之陰謀，則係事實。幸而中國國內政局劇變，這個惡毒的

陰謀，才告吹了！

中山先生北上抵京，不久即因病於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時段祺瑞已再起執政，而馮玉祥系之國民軍則爲一新興崛起之軍事勢力，蘇俄駐北京政府大使加拉罕至誓之爲「中國解放運動柱石」，對馮刻意聯絡，李大劍及國民黨左派徐謙等均受命前往活動，蘇俄且會派遣一包括三十六名軍事政治人員的顧問團於十四年四月至張家口加入馮軍工作，同時又陸續運到價值六百萬盧布的軍火，並供給大宗款項，爲馮軍設立騎兵砲兵軍事政治學校，藉使馮軍增加戰鬥能力。前面所提到那個白俄特務布魯威，就是北京俄使館經常派駐馮軍的聯絡員（見毛以亨；俄蒙回憶錄，譯作保路衛（Borovy））。這是俄共於利用吳佩孚，陳炯明失敗之後，仍繼續着南北併進的策略，在廣東之外佈置了一個北方據點。從此，馮玉祥也搭上「聯俄」「聯共」的路線，他的左右和部下也有不少共產或準共產份子滲進去。以後他爲奉直兩系聯合壓迫下野，親自入俄乞援，以至十五年九月五原誓師，參加國民革命，都是由此淵源而來的。

最使人驚詫的，就是當時從南到北都瀰漫着一股崇拜蘇俄的流行空氣，一般患着「左傾幼稚病」的智識份子，軍人，政客，以及膚淺浮動的青年，都迷惑於蘇俄乃是「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教條，沉醉於「國共合作」的未來美景，大家都懵然不覺其骨子裏實包藏着侵略中國的極大野心；而共產黨人及左傾份子，除了對於國民黨的「右派」，予以不斷的無情打擊外，凡是對「聯俄容共」表示懷疑不肯隨便附和的任何個人，以及提倡國家主義，主張「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并且自始即堅決反共反俄的中國青年黨，更多方譏之爲落伍頑固，或者任意給他們戴上一頂「反革命」的帽子，污蔑誣陷，無所不至。遂致舉世風靡若狂，沒有什麼黑白是非可說！現在想起來，真是自種惡因，自食其果，一切咎由自取，我們能怨天尤人嗎？

十一、西山會議派之反共

當中國國民黨未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堅決主張反共反俄之中國青年黨，已於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在巴黎創立，該黨創黨領導人會琦（慕韓）、李璜（幼樵）、李不懋（蔭儂）等，時與留法之中共黨人周恩來、徐特立，任卓宣等作言論文字及行動上的抗爭，及聞中山先生容許共產黨跨入國民黨，會慕韓先生即於巴黎先聲週報著論警告國民黨。蓋以國共兩黨之主義、目的、政策、手段各有不同，決無法混合爲一黨，依據政黨政治之原則，斷其必無良好之結果。既而慕韓先生發現一九二三年共產黨對國民黨之秘密議決案，益覺共產黨之陰險毒辣，決非國民黨所能敵，乃於十三年七月自法回國，十月在滬創刊醒獅週報，開始發展黨務於全國各地，復屢次公開忠告國民黨人，宜早取斷然處置，以救黨而救國。然國民黨人不惟不納忠言，反對青年黨人有所誤會，竟任共產黨以國民黨之名義對國家主義者施行種種無理之壓迫。凡此及身所受之痛苦，具有三十年歷史之青年黨同志，類能言之。

據慕韓先生手訂年譜（民國十三年）云：「是年冬，孫中山先生北上過滬，予會謁之莫利愛路，勸其中止聯俄容共，中山固執己見，予亦當仁不讓，辯論久之，不歡而散。先是予在法發覺共產黨之陰謀，載於一九二三年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予曾以語王寵惠、蔡元培、鄭毓秀等，囑其轉告中山，王等皆不以爲意。適謝持之婿曹任遠自德返國過法，予乃囑其歸告謝持。謝持聞而大憤，遂邀張繼赴粵告密，不意反遭中山申斥。謝回滬，辦護黨特刊，對於容共，力持異議。及予歸國，乃約定內外夾攻。予與中山晤面，亦由謝介紹也。」按張謝赴粵彈劾共產黨，在張氏回憶錄中亦有述及，謂「十三年（一九二四）七月，余偕慧生赴廣州，與鄧澤如檢舉本黨之共產份子，另有與鮑羅廷談話之單行本可查。未檢舉之先，問介公遊俄所得，伊亦贊成余等之質問。介公屬余居長堤黃埔軍校辦事處樓上。與總理談此事，甚不悅

。惟總理目已發紅，久不退，余已不忍多辯，不久返滬。」按國民黨於十三年一月改組完成後，國共雙方，似乎水乳交融，頗有一番新氣象，但未及半載，國民黨廣州市黨部執行委員孫科，黃季陸等，便於六月一日提案中央黨部請制裁共產黨（內容不詳）。及至七月間，鄧澤如、張繼、謝持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身份，根據共產黨陰謀妨害國民黨之議決案，提出彈劾。其重要資料，即係會慕韓先生在法國設法取得者。故鄧、張、謝之彈劾共黨，曾先生之間接推動，實與有力焉！至彈劾案全文，且載張溥泉先生全集中，其列舉之文件，摘要如下：

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決議案：「本團團員加入國民黨，當受本團各級執行委員會之指揮。但本團各級執行委員會，當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及其各級執行委員會對於團員加入國民黨問題之種種指揮。本團團員在國民黨中：①應贊助中國共產黨之主張，與其言語行動完全一致；②本團應保存本團獨立的嚴密的組織。」

②中共擴大委員會關於北京報告決議案：「我們加入國民黨合作，要注意下層切實的工作，宜極力避免無益的競爭。我們於國民黨中高級機關位置之競爭，對內既易發生不良之影響，對外又引起其他團體的反動。於不十分妨害本團活動之內，應採取容讓的態度，而致全力於區分部或市黨部等切實工作。對於國民黨下面的各種團體，我們同志應注意聯絡其感情，非必要時，不宜取敵視態度。」

③中共中央第二次全體會議決議案：「本黨以後一切宣傳出版，人民組織，及其他實際運動，均應用國民黨名義，歸為國民黨的工作。因此：①可減省人力財力；②可使國民黨易於發展；③可使各種努力的聲勢與功效比較擴大而且集中。但對於我們所認為必要事項，而國民黨不願用其名義活動的，仍作為本黨的獨立活動。」

中山先生對於中共這些證據確鑿的篡奪陰謀，仍是以恢闊廓大的度量包容他們，自信綽有餘數這批共

產份子的餘裕，曾有「我在一天，共產黨必不敢跋扈」的豪語。因而檢舉案也好，制裁案也好，彈劾案也好，但不足以動搖中山先生容共的堅強意志。但他畢竟沒有想到自己剛剛在實施「聯俄容共」政策一年之後，就會於十四年三月撒手人間，雲天永隔了！他更沒有想到他逝世僅八個月，鄒魯、林森、謝持、居正、張繼、覃振、沈定一等，即在其西山靈前舉行會議，開始反共，而使黨的內部發生重大的分裂了！

參加西山會議諸人，世皆稱之爲國民黨的右派，這本是共產黨一種離間策略。曾慕韓先生對此也會加以說明，有謂：「離間者，所以使內部動搖，團體瓦解者也。其法或爲毀其領袖之信用，或爲挑其同志之感情，從而爲之強分派別，使其互相爭鬥。如國民黨中之左右派，即共產黨所硬造而弄假成真者也。其意以左派代表「新」，右派代表「舊」，左派代表「善」，右派代表「惡」。使青年之喜新向善者，自然趨左而陷於窠內，入其彀中，其爲計不亦狡哉！聞之鄒海濱君言：俄人鮑羅廷最善於運用離間政策。當孫中山先生之北上也，胡漢民被命代理大元帥，未幾而中山薨於京，胡氏權攝如故。鮑氏欲離間國民黨領袖之感情，遂慫恿胡氏力謀集權。其言曰：「一黨不可無首領，中山既死，君即國民黨唯一之首領，不可使大權旁落，諸事掣肘。」胡氏極然其說，稍稍從事集權，而領袖間之誤會以起，感情日惡，胡氏卒不安於位，而被放於俄。汪精衛繼胡主政，鮑又以說胡者說汪，汪亦不能無惑，竟以一身兼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兩主席，其權幾與中山之大元帥相等，由是日與蔣介石齟齬，因中山繼見疑而出奔於外。蔣介石繼汪主政，鮑復以其說進。蔣氏固素以負責自命者，遂以一身兼中央黨部常務委員會及政治會議、軍事會議三主席，其意固在期軍事之勝利，謀權力之集中，不料竟因此而召各方之惡感，啓內部之糾紛，貽武漢派以攻擊之口實，凡此皆鮑氏運用共產黨離間政策所生之效力也。身處其中者雖未必自覺，而旁觀者固瞭然無疑也。」（見曾先生遺著四二頁：「共產黨撲滅國家主義者之策略」一文）觀此可知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

黨內部派別糾紛迭起，咸由鮑羅廷之離間政策蠱惑而成，而鄒魯（海濱）先生當時固共黨所指目爲右派之中堅人物，其於十四年冬離粵北上及召開西山會議，亦見過於鮑羅廷之陰狠手段而不得不出此。

至鄒先生懷疑俄共之起因，則見之於所著回顧錄。有謂中山先生逝世「移靈碧雲寺後，蘇聯大使加拉罕請我們在北京的中委和黨裏的重要份子，在蘇聯大使館會談。在座的除主人外，本黨有吳敬恆、戴傳賢、于右任等先生和我，俄人鮑羅廷、共產黨的李大釗和于樹德，以及所謂庫倫政府的外交部長，政府委員等等，共有十餘人。坐定後，加拉罕就立起來致詞，並介紹我們和所謂庫倫政府某某部長等相見，當時我就發生了一個很不快的感想：爲什麼加拉罕這樣荒唐，把我們和所謂庫倫政府的人員相等對待？介紹完畢，他提出他的主張，說道：「蘇聯很希望我們中央及政府能够承認庫倫政府。」我們公推一位起來答復他，祇表示感謝他招待的盛意，却沒有提到承認的事，這樣含糊敷衍一番。在談話之中，加拉罕和所謂庫倫政府的外交部長，又再三聲明，並且說什麼請中央政府承認所謂庫倫政府，完全是根據總理的民族自決主義。我忍無可忍，便立起來駁他，說：「總理確有民族自決主義，不過跟着有一句話，民族自決是造成中華民族。總理民族主義的意義，固然不是大家來分割中華民國；更不是民族自決之後，把中華民國的土地，併入他國的版圖。」我講話的時候，加拉罕和鮑羅廷恨恨地看着我。我心中默想：蘇聯這種政策的表示，所謂幫助我們國民黨的用意，恐怕不是單純的。從此我更懷疑蘇聯和共產黨了。」蓋鄒先生之見惡於鮑羅廷，大抵即緣於此一度談話，而其毅然反共之決心，亦由此而日益增強，所憾者彼時國民黨內部尙爲共黨及左派勢力所掣持，致西山會議派雖奮起反共而阻礙叢生，打擊重重，亦可見聯俄容共政策貽患之深且鉅了。

據鄒先生回顧錄，所述參加西山會議之陣容，有謂：「此次會議既然是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開會來謀挽救黨國，所以到會的人，只有中央執監委員，計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除胡漢民先生在俄，熊

克武先生在禁，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林祖涵係共產黨，不許出席外，實際上祇有十八人。這十八人中出席西山會議的，有我和林先生（森）、居正、覃振、石青陽、石瑛、戴傳賢、沈定一、邵元冲、葉楚傖諸先生等十人（正式開會時，戴邵兩先生沒有參加）。李烈鈞先生雖未出席，却來電表示贊成。所以沒有出席也沒有表示贊成的，祇有譚延闓、柏文蔚、王法勤、于右任、恩克巴圖、丁維汾先生和汪兆銘。監察委員共五人，出席西山會議的有謝持和張繼兩先生。吳敬恆先生署名通電召集西山會議。並於西山會議第一次預備會出席，且做主席，所以吳先生說他是西山會議派，就是這個原因。鄧澤如先生雖沒有到會，却暗中出過錢。這樣，監察委員五人中，祇有李石曾先生和西山會議沒有關係罷了。候補執行委員出席者，則有茅祖權，傅汝霖先生等。這些是西山會議的脚色。」按上述之邵元冲、沈定一、林祖涵三人，原為候補中委，想係西山會議未召開前，業已遞補。惟第一屆中委二十四人中，除廖仲愷遇刺逝世（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楊希閔因滇桂軍叛變（十四年六月四日）削除黨籍，熊克武以通敵（陳炯明）有據被幽禁（十四年十月三日）外，尚有張靜江，張因反對西山會議者，不知海濱先生何以漏列？

居覺生（正）先生於其所著梅川譜傷中，曾略述蔘預西山會議之經過，謂：「總理孫公喪殯事畢，召開執行全會於北京翠花胡同（北京執行部），以意見不合，未終會而散。朱卓文約附夫人專車回上海。（軍）太炎先生等約在余寓發起辛亥俱樂部。未幾，胡景翼督軍死，太炎屬余往吊。……開封轉來電報，要余往北京開會，不應，折回上海。訪許汝為（崇智）總司令（按許為候補監委。原任廣州國民政府軍政部長兼粵軍總司令，十四年九月二十日被逐離粵），告以子超、海濱、季陶、楚儉、元冲均到北京種種原因，始知廣州政變，漢民、精衛先後被放，促余前往，余答以去姑不去，名可具名，汝為即電北京。過後訪張靜江，靜江忿然曰：北京開會通電，有汝名在，果爾，余定去廣東，與汝等作對。余曰：我本無成見，但是你老要作對，我定去北京，不歡而散。以是歸揚行本宅。得鄧孟碩來信云：西山會議，內容複雜，可

不必來。因此擬兩不過問。許汝爲遣人敦促再三，復送旅費購船票，情誼難却，乃偕明卿（按指居夫人）至北京。晤海濱、滄白（按即湯庶堪，時任段執政司法總長），而戴（季陶）葉（楚槍）邵（元冲）三人，則已離北京。何以故？聞係碧雲寺靈前開會之日，有戴被打之一幕戲劇，會議一無成就。余曰：既騎上馬，成敗利鈍，可不計也。於是將預定議案，逐項整理，宣布中外。會畢南下，歲已暮矣！此可證戴、邵等雖列名發動而未參加正式會議，另有其原因。惟所述汪精衛之「被放」，係在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之後，並非在西山會議之前，故言之似尙嫌早！

又據張溥泉（繼）回憶錄中，亦有片斷紀述，如十四年「子超與海濱來談共產猖獗事，余曰：因病不能參加會議。君等之主張，即余之主張也。諸事請兩兄代簽名可也。西山會議開會後，設機關於翠花胡同，林鄒二君主持之。」十五年「國民軍敗，余偕眷赴滬。許汝爲集合同志，繼續反共工作，余亦加入。」十六年「上海黨內外形勢極混雜。二月，余携眷至大連暫避。」凡此均可與鄒、居所述合觀，即知西山會議最初之反共陣容中，有少數意志不堅，發生動搖，不旋踵而告脫離者。故先生曾謂：「西山會議十幾人當中，有二三人由上海俄領事約去談話，說明共產黨不要政權，只要三分一的黨權，你們不必再三張清黨！」如是便有若干人到廣東，悔罪式的，或登告白，或寫書信，脫離西山會議。」（詳見鄒著西山會議一文）是亦俄共運用離間策略之成功，昧於遠識者往往墮其彀中而不自覺耳！

西山會議於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開幕，會期十日，正式開會二十二次，通過重要議案：計有①取消共產黨在國民黨黨籍；②顧問鮑羅廷解雇；③開除汪精衛黨籍；④決定國民黨此後對蘇俄態度；⑤開除中央執行委員之共產派李大釗等；⑥取消政治委員會；⑦中央執行委員會移設上海；⑧修改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法等項，並發表宣言，申述其主張。此爲國民黨人公開反共之第一聲，換言之，亦即開始放棄中山先生之容共政策。惟對聯俄一事，仍持保留態度，故宣言末段謂：「本黨對於反抗帝國主義之蘇聯，在

革命進程工作之中，有聯合之必要，自然相與提携，即本黨對於中國共產黨，亦視爲友黨，以明此次善意的決定取消加入本黨之共產黨員，實理勢所不得不分，而情誼未始不可合也。」是西山會議派之反共，初僅限於分共而已。雖似毅然決絕，而仍不免有拖泥帶水之譏。日後國共關係之陰晴靡定，冷暖無常，大抵即由於始終未能斬斷葛藤所致。而共產黨人則顧破此種弱點，滲透心臟，無孔不入，如近年來「國共三度合作」之和謠，即蘇俄與中共回憶其詭詐之多次成功於過去者，或未嘗不可再嘗試於將來也。

據鄒先生回憶錄：西山會議舉行之前，曾致函廣州方面負責同志，痛陳清黨分共之重要，文長三千餘言，由鄒主稿，張繼、林森、謝持、覃振、石瑛、茅祖權、傅汝霖連署，原文今收入張溥泉先生全集中。其中述及俄共之跋扈及盤踞廣州機關之情形，有謂：「……改組以來，機關爲共產同志把持，凡非共產之同志，則欲插足而不能，即問借一二非共產同志以爲點綴，亦必出種種手段以執之，俾無以自展。……且彼輩之用心，非僅欲破壞吾黨已也，直欲毀滅吾黨之歷史，破壞同志之感情。以展堂與精衛、汝爲與介石論之，皆數十年生死患難交，而竟使之陷於破裂不可收拾！雙十節竟公然改警告節，醜詆吾黨創造民國之歷史，吾黨稍有心肝者，能無痛哭流涕乎？……近月以來，更不堪問。黨權不在最高黨部之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權不在最高政治機關之國民政府委員會，而悉集中於政治委員會；鮑羅廷乃以政治委員會顧問之資格，操縱其間。而鮑羅廷所有措施，復先決於其共產黨，以故黨務政務之重要者，共產黨之小學生莫不先知，而吾黨中之重要委員，則冥然而無所聞也。與其謂共產黨同志加入吾黨，無寧謂吾黨附屬於共產黨之爲真實。……吾黨同志若不大澈大悟，謀根本之救濟，速與共產同志劃然分開，不使彼輩再行干與吾黨之事，則再過一年，恐青天白日之旗，必化爲紅色矣！……即以聯俄言之，亦以其有益於黨有益於國爲前提耳！今如何者？以黨事言，彼固利用共產黨投入吾黨，以便脫胎換骨也。年餘內部之劇烈紛爭，端即在此。……至彼所謂助吾黨者，計不過萬餘枝槍耳，然盤踞吾黨最高之黨權政權軍權，所得代價，實太過鉅。

蓋鮑羅廷，嘉倫兩氏，名爲顧問，實則軍政最高之命令者。……此外如外交部顧問，參謀團主任、航空局局長、交通總監、艦隊總監、兵工廠顧問、各軍訓練，莫非俄人。袁世凱借二億五千萬大款，予人以鹽務稽核，吾黨猶諱之爲賣國，今俄之助我至少，所擢至大，設有人以賣國責吾黨，吾黨其何辭以對？况乎助我者其名，自爲者其實耶！……」此不僅爲反共之重要文獻，治史者所不可忽略，即初期之國共合作以及黨治之開始施行，尤不難於此中尋求真相，質言之，即蘇俄之利用政策，利在權力集中。權力愈集中，即其操縱之機會愈大也。

但廣州方面軍事負責當局，雖對俄共之狼子野心，有其認識，惟以篤信中山先生遺教之故，深不以西山會議派之反共爲然，曾於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表「忠告海內外各黨部同志書」，痛加斥責，有謂：「本黨不幸，值茲廣東統一將告完成，北方民衆共起奮鬥，賣國軍閥自行崩潰，總理主義可即實現之時，忽有一部份同志離異，自赴北京西山，開其所謂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自布議案，快其驅除異己發抒私忿之偏見，而不惜阻撓國民革命之大業，迹其言動，無不悖於本黨之紀律與總理之意旨。究其開會情形若何，誰爲主席？誰爲提議者？誰爲附議者？是否經過議事程序所必須之討論與表決，求之京滬報紙，皆無記載，亦未見其自行公布，會是總理信徒，而并民權初步一書，亦未之讀耶？據京滬報告，西山并未成會，會且未成，何來議決？即使其召集爲合法，是其所宣布之議決案，亦必不能有效也。……關於共產黨之問題，……不知共產黨之加入本黨，爲總理所特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且總理已明言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矣！……總理之所以如是，乃總理之偉大，總理手創之三民主義，誠不同於共產主義，而其爲革命的主義則同。總理深知必能包括共產主義，始爲真正之三民主義，同時亦必能容納共產黨，始能爲真正之國民黨也。今日中國革命，已爲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國革命成功，則世界革命爲之促進，亦世界革命成功，中國革命始真正成功。……自改組迄今兩載，成績具在，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

族，尤總理於遺囑中認爲與喚起民衆，同爲完成國民革命所必須也。蘇俄同志助成中國獨立之國民革命，其誠意亦彰彰明甚。中國革命不成，列強敢於侮我，皆國民勇於私鬥，黨員徒增意氣，團體慣於破裂，明知之而故蹈之，欲不謂之反革命，不可得也。……當時廣州方面之認識如此，意在繼續貫徹聯俄容共政策之實行。如是則與西山會議派之反共，形成根本齟齬，是國民黨內之重大分裂，自無法可以避免了！

十二、反共與聯共之對立

西山會議派反共之幕既揭，廣州方面在共產黨及左傾勢力控制之下，除策動各地黨部及報紙刊物予以圍攻外，復於十五年一月一日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對西山會議之彈劾案，並分別懲處如次：

(一)謝持、鄒魯兩人，民國十二年即於北京組織民治主義同志會，其居心乃在本黨以外成立私人團體。此次在北京發佈種種反對國民政府之言論，誣譏同志，破壞黨國信用。即令無西山會議之事，亦應嚴加處分。何況謝鄒兩人對於此次西山會議，事前奔走聯絡，利用民治主義同志份子，擾亂本黨北京執行部，更進而發起西山會議，事後派遣黨羽，分赴各地運動，攘奪黨權耶？謝持、鄒魯，應永遠開除黨籍。

(二)居正、石青陽、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權、葉楚傖、邵元冲、林森、張繼、張知本等十二人，附和謝持、鄒魯，除張知本外，皆參加西山會議，實屬違背紀律。張知本雖未出席西山會議，然迄未聲明脫離，殊有附和之嫌。唯此十二人並非西山會議之主謀者，略迹原情，予以自新之路。由本大會予以書面警告，指示其錯誤，糾正其過失，限於兩個月內，復函中央執行委員會。若有不接受本會警告者；是爲有意背叛本黨，即與謝持、鄒魯同類，中央執委會可逕予開除其黨籍。

(三)戴季陶同志於十四年五月，在第二次中全會中，曾負責起草關於本黨容納共產黨員加入之訓令。然歷時一個月，不得中央執委會之許可，以個人名義，刊佈「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遂使黨內引起

糾紛，發生不良影響。唯對此次西山會議，雖曾參預其事，嗣於離開北京時，致函吳稚暉同志表示悔悟。綜查其個人言行，或出於愛護本黨之熱情，而為反動份子所利用，致形成破壞本黨之工具，而產生與其本意相違之結果。姑念戴同志為本黨奮鬥有年，翊贊總理，改組本黨，頗著勳績，着由本大會予以懇切訓誡，促其反省，毋得再蹈前愆。

繼又通過黨員違犯紀律處分決議如下：(一)參加西山會議有違背黨紀行為者：①居正參加西山會議，且加入北京同志俱樂部(按為馮自由、馬君武等於十四年四月所發起)，現仍不願警告，在湖北從事搗亂；②石青陽加入北京同志俱樂部，又與軍閥勾結；③覃振、石瑛、茅祖權等亦加入北京同志俱樂部，曾予警告，限兩個月內，向中央黨部聲明與該俱樂部脫離關係；④邵元冲在上海主持偽中央執行委員會，曾予警告，飭其即日停止活動；⑤葉楚傖於主持上海偽中央執委會事宜外，綜持上海民國日報，繼續作反動宣傳，應即免除其總編輯職務，改組該報；⑥沈定一於浙江省黨部從事反動行為，曾予警告，飭即停止活動；以上諸人雖經分別警告，而不服從本大會之決議者，實為自絕於本黨，應予一律開除黨籍。(二)凡加入北京同志俱樂部者，統限兩個月內，向中央黨部聲明脫離該俱樂部，否則開除黨籍。(三)桂崇基、周佛海、劉啓明、沈儀彬、劉蘆隱、馬超俊、鄧醒石、袁世斌、黃季陸等九人，皆參與上海偽中央執委會，應予警告，統限兩個月內，向中央黨部聲明脫離偽中央執委會關係，否則開除黨籍。

同時，擴大名額，推選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三十六人，除汪精衛、譚延闓、胡漢民等十三人係一屆中委連任，新選出者有蔣中正、朱培德、伍朝樞、宋子文、蕭佛成、孫科等二十三人，凡參與西山會議者，則概予排除。其中新當選之共黨份子有吳玉章、楊匏安、惲代英、彭澤民、連同原來之李守常、于樹德、譚平山、林祖涵共為八人，此外如宋慶齡、徐謙、陳友仁、程潛、李濟琛、或以左傾著名，或則今已附共。而汪精衛之親信如陳公博、顧孟餘、經亨頤、何香凝、甘乃光等，則皆赫然入選，日後衆所周知之改組

派，即播種於此。至當時中常委九席中，共黨即佔其三（譚平山、林祖涵、楊匏安）；而國民黨中樞機構，亦爲共黨所控制，隱握其實權，如秘書處書記長劉芬、宣傳部代部長毛澤東、秘書沈雁冰、青年部秘書黃日葵，工人部秘書馮菊坡、農民部秘書羅綺園、海外部秘書許楚魂、商民部秘書黃樂裕、婦女部英文秘書葛季膺，均屬共黨首要，可見其勢力之膨脹及發展之迅速矣！

時西山會議派已依照大會決議，將中央執行委員會移設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並亦於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假呂班路建國中學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二十一個省市區代表，選舉林森、鄒魯、謝持、居正等二十五人爲二屆中委，並創刊江南晚報，爲宣傳機關，至是國民黨內因容共與反共之爭，演成兩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尖銳之對立，遂開我國政黨史上特有之創例，距中山先生逝世，尙僅及一年也。

當滬粵對立之際，廣州方面忽於三月二十日發生共黨陰謀策動中山艦叛變事件，汪精衛以涉嫌不自安，於五月九日悄然離粵出國，由譚延闓代理國府主席。嗣粵方二屆中委於五月十五日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議決整理黨務案四項，國共兩黨協定辦法八項，以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內之活動，並成立兩黨聯席會議，以國民黨員五人共產黨員三人組織之，負責審查兩黨黨員妨礙兩黨合作之言行，以及兩黨糾紛問題暨與兩黨協定有關事項，且得聘請第三國際代表爲顧問。故國民黨粵方此時之容共，實一變而爲聯共，前此共黨尙可隱藏身份，今則得以分庭抗禮，公開活動，故對之並無若何不利也。

及至七月九日，今總統蔣公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統師自粵北伐，一路出湖南，而於十月十日克武漢；一路窺江西，而於十一月八日克南昌；一路取福建，經浙江，而於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克上海。翌日，復下南京。革命軍事雖進行順利，而黨內糾紛則轉趨嚴重。蓋當南昌攻下之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即隨之進駐，嗣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黨部人員亦自粵出發，行抵南昌，其時，蔣公兼任中常會及中政會主席，由張靜江代理。其他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之左傾分子，大多聚集武漢，而共黨幹部如毛澤東、夏曦、郭亮

、董必武、吳玉章、李漢俊等人則分在湖南湖北，聲勢甚張，鄧演達亦以總政治部主任名義，駐在武漢，與共黨狼狽相依。於是兩湖間「擁汪反蔣」之氣氛，甚為濃厚。首先在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召集國民黨中央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決定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未移至武漢以前，即以聯席會議行使中央職權，推徐謙為聯席會議主席，發號施令。自是以後，兩湖之間遍見「打倒新軍閥」、「清除黨內一切昏庸老朽分子」、「歡迎汪主席復職」、「黨權高於一切」、「一切權力屬於黨」這一類宣傳文字和標語，對蔣總司令及張靜江極盡污蔑詆毀之能事。繼復於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召集在漢口之國府委員及中央執監委員，候補委員，舉行擴大臨時會議，決定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在武漢開始辦公，并指定武漢為革命時期臨時首都，其黨政實權悉為共黨及親共者所控制。

及至三月十日，武漢方面又召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的作用，是共產黨勾串一般利慾薰心的所謂「左派革命分子」，以奪取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黨政軍大權為目的，先替汪精衛布置「東山再起」的局面，傾其全力從事於「反蔣」工作，以造成國民黨內部的火併，使其兩敗俱傷，而後共產黨就得以獲致漁翁之利。不用說，這一幕背後的編劇導演人，當然是俄顧問鮑羅廷，像徐謙、鄧演達、譚平山之流，不過是重要配角而已。故在七天的會議之中，除了通過「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及「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條例」等，以限制蔣之職權，亦即所以抑制軍權，提高黨權（明白規定革命軍總司令須對中央執委會負責）而外，并改組中樞黨政軍各機構的人事和制度；即①改選中央黨部常務委員九人（廢除常務主席制），由汪精衛、譚延闓、蔣中正、顧孟餘、孫科、譚平山、陳公博、徐謙、吳玉章當選。②改選中央黨部各部長七人，幾乎是清一色的「左派革命份子」，由汪精衛任組織部長（原為蔣擔任），顧孟餘任宣傳部長，鄧演達任農民部長，陳公博任工人部長，陳其瑗任商民部長，何香凝任婦女部長，彭澤民任海外部長，至原設之軍人部，則予裁撤。③改選中政會委員十五人，設主席團七人，由

汪精衛、譚延闓、孫科、顧孟餘、徐謙，譚平山、宋子文當選。④推舉軍事委員會委員十五人，設主席團七人，由汪精衛、程潛、唐生智、譚延闓、蔣中正、鄧演達、徐謙當選。⑤擴大國府委員爲二十八人，設常務委員五人，由汪精衛、譚延闓、孫科、宋子文、徐謙當選。我們從以上名單來看，無一不是意在排除蔣之權力，而把黨政軍大權集中於汪精衛之一身，以便於共產黨的控制，其惡毒的用心，是十分顯明的。

旋汪精衛於四月一日由法國回到上海，隔了三天，便和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聯合宣言，其中有謂：「中國國民黨多數同志，凡是瞭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於中國國民黨具有真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孫總理的聯共政策。現在……兩黨同志，果能開誠合作，如兄弟般親密，反間之言，自不獲乘機而入也。」這不啻爲共產黨宣傳，完全失却國民黨的立場。此一宣言發表後之次日，汪即逕赴武漢，接任中央黨政要職，并對新聞記者談話，聲稱要與共產黨爲中國革命而共生死存亡，大呼「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出去！」這種甘心爲共黨作工具的態度，自爲共黨熱烈歡迎，捧之爲革命領袖了。繼而汪精衛又以國民政府主席名義下令撤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職務，任命馮玉祥爲總司令，唐生智爲副總司令，積極備戰，於是國民黨反共之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鄧澤如、黃紹竑、李石曾、蔡元培、古應芬、張靜江、陳果夫等八人，在滬集議，於四月九日發表通電，檢舉武漢方面種種不法措施，並分電各中委，對共產黨跨黨份子，予以非常緊急措置。四月十五日，在南京之中央執監委員遂召開聯席會議，接受吳敬恆等之提議，成立清黨委員會，自四月十八日起，實行清黨，並同時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因是一黨而有兩國民政府三中央黨部之局，即世所稱寧漢滬之分裂是也。

惟南京國民政府一面清黨反共，一面對於率先倡議反共之西山會議派，則仍表示厭惡，且命令上海駐軍首長白崇禧查封環龍路四十四號中央黨部。因此，鄒魯先生乃於四月二十日致函吳敬恆表示抗議，有謂：「西山會議先生原爲參預之一人，繼以清黨問題不能同意，祇欲調和，遂致兩岐。及先生由京抵滬，連

談數日，每日數時，對於弟等提出共產黨打倒國民黨之陰謀與事實，以爲非清黨不可，終不見容納。其時介石同志在粵，正有清黨計劃，忽於先生到粵時，改變態度，此種事實與先生是否發生關係，不得而知，而時間相值，論者多爲先生咎焉！及先生由粵回滬，仍間接向弟表示調和辦法，謂將監察考試兩權，歸諸西山會議派主持，弟等以爲清黨係救黨，非以分權，終不得結果。自是以後，每與先生晤面，不復談黨事矣！及本年春，知先生已洞悉共產黨一切打倒國民黨計劃，決心清黨，乃欲晤先生，而先生亦表示欲晤弟，復蒙親臨敝寓，正式表示清黨之決心與辦法，並云表面仍主張聯俄容共與打倒西山會議派。弟既表示贊成清黨之決心，而對於聯俄容共與打倒西山會議派之辦法，認爲太違背言行，期期以爲不可，爭論三小時有奇，而先生仍信爲允妥。卒之，上海發動清黨時，不敢明言清黨，借題工人自相衝突。次日某軍官之談話，仍云容共政策並無變更；同時，健生同志發出查封四十四號之文電，於先生所言辦法，不爽一毫。結果我不清共，共亦清我，武漢討伐令一下，則清黨問題不能不明揭矣，是何如自始即標明清黨主義之爲直捷了當也。今於西山會議問題，仍蒙混不清，在先生始終以爲此次清黨，實質即爲執行西山會議議案，西山會議派之二致合作，不過時間問題。然既已主張無二，而偏生裂痕，不特生出以後黨中意見，且亦何以昭示中外？若懷挾私見，則不堪問矣！弟知先生此次舉動，完全爲黨國問題，但辦法錯誤，遂使自生荆棘，殊堪扼腕。况迄今月餘，正氣仍不張於黨內，既恐正氣未必終可壓埋，萬一竟被壓埋，則黨國前途之隱憂正大，更不暇爲西山會議派哀矣！其後，六月十一日，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始正式通令取消「嚴防右傾份子」「打倒西山會議派」「打倒國家主義派」等口號（見中國六十年大事記），而軍事最高當局在南京黃埔同學會亦發表公開演說，指稱「打倒國家主義派這個口號完全是共產黨造出來要間接打倒國民黨的名詞，因爲國民黨也是一個國家主義派，三民主義也實在是一個國家主義」（見會恭韓先生遺著五二頁）是對反共者之真正估價，似有進一步之認識矣！

先是武漢方面，於十六年四月間，共產黨即決議武裝黨員農工，準備建立蘇維埃政權。第三國際復命令共產黨沒收兩湖地主土地，奪取國民黨權力，武裝共產黨員，成立工農軍，使武漢國民政府及國民黨成爲「工農之革命民主專政機構」。七月十三日，又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布宣言，迫使汪精衛及其左派國民黨人表明態度，並撤回其參加國民政府之共產黨員。於是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乃於七月十五日通過取締共產黨案，及解除鮑羅廷顧問職務，並由汪精衛等以「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名義，發布聲明，指摘共產黨破壞聯合陣線之種種事實，以示答復。至是合作五個月之武漢國共聯合政權，遂告分裂，而共產黨軍人葉挺、賀龍、朱德等亦於八月一日開始南昌暴動，嗣後蔓延於粵湘鄂贛皖豫閩等省達六年之久，先後經過五次圍剿，始於二十三年春流竄陝北，而國家元氣大傷外侮亦乘機侵入矣！

是年九月十一日，國民黨滬寧漢三方面中央執監委員，以清黨分共既趨一致，應共謀合作，乃在滬召開談話會三次，商討三中央黨部兩國民政府合併改組辦法，經決定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統一黨務，由寧漢滬三方面各推委員六人（另候補委員各三人）及共推委員十四人組織之，至寧漢兩政府之合併人選，由特別委員會決定。並推汪精衛等起草統一宣言，說明「組織中央特別委員會，代行中央執監委員會職權，改組國民政府，並於三個月內籌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而從前峙立之三黨部，均不復行使職權，從前三方面互相攻擊之言論，皆成陳迹，不得復引爲口實。」至是紛擾近兩年之國民黨分裂，始復歸於統一。

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於九月十五日在南京正式成立，西山會議派代表滬方參加者爲林森、鄒魯、許崇智、居正、謝持、覃振六人，候補爲茅祖權、劉積學、傅汝霖；寧方代表參加者爲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王伯羣、伍朝樞、李烈鈞六人，候補爲葉楚傖、褚民誼、繆斌；漢方代表參加者爲譚延闓、孫科、何香凝、于右任、朱培德、程潛六人，候補爲顧孟餘、甘乃光、陳公博；另蔣中正、胡漢民、汪精衛、張繼、吳敬恆、戴季陶、張靜江、唐生智、馮玉祥、閻錫山、楊樹莊、李濟琛、何應欽、白崇禧十四人，則

由三方所公推。惟汪精衛等一派國民黨人以未能取得黨政實權，故不久即指摘南京特委會爲西山會議派把持，大肆攻擊。主張召開二屆四中全會，恢復黨統；並先後策動唐生智武漢叛變（十月二十日）、張桂軍廣州兵變（十一月十七日）、及南京「一一、二二」慘案；嗣共產黨蘇兆徵、張太雷、周恩來、葉挺等亦乘機發動廣州暴動（十二月十一日）。於是國民黨內之紛爭復起，政局顯枳隤不寧之勢，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特別委員會乃宣告結束，距成立僅百餘日耳！鄒魯先生於特委會結束之次日，發布宣言，謂：「自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黨權統一，黨部完整，更無派別存於其間。况清共爲黨員應盡之責，既已一致，即無彼此。不圖今日吾黨同志竟仍有以西山派爲攻擊之資，於以歎共產黨所施毒計之深，否則必猶有共產黨作祟於吾黨之中，而同志未及察也。」時汪精衛知爲輿論所不直，已於十二月十七日由滬出國，而鄒先生亦於十七年一月十四日借許崇智、居正赴日，轉往歐美游歷。親共者與反共者同時退出政壇，此蓋當時政潮演變之結果，而亦隱伏他日政潮之爭端。自是而後，西山會議派遂成爲一歷史名詞。而三十年來始終堅決反共人士，尚仍在歧視之列，且時被惡名，可見共黨所貽思想毒素之深了！

十三、中共的祿姆——鮑羅廷

自國民黨十三年改組前後以迄十五年北伐前夕，共產黨寄生於國民黨中迅速發展，表面上國民黨的聲勢一天一天的擴大，實際上則是共產黨的陰謀一着一着的成功，不僅黨務的操縱是這樣，即軍政的控制亦復是如此。海隅孤客在解放別錄中說：

「他們當時幾種大計劃，確能分工合作地進行，其一是留法的關開向莫斯科那條大路，扣緊第三國際和列寧政府。其二是國內中堅份子滲入國民黨和軍政樞軸，參加國民革命。其三是滲入各部隊，左右官長，支配士兵。其四是號召鄉村樵魯，部勒成軍，戕殺地主，對民衆以實際行動作共產主義的註腳。」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熱烘烘開過以後，人們叫得聒耳的最高國策是容共聯俄。……鮑羅廷先生出現了，嘉倫將軍的雄姿浮在大家眼前了，農民部長是毛澤東，海外部長是彭澤民，其餘什麼什麼，記不清了！」（作者按：據中華年鑑：國民黨於十五年廣州二全代會後，宣傳部長爲汪精衛，代部長爲毛澤東，農民部長爲陳公博，海外部長爲彭澤民。與海隅孤客所說，略有出入，或者毛之任農民部長，係十四年廖仲愷遇刺後繼任，尙待考。）

「有人告訴我，凡事必開會議，民主之至……主席永遠是鮑羅廷——大家却叫他閻羅，省文也——議題、案由、辦法、秘書照例宣讀、讀畢、鮑主席一霎寒光的眼睛把正襟危坐的委員們一掃，鴉雀無聲，一案通過了！」

「軍、師、旅、團、營以至連部，都有嘉倫將軍支配的政治部和政治員。這樣的大軍浩蕩出發而北伐了！現在中共黨史由「促成國民革命」寫起，你能不承認是「信史」嗎？」

談到鮑羅廷，他是當年聯俄容共時代赫赫不可一世的人物，也是對中共寄生國民黨中盡了最大哺育教養之責的嫖娼。陳公博對他的評價是：「人們都說鮑羅廷在廣東的權威很大，這是不錯的，因爲他有蘇俄做後臺，而且把握了中國的共產黨。可是人們祇知其一，不知其二，鮑羅廷的操縱政治，還在於他的技術。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他多數是列席的。對於小事，他都沒有意見，但每逢大案，他必預先和出席的人們個別交換意見，等到大家都無異詞，或大多數沒有異議時，他才以顧問的資格提出。因此，彷彿鮑羅廷所提的議案沒有不通過，這樣傳聞一播，鮑羅廷真似可以左右政局了。他還有空閒時間，可以考慮，可以思索，每逢個別談話，他有許多材料，還有許多理論，怕麻煩的人終於折服了。除了共產黨不算，許多投機家便奔走於鮑羅廷之門，聲勢更加浩大，儼然鮑公館是一個小政府。我目中的鮑羅廷的確是一個能幹的外交人才，至於工作和理論我倒以爲是中人而已。」然而這位僅是中人之資的鮑顧問，他竟運用其巧妙的

外交技術，握有足以指揮操縱未北伐前廣東黨政軍三方面的大權，儼然高踞於太上第一人的地位，且有一「廣東皇帝」之稱（見十六年吳稚暉請查辦共產黨函），這真是從那裏說起呢？

前節所引述國民黨改組後中共在黨務上的明爭暗奪，乃至於在他們控制下的工人部及農民部，進而利用工會，農民協會組織工團軍，糾察隊及農民自衛軍，以培植武裝力量，更是中共一手包辦。這些當然得自鮑羅廷背後的全力支持，否則不會如此氣燄囂張。同時，鮑羅廷對於黃埔軍校的滲透，也絲毫不放鬆，他在十四年一月，即命該校共產份子，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使之發生黨團作用，以爲對軍校員生分化篡奪的開始。這時候，在黃埔軍校的著名共黨，有代理政治部主任包惠僧，軍法處長周恩來，衛兵隊長胡公冕，區黨部委員周逸羣，政治教官惲代英，高語罕等。迨至是年七月，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成立，均由左傾之汪精衛任主席。八月，編組國民革命軍，由今總統蔣公任第一軍軍長（十五年一月，何應欽繼任軍長）；譚延闓任第二軍軍長；朱培德任第三軍軍長；李濟琛任第四軍軍長；李福林任第五軍軍長；九月，二次東征後，又增編一軍，由程潛任第六軍軍長；而鮑羅廷及俄國軍事顧問們則注意部署各軍政治部主任由共產份子担任，實行以黨控軍的政工特務制度。據陳公博說：「國民政府在七月一日成立了……和我有關的是我的工作，一個是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這是極繁重的工作，而又爲共產黨最注意的工作。在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就有兩個俄國顧問，一個是斯乃德；一個是馬密也夫；最後基散加代了嘉倫做軍事顧問時，更加上一個黑鐵尼。我底下三個處長都是共產黨人，這是在內的。而在外的，第一軍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來，第二軍的政治部主任是李富春，第三軍的政治部主任是朱克靖，第六軍的政治部主任是林祖涵，海軍局的政治部主任是李之龍，全都是共產黨，這些主任都是軍事委員會決定之後交下來任用的。我對第四軍和第五軍政治部主任，我不願意再任共產黨了。我對第五軍任命了李朗如（作者按：此人於大陸淪陷後投共，現任爲廣東省府委員），至第四軍呢，正在物色人選，一天斯乃德對我說：我既不願再任

共產黨人，那麼，羅漢比較爲宜。羅漢是黃埔的優秀學生，汪先生是可以同意的。我呈明汪先生後便委他去第四軍，那知後來一打聽，羅漢也是共產黨，直至後來北伐軍出發，才改委麥朝樞。」共產黨更是這樣在國民黨的「黨軍」中從軍政治部一直到師旅團營連另行建立一政工指揮系統，藉以控制部隊，左右官長，支配士兵。雖然，北伐以後，不一定盡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但這些混進軍隊裏的「邪惡的種子」畢竟也和滲入黨務方面情形一樣的播散開去了！

然而鮑羅廷守鬼域伎倆猶不止此，其最大惡毒爲還在於他對國民黨最高層領導人物的製造矛盾和挑撥離間工作。這項工作，在中山先生未逝世前，他即已開始進行。當廣州發生商團事變時，中山先生自詔開諭令成立革命委員會，便宜行事，以加強平事變，而鮑羅廷即主張胡漢民，汪精衛二人不必參加，今總統蔣公會致書中山先生力爭，有謂：「今日（十三年十月九日）鮑顧問來校，就商革命委員會之人選問題，其語意甚不願展堂與季新（汪精衛字）加入，彼實不明本黨內情，致有此見解。中意展堂不在其內，或以成見太深，難以相處，而乃必欲將季新亦一併去之，未知其果何意，此中中期以爲不可也。……中以爲必須展堂與季新之名列入爲妥，若列入以後，彼自不來，則爲另一問題，而組織名單萬不可無胡、汪，否則不如暫緩組織之爲上也。」中山先生復書則謂：「革命委員會當要馬上成立，以對付種種非常之事，漢民、精衛不加入，未嘗不可。蓋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而漢民已失此信仰，當然不應加入，於事乃爲有濟，若必加入，反多妨礙，而兩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氣也。精衛本亦非俄國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爲師，斷無成就，而漢民、精衛恐皆不能降心相從。且二人性質，俱長於調和現狀，不長於澈底解決。現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當易維持，若另開新局，非彼之長。……故當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帶水以敷衍也。」中山先生對這隨多年之胡、汪，本有澈激之認識，然獨不欲其參加革命委員會，則鮑羅廷之意見，自必有其重大影響。後來中山先生發表革命委員會全權委員爲許崇智、廖仲

愷、汪精衛、蔣中正、陳友仁、譚平山六人，而由中山先生自任會長。汪雖仍能參與，但胡漢民終被摒除。這也許是鮑羅廷認爲汪之爲人「有野心，無宗旨，可利用」（見十六年四月張作霖搜查北京俄大使館發現文件中，鮑羅廷報告對汪之評語），較胡爲易與，遂不堅持原意，且亦從此改採「聯汪排胡」的策略了！

中山先生北上逝世後，胡漢民仍以代理大元帥名義綜攬一切政務。惟以個性狷急，不能容物，頗爲人所不滿，鮑羅廷更得以從中播弄，亟謀去胡。及至議組國民政府，改大元帥制爲委員制，由鮑擔任顧問之中央政治委員會先行選舉國民政府主席，出席委員汪精衛等共十一人，結果汪竟以十一票全票當選，換言之，即汪自己選自己也沒下一票（見鄭魯：回顧錄），可見權位之爭，汪是當仁不讓的。據說是日胡恰好因事未出席，會後方知有選舉國府主席之事。於是胡、汪自同盟會時代起之生死患難交情從此留下了無可彌補的裂痕，而鮑羅廷的聯汪排胡策略，因事前的周密部署而告成功。迨廖仲愷遇刺案發生，胡以其弟毅生之故受嫌最重而無確證，鮑羅廷則主張「祇問政見之異同，不管證據之有無」，意欲趁機將胡逮捕，以反對者象，乃改爲遣胡赴俄。這時候，汪一身兼國府及軍委會兩主席職，其地位與中山先生之大元帥相等。在此以前，他素以不做官，自鳴清高，祇是日侍中山先生左右，奉使四方而已，現在却與鮑羅廷深相勾結，降心相從，遂得以扶搖直上，而一向爲中山先生最高幕僚長負有多年行政機要責任的胡漢民，反被排擠離粵，以後國民黨老同志間便從此多事了！

鮑羅廷認爲國民黨老同志間能够分裂爲左派，右派，或是中立派，使之不成爲一團結的整體，從而操縱利用，自必大有利於共產黨的發展。因此在胡漢民被放逐之後，次一步驟便製造蔣、汪之間的分裂，由是而發生世所周知的中山艦事件的一幕，這個事件原是對蔣不利的一大陰謀，主角是中共黨員李之龍，導演是俄國軍事顧問季山嘉 KISSOLKA，即陳公博譯稱之基散加。（這時候，鮑羅廷遁返俄述職），汪精

衛大概是事前同意的了，幸而逆謀未逞，汪廷好快快託病出國，由譚延闓任政治委員會主席，蔣公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從此，蔣汪之間也蒙上一層不愉快的陰影。其時，鮑羅廷適借胡漢民由俄返粵，胡見形勢不利，不久亦離粵赴滬。孫科在當時也很感慨的說：「現在已不成樣子，百政皆聽命於鮑公館，鮑某豈不成爲統監了嗎？」其牢騷可知。後來，鮑羅廷提議決定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委員會主席人選，由張靜江擔任。他在事前和陳公博曾有一度很技巧的談話，現在根據陳的追述，節錄如下：

「在民國十五年四月末的時候，鮑羅廷由俄回粵找我作個別談話，我因病辭却。但是接連幾天，信哪、入哪、電話哪、不斷的追來，我心想又有重要的問題來了。我病稍愈之後，終於一夜在鮑公館見面。

「現在國民黨已到搖動的時期，我個人以爲非找出一個實際領袖不可，陳先生以爲怎樣？」鮑羅廷很沉着而嚴重的樣子問我。

「黨的實際領袖不是有了嗎？軍事的領袖當然是蔣介石同志，政治的領袖大概不出汪精衛同志和胡漢民同志。」我這樣說，心中一方面想，鮑羅廷是不是找我開玩笑。

「陳先生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說軍事和政治的領袖，是說黨的領袖，黨自從孫博士（鮑是這樣稱呼孫先生的）逝世了，須得來一個繼承。所以我的主張應得再舉一個總理，如果礙於總章，我們叫他是執行委員會的主席。」鮑羅廷這樣解釋。

我說：「這不是違反了黨的總章嗎？」

鮑說：「總章是法律問題，目前需要領袖是革命問題，我們爲了革命的實際，不能不犧牲點法律。」

「總章不也是應革命的實際而立的嗎？」我這樣答，這時我已引起注意，想鮑羅廷花樣真多。

「不錯，總章是應那時的革命實際，目前要一個主席是應現在的實際，爲要革命的陣線不破裂，陳先生總得犧牲了法律觀念罷！」鮑進一步的追問。

「誰來當這個主席呢？汪精衛同志既蕭然而去，胡漢民同志又佛然而行，北方老同志不肯來，目前祇有蔣介石同志可以擔任。然而兩月以來，寧清還是惶惑不定，我想介石同志必會謙退而不肯就，那麼這個問題如何解決？」我十分疑慮的問。

「我想推舉張靜江先生！」鮑毫不猶疑的答我。

「張靜江先生身體不大好，恐怕不會幹罷？」我更憂慮的問。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主席非張靜江先生不可。你知道孫博士一生是不會哭的，孫博士在北京臥病之時，張先生上北京去見孫博士，孫博士一見他便流淚了！」鮑這樣說。

「這是什麼解釋？」我更進一步的問。

「你不要看輕這一哭，這在革命史上佔極重要的一頁的。陳先生請你注意實際，不要注意黨的虛文，大家都贊成了，請你不必固執。」鮑終於搓着手很焦急的說。

這次談話，自然沒有結論，我那時還不是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出席委員，僅是列席的委員，鮑怕我反對，祇是作爲一種通知，暗示我不要發生異議。實在我當時對於主席的是否設立，絕沒有成見，祇是在三月二十之後，汪先生去國，而發生這樣嚴重問題，我恐怕黨更要糾紛。至於張靜江先生的被提出，是否出自鮑的本心，我無從知之，但是我可以斷定就是別人授意的謊，鮑是贊成的，因爲國民黨的分裂，即是共產黨之大利，這一層可以說絕無疑義。後來張靜江先生畢竟被舉爲中常會主席，黨畢竟分裂而有寧漢分立之變，而且就以張靜江作主席爲分裂的藉口。」

這是鮑羅廷於胡、汪離開廣州之後，干預國民黨最高人事安排的又一「傑作」。張靜江以二屆中央監察委員而竟出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對於北伐以後實際政局的影響是很大的。從而可知鮑羅廷在擔任國民黨政治顧問時期所玩弄的手法，幾於無一不是掩護中共作有利的發展，而以瓦解國民黨爲終極目的。因

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假如中共沒有這位俄國保姆，不會在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後短短的兩年餘時間，即可取得與國民黨分庭抗禮的地位（如中山艦事變後之國共聯席會議）；國民黨設若不延聘這位具有至高無上權力的政治顧問，或者縱請他做顧問而不是大到持授之以柄的話，則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最高領導階層，人事的糾紛不會愈弄愈複雜，意見的鴻溝也不會愈搞愈難泯除。雖然後來北伐軍事底定京滬，不久便有全面清共一幕，但中共羽毛豐滿，已能振翅而飛，有加厲集整空，餓則堪噉，飽即遠颺，不是輕易可以制伏得住了。而另一方面，自寧漢分裂後，起伏不定或明或暗的政潮，始終糾結不清，恩怨難平，遂益助長中共的蔓延擴大，成爲星火燎原之勢！所以，推溯起來，禍之首是俄國的史達林，罪之魁則是在華執行俄國政策之鮑羅廷！這些話，或者有人要認爲是事後諸葛亮之論，但一代當國的政治家，所責在能高瞻遠矚，撥亂反正，爲生民立命，措天下如磐石之安，決不是祇圖一己的因利乘便，而貽國家以無窮的禍患！俗諺有云：貪小便宜，必然吃大虧。今天我們從事於反共抗俄，回想到三十年前的聯俄容共，就可體會到這句話的深切教訓。不過鮑羅廷雖爲俄共中共立下如許汗馬功勞，但他在武漢分兵以後回俄，並沒有取得任何權位，也不甚受重視，似乎從此沒沒無聞，潦倒以終，這與趙飛之參加反史達林集團的「聯合反對派」，而於一九二七年失敗自殺；加拉罕之因整肅案，而於一九三七年爲史達林特務所槍斃，同樣是悲劇性的人物。攝人而不利己，侵略者的下場，大抵如斯！試想史達林死後尚且不免遭受嚴酷的清算，則慘殺數千萬大陸無辜人民滿身血腥氣的毛澤東之流，他們未來的結果，也就毋勞我們代爲預測的了！

十四、中共毒害之蔓延

綜觀上述中共匪黨的亂分佈，可知這係「邪惡的種籽」，從民國九年奉佈統籌到民國十二年未滲入國民黨之前，是播種萌芽期；從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後到民國十五年北伐開始是生根成長期。如果不

因國民黨聯俄容共而獲得一片氣候溫暖土壤肥沃的園地，它可能禁不起當時反對赤化的軍閥們的狂風暴雨而遭遇到種籽霉爛嫩芽夭折，即使能逃過這一關，如果沒有蘇俄軍政顧問及國民黨左傾份子的人工施肥加意培育，也不會繁殖推廣得那麼快！而初期的反共思潮及其運動更不會在國共聯合夾攻之下，那樣的艱苦奮鬥，終不能形成一對比的力量。至於民國十六年上海清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之後，中共不但沒有被澈底剷除，反而日益壯大發展到今天，這就有如海隅孤客在解放別錄中所說：「中共成長滋大，因素甚多，中國這一大溫床，在在皆成機會，然而大有造於彼者，莫如寧府袞袞諸公。蓋湘邊發難，贛南樹幟，那時掛籍共黨才數千人，候補黨員C.Y.份子亦不逾萬人。迨延安喘息甫定，鄉村小學生也有背棄父母，竊取幾文，千里間關，如水赴壑，大有「他年若得報恩仇，血染溇陽江口」一壯子悲憤而去的！那裏說得上什麼主義？總之，中共孕育期前一般的態勢，就是中國一切在轉變，當政的頹暮而乏朝氣，復不能對人民負責，盡使進步青年極度失望，那股逆流，便始焉涓涓，中焉盪漾，終焉澎湃。」這些話，非常慨乎言之！可是他所歸咎的一方面，恐怕不見得有此雅量肯承認這個說法。其實，這用不着有什麼爭辯的，事實總是事實，歷史決無法改造的啊！

不過，在我們了解中共創始經過之後，所必須平心靜氣加以探討的，就是中共這個魔鬼之所以為惡多端，固然有其複雜的因素，但它所導致中國實際政治的惡性毒害，竟能於無形或有形中傳染散播而無法根絕，以致影響到近三十年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反共，總是在形式化教條化的口號標語中兜圈子，不僅不能把它斬草除根，甚且還收到相反的效果。這是今天最值得注意而決不可再掉以輕心的問題。我們應該根據中共初期發展的史實，進一步推求過去反共何以常處於逆勢的根本原因所在，然後對於我們當前所致力反共抗俄，才有真正的裨益，而對於未來的反攻復國，也才能獲致真實的成功！

一、政治環境有利發展

首先，我們要稍爲說遠一點，就是從民國二年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國會解散，到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的發生，這中間曾有民五袁世凱稱帝，民六張勳復辟和南北分裂，而強隣日本於民四提出二十一條之後，繼以民七與段祺瑞締結「中日秘密軍事協定」，正是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時期，也是國內知識份子憤慨於國事感到極度苦悶失望的時期。這時候，章士釗主辦甲寅雜誌，陳獨秀和他通信，曾說：「自國會解散以來，百政俱廢，失業者盈天下，又復繁刑苛稅，惠及農商，此時全國人民除官吏兵匪偵探之外，無不重足而立，生機立絕，不獨黨人爲然也。國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僕急欲習世界語，爲後日謀生之計。」其後，陳更作「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載於甲寅雜誌，力言國不足愛之理，有謂：「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爲奴，何事可怖！」又謂：「國家國家，吾人誠無之不足憂，有之不爲喜！」可見他對國事是何等的悲觀，乃至唾棄國家亦在可有可無之列。但李大釗則致書章士釗，並不同意陳的觀點，他說：「中國至於今日，誠已頽於絕境，但一息尚存，斷不許吾人以絕望自灰，晚近公民精神之進行，其堅毅足以壯吾人之意氣。人類云爲，固有制於境遇而不可爭者，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參以人爲。故吾人不得自畫於消極之宿命說，以尼精神之奮進，須本自由意志之理，進而努力，發展向上，俾得適於所志。」又說：「吾民今日之責，一面宜自覺近世國家之真意義，而改進其本質，使之確足福民而不損民，民之於國，斯爲甘心之愛，不爲違情之愛。一面宜自覺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謂所逢情勢，絕無可爲，樂利之境，陳於吾前，苟有爲者，當能立致，惟奮其精誠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以上均引自章著甲寅雜誌存稿）這是陳李二人未籌組中共以前的早期言論，從而可知陳是偏於消極的褊激一面；李則屬於積極的奮發一面，兩者顯然是有距離的。

而後來創立中國青年黨的曾慕韓先生，也在那時候的上海救國日報發表一篇「國體與青年」的長文，說明國體動搖，外患緊迫，革命先烈締造國家的艱難，當前國勢的危險，希望愛國青年激發熱忱，大家起來共謀國事的補救。這篇文章後來印成小冊，散播各方，頗予當時徬徨苦悶的智識青年階層以極大的鼓勵，很受到大多數心理上的共鳴。因此，他和李大釗曾於民七冬天共同發起「少年中國學會」，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信條是：「奮鬥、實踐、堅忍、儉樸」八個大字，可惜這個學會雖具有相當濃厚的政治意義，但並不是十分強有力的政治組織。適值其時蘇俄革命成功，無產階級專政，世界革命那一套新奇理論，頓使陳獨秀、李大釗為之嚮往，覺得深合脾胃。他們以為如果中國革命全盤照抄蘇俄的方法，再加上蘇俄有力的支援，也未嘗不可以馬到成功；同時，他們在發刊新青年雜誌鼓吹新文化運動方面，業已掀起青年們追求理想的熱情，如果加以運用組織，未始不可以成爲一枝新生的力量，於是他們就很快的志同道合搭上俄國路線而有社會主義研究會，馬克斯主義研究會之出現，最後蛻變而爲中國共產黨。此在陳獨秀一貫的走其褻激的一路，原不足異，在李大釗則有點主張不定急不暇擇了！

本來，國際共產主義思想毒菌，在政治黑暗專制，經濟貧困落後，人民智識愚闇的國家，以及所謂資本主義侵略下的殖民地地區，是最容易感染播散而潛滋暗長的。不幸民國初期的內外情勢，恰好具備這些條件，而爲蘇俄第三國際所利用的陳獨秀、李大釗之流，又在這方面奮勇當先盡其「觸媒」之責，於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中華民國，自然就擋不住這股毒菌的侵襲。更不幸的，近三十年來對於這些有利於中共發展的條件，在消毒和開刀手術上雖會有若干的努力，但並沒有根本的治療，以致潰爛橫決造成今天的局勢，這是我們所必須認清的第一點。

二、誤敵爲友自食其果

追溯當年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之決定，固然有如鄧澤如所言，出諸中山先生的「乾綱獨斷」；但一般人所知道的，廖仲愷主張親俄容共最積極，魯滄亦最有力。初期的奔走聯絡，差不多出其一手經辦，而其餘他參預此項重大決策的，也不能不負相當的責任。因當時中山先生左右的重要幹部，大都存有一個自我陶醉足以使人迷惘的說法，就是國民黨在同盟會時代即包含有無政府主義份子，並未受到任何侵害，而且深得其助力。那麼，以此爲例，容納共產主義份子，還不是一樣沒有什麼可怕之處！（最重要的自然是藉此可以獲得俄援）這在黃季陸先生對聯合報記者談話的「當年容共一幕」中所提到的汪精衛，即是抱持這種見解而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裏爲容共政策作公開的辯護。其實，不僅慣於投機取巧八面玲瓏的汪精衛是如此的目光短淺，就是素以態度方嚴胸襟狹隘排他性最強著稱的胡漢民，亦復是如此輕率的主張。例如胡在國民黨「試辦改組而代表大會未開以前」，曾有答同志某君的一封信，裏面說到「你說若干由共產黨加入本黨的同志，我們自然是歡迎，你說選舉的時候，他們居然以少數競選勝利，你甚爲不安。我推測你的意思，大約是岐視他們，我以爲不應該的……至現在已經加入本黨的黨員，就要是黨中同志，還有什麼可以岐視的地方？他們以少數人能競選勝利，是他們對於黨的熱心，是他們能奮鬥的結果。難道妒嫉他，可以說他們不對嗎？……你說他們還和共產黨未斷關係，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知道當同盟會的時代，同志李石曾、吳稚暉、褚民誥幾位先生，曾在巴黎入過無政府主義黨嗎？在他人說，或者疑惑這幾位先生已經不做同盟會的黨員，不和我們一起進行革命；誰知到了辛亥革命實現的時候，這幾位先生同我們一樣盡力，而且至今還承認和我們是同志。無政府主義離我們比較共產黨更要遠些，幾位先生和無政府發生關係，尚且不必怕，他們和共產黨不斷關係，又有什麼可怕呢？這個先例，或者你以爲是最少

數的人，幾位先生不是他人所能及，就請再看同盟會時代，三點會，哥老會等會員加入本黨，我們歡迎之下，並不迫他們斷絕原有會黨的關係，也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三點會等祇是反清復明爲宗旨，和同盟會的民族主義相近，也就和共產主義和我們的民生主義相近。我想這個先例，你不能不承認了。我勸你併勸同志拋去彼此歧視的見解，一致向主義進行，努力於主義底下所應有的工作，到了大家一樣的努力，那時就什麼猜疑都沒有了。」（見革命文獻第九輯：胡著「中國國民黨批評之批評」）以他追隨中山先生參預多年密勿而且最受信任之如左右手的重要地位，尚且把共產份子拿來和無政府主義者，三點會，哥老會會員等量齊觀；把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混爲一談，請問這樣膚淺的識見，牽強的判斷，怎麼能匡正中山先生決策的闕失？又怎得不墮入共產黨預佈的圈套？

可是到了十四年六月國民黨實行清黨，胡漢民業已嚐過鮑羅廷及中共陰謀排擠的苦頭，他又闡釋「清黨之意義」，說是：「中國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總算推心置腹，無以復加了。他們給我們的報酬是什麼呢？第一：就是給我們製造了一批非常能幹，又會看風使帆，又會吃西陂（按即C.P.）口沫的左派；第二：又給我們製造了一批五花八門的右派，新右派，新新右派，新軍閥，新官僚，工賊，老朽昏庸，昏庸老朽等等。似乎中國國民黨除了這些就什麼都沒有了。幾年以來，到處聽見人說共產黨把持我們的黨部，破壞我們的基本組織，分裂我們同志的結合，如今看起來，真是一點也沒錯，拿各地清黨以後的情形看起來就知道！怎樣的情形呢？黨部是空虛的，民衆是紛亂的，上下是不相連絡的，這不是共產黨那三種陰謀所造成的結果是什麼？我們眼望着人家一面挖我們的心，一面吸我們的血，一面割我們的手足也不管嗎？管就得清黨！」又說：「可是我們應該知道共產黨全國的黨員，據他們自己報告說，不過八千。何以他以這樣少數的人就能操縱把持我們各地的黨務呢？這就是因爲他們一方面利用中央的威權，當譚平山當組織部長的時候，在各地先立下一個基礎；一方面又利用各地的土豪劣紳勾結一切無賴份子。……這種黨員不要

說三民主義不能了解，恐怕是連三民主義叫什麼還說不出來。本來當初要他們入黨的人，就只是想利用他們來投票，他們也祇想要張黨證來做護身符，或者反正不要本錢，樂得做個人情，他管你三民四民呢。我們要消滅共產黨，非將他這基礎剷除不可，我們要清黨清得乾淨，非將這班無賴份子，土豪劣紳，及一切不知主義為何物的黨員，一概清除出去不可。」又說：「本着我們已往的使命，本着我們一向的精神，我們能容這個破壞本黨，犧牲國家，欺騙農工，背叛主義，只顧爭奪私人權利的中國共產黨嗎？不能的，我們過去的清黨，只是不良份子清出黨外就完了。我們這次的清黨，是進一步把共產的死灰都要送還給俄羅斯，不能讓他遺留在中國的。乾脆的說，這次的清黨，就是要消滅中國共產黨。」（見革命文獻第九輯）從這裏，可以看出他前後言論的歧異，在容共時以為共產黨沒有什麼可怕，勸誡同志與之合作，毋庸歧視和猜疑；到清共時才知道共產黨在對國民黨進行挖心吸血斷肢解體的工作，非把它的死灰送回蘇俄不可。儘管他在絕對相反的兩方面都說得頭頭是道，振振有詞，但中間含有極大矛盾，自相悖謬，是無法掩飾的。請問以這樣的言論思想方針，來指導國人和其同志，怎得不令人大惑不解呢？而尤其荒謬的，是他在國民政府立法院長任內，先後制定「反革命條例」及「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把堅決反共信仰國家主義的中國青年黨人，與共產黨徒視同一律，同樣的科以「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的罪刑，如此的皂白不分，是非不明，又怎得不令人有「自掘坟墓」之感呢？

不過，像上述這種始而贊成容共繼而堅決反共完全出之一人之口的妙論，在革命要人中類似胡漢民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者，頗不乏其人，這裏姑舉一例而已。我們所最感慨的，就是由於當政權軸自始即對共產黨缺乏一貫的正確認識，因而影響到對付共產黨整個措施之舉棋不定，我們且看近三十年來，在公開聲言「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國革命必須接受第三國際指揮」，而與中共携手合作之後，不久便全面清黨，與匪剿共；在與匪剿共迫使其偈促延安一隅之後，忽又繼之以政治解決；在政

治解決聯共抗日之後，使中共得以坐大，敢於武裝叛亂，而國共關係又終告決裂；乃至抗戰勝利之後，大陸淪陷之前的打打談談，談談打打，幾乎都是在患得患失的心理之下，自行鬆懈軍心民氣的大致命傷，以致政治、經濟、外交，無一不是走的錯着，而終於全盤崩潰。此固由於中共的詭計多端，機詐百出，而另一方面，則以爲昔也容共由我獨行其是，今也反共也祇此一家，獨負其責，而決不重視如何團結運用全民的力量，以對付此一有關於整個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因此，就很容易使人發生一種錯覺，認爲這祇是國共之爭罷了，衡諸以往國共關係之時友時敵，時合時分，實用不着過於杞人憂天，弄得大家都忽視了中共笑臉迎人背後所隱藏的毒害，若干起義投降降降歸順之輩，就這樣的如水赴壑，一去不回，而整個大陸，也就這樣唏哩嘩啦糊裡糊塗的斷送掉了！一直到現在，中共還有所謂「國共三度合作」以及「直接和談」的惡毒狂妄企圖，就是仍想沿着這歷史的淵源來淆惑中外視聽的。這是我們所必須認清的第二點。

三、反對容共不受重視

上面所提到的少年中國學會，在當時確是國內一羣毫無依傍有理想有抱負的知識青年，不滿意現狀而又失望於那些已成政黨的一大結合，它所吸收的會員約百餘人，是非常嚴格的。依據他們所訂的宗旨，是要先改造自己，具備真實的學術與修養，再圖改造社會。他們認定個人改造是社會改造的下手方法。社會改造是政治改造的下手方法，而反對舍却個人改造與社會改造去急切的從事政治活動。但其目的在將中國改造成功像少年一樣生氣蓬勃的國家，含有明確的國家觀念與民族精神在內，而非反愛國反國家的，則又甚爲顯然。關於它的發起經過及發展情形，在會裏韓先生遺集日記及左舜生先生近三十年見聞雜記中，均有記述。

可是這個會成立不久，竟因中共之產生，而使大多數會員在主張上漸漸發生重大的歧異，後來遂分裂

爲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兩派，少數會員則有的仍抱不問政治專攻學術的態度，有的就參加了國民黨。到民國十三年，這個會因爲內部分裂，等於無形解散。推測其分裂之端，首先發動於李大釗和曾慕韓先生的進取討論。李主張中國問題爲一世界問題，欲救中國，須先參加世界革命。曾主張世界革命，以國際形勢言，絕不可能，中國須求自強自救，國際主義祇是理想終不可靠，這尙祇是對中國改造觀點不同的爭執，到了國民黨實行改組容共，而反共之青年黨亦已正式創立，於是參加共產黨及青年黨兩方面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便開始分道揚鑣，進而形成實際行動的對立。這時候，青年黨人在上海發刊「醒獅週報」，一面鼓吹國家主義與全民政治，又一面反對共產主義，並揭破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陰謀，以是大爲共產黨所嫉恨。

據陳啓天先生說：「民國十三四年間，共產黨怕我們把他們的陰謀完全揭穿，乃向我們提議會商互相停止攻擊，並勸我們亦加入國民黨。會商地點，爲上海民厚北里一七一九號我們的寓所。參加會商的人，國家主義者爲曾琦（慕韓），左舜生，陳啓天，楊效春；共產黨爲鄧仲夏，惲代英，楊賢江，另外有無黨派方東美等數人。此十餘人，在民國十四年冬某日早晨起，辯爭至深夜。共產黨要我們對他們停止攻擊，我們絕對不肯。我們所持的理由，是①共產黨受蘇俄及第三國際的指揮，不是純粹的中國政黨；②依據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共產主義須在工業發達後的國家始能實行，而中國工業尙未發達，顯然沒有具備實行共產的前提條件；③共產黨只要把人當物看待，而不把人當人看待，不合於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④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陰謀赤化國民黨，違反政黨道德。共產黨對於這些理由，無法反駁，惟有狡辯而已。最後又勸我們加入國民黨，我們答覆說：「我們不能學共產黨一樣不講黨政道德，加入國民黨，去進行陰謀。」原來當民國十二三年間，國民黨實行改組時，少中會內共產份子即曾勸我們加入國民黨，聯合奪取黨權。我們以爲當時國民黨既經聯俄容共，便易起糾紛，不願加入國民黨，到了十四年，自更不願投機取巧了！

他們見我們的態度如此頑強，不為他們的狡辯和詭計所動，遂於深夜不歡而散。當他們離去我們的寓所時，鄧仲夏與我們握別說：「與諸君再相見於疆場！」可見他們恨我們之深。民國十六年，國民黨清黨以後，原屬少中會員的十幾個共產黨多被犧牲，只剩下毛澤東、張聞天等現在還為禍於中國大陸，由此可證我們在中國最早反共，是有先見之明。」（引自陳著：「少中」與中國最早的反共運動一文，載張君勳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從而可知中共茁芽萌芽之初，首先提倡國家主義來對抗共產主義，以曾慕韓先生為第一人，而真正了解中共陰狡詭詐那一套的，以青年黨人認識最清楚，反共亦最徹底，斬釘截鐵，從不拖泥帶水。共產黨想混入青年黨，固無可能，青年黨向共產黨投降靠攏，亦絕對辦不到。這是談中國政黨史者所無可否認的事實。

其次，我們還要特別指出的就是在當時言論界學術界的權威如梁啟超、丁文江先生等，鑒於蘇俄煽惑外蒙獨立（十三年七月）完全是赤色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行爲，曾向國人大聲疾呼的提出警告說：「共產主義也是我們的敵人……其爲害於我們中國的地方，更甚於帝國主義式的敵人，我們防備它比防備帝國主義式的敵人更應該嚴密一點！」「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僅吸取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帝國主義只想愚弄我們的官僚和軍人，蘇俄竟然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歐戰後，帝國主義的國家，還唱尊重我們土地主權的口頭禪，蘇俄竟毫無緣故的佔據了我們的外蒙古。他們的中國朋友還要替他們解釋說應該佔據……」這些警聞的言論，可惜也和國民黨以外反共政黨領袖的忠告一樣的不足以動搖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既定政策。但這種不恤人言一意孤行的結果，對國家民族的損害，未免犧牲得太大了！

假使國民黨當初能稍稍接納反共者的意見而及早毅然改弦易轍，或者在清黨反共以後不再承襲那一套「黨外無黨」「一黨專政」的極權政治理論，洗清共產思想餘毒，一切反其道而行之，對於異己者合乎理

性正軌的言論，不必深閉固拒，視若寇讎，能够從大處着想，多方培育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的生機，而不是窒息它，束縛它，專走褊狹自私的一路。那麼，反對者的一切言論主張：自必受到應有的寬容與尊重，再進而孕育形成一大家多年來所盼望的有方反對黨，相互監督，相互牽制，早日走上民主政治的正軌，相信今天決不致弄成中共席捲大陸而我們偏處海隅這樣的地步，這是我們所必須認清的第三點。

四、迷途知返孤掌難鳴

平情而論，創組中共的陳獨秀和李大劍，多少還帶有書生論政的傳統結習，不似後來以殺人放火打家劫寨而起家的中共國際派以及毛澤東之流的具有濃厚的流氓氣質。中國歷史上無論爲王爲寇，唯有流氓才足以成事。士大夫階級與流氓結合，隨時都有被一脚踢開或白送掉性命的危險。陳、李他們最初對於世界革命及國際共產主義，大抵存有一種天真的幻想，以爲是救中國的唯一靈藥。他們過分相信馬列主義書本上的理論所構成的美麗圖案，遂甘願爲「伸出偉大援助之手」的俄共效其前驅，而沒有摸清楚赤色侵略者及其爪牙們僞裝和善面孔的背後，所隱藏猙獰醜惡的原形。中共口口聲聲喊「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而最初掀起中國這股紅潮的始作俑者——「南陳北李」，以及參預創黨而後來不容於中共的那一羣，幾乎無一不是十足道地的智識份子，說他們是「無產階級」，那真是欺人之談！

李大劍比較死得早。他於十三年出席廣州國民黨一全代會當選中委之後，便回到北方和丁維汾、王法勤、李石曾、石瑛、白雲梯、傅汝霖、恩克巴圖及共產黨人于樹德、于方舟、韓麟符、張國燾等，主持國民黨北京執行部，設機關於翠花胡同，負責指揮監督直、豫、晉、熱、察、綏、甘、新、青、蒙各省地區的黨務，表面上打的國民黨的旗幟，暗地裏却多半替中共幹的邪惡種籽播散工作，而李大劍本人則經常匿在東交民巷蘇俄大使館的兵營內，以爲掩護。當十六年四月五日汪精衛與陳獨秀在上海發表代表國共兩黨

聯合宣言之時，北方若干省份尚爲自稱安國軍總司令的張作霖所統治，張以討伐赤化爲名，正準備搜查蘇俄大使館，惟消息業已走漏，據說是先由洪憲時代籌安會首領楊度，得之於曾任內閣總理及外交總長汪大燮，而後楊據之以告國民黨北京市黨部書記胡鄂公（舊國會議員），由胡轉知李大釗，當時與李一起匿居俄使館的中共黨徒，有聞風逃去者，而李則死守不走，他認爲消息不盡可靠，要走也走不了，一走反去送死，但是有人駭離開的不妨離開（見陶菊隱：六君子傳），頗能表現一種以身殉道的精神，可惜用不得其正，遂於四月六日被捕而在同月二十八日判處絞刑。與他同被處死的共黨份子有譚祖堯、謝伯俞、鄧文輝、鄭培明、莫同榮、李崑、姚彥、張伯章、閻振三、楊景山、范鴻勛、謝承常、路友平、英華、吳平地、陶永立、方百務、張挹蘭（女）、李銀蓮（女）等十九人，其他判處有期徒刑或無罪釋放者尚有四十餘人，並有一俄人奧鈕夫在內。這是在南方國民黨從上海開始清黨（四月十二日）以前北方軍閥反共轟動中外的一大事件，而俄共中共陰謀篡奪國民黨及赤化全中國的許多重要秘密文件，也才由這次俄使館的大搜查而得以完全暴露於世。可是中共出版王明（陳紹禹）的「十三年來的中國共產黨」以及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這兩本「黨史」，却對此都一字不提，大概由於李大釗等這一批「先進同志」屍骨早朽，沒有什麼「剩餘價值」可以利用了吧！

據毛以亨的俄蒙回憶錄說：李大釗未死以前，對俄共已經有着懷疑的預感，曾和親密的友人談起，他深深覺得「循着蘇俄發展之跡，怕要走上沙皇的老路！」此說果確，這正表明一個智識份子誤踏賊船欲罷不能的悲哀心情。何況他所懷疑的，後來畢竟成爲事實，史達林在世時對內兇惡殘暴的鎮壓和對外擴張侵略的野心，還不是沙皇第二嗎？假如李大釗不早死，可能至少要遭遇到與陳獨秀一樣爲中共開除黨籍的命運的。

陳獨秀素來以強項著稱，在他任中共中央委員長及總書記時，對於第三國際派來指導中共的代表，既

不了解中國的現實環境，而又動輒以太上皇自居，驕橫專擅，獨斷獨行，因此他和「蘇聯老大哥們」常常抬槓，發生爭執，最後雖是無可奈何的被強迫接受他們的意見，而終有憤憤不平之感的。據毛著俄蒙回憶錄說，由於雙方意見的常有距離，便往往引起創組中共的那些書生們的憤慨，以為「對於中國情形，難道我們還沒有鮑羅廷，路哀這樣清楚麼？那末，我們真枉為中國人了！」（作者按：路哀為印度人 Roy 之音譯。武漢政府時代，以第三國際代表派駐中國，寧漢合作清黨後回俄，被拘禁五年，嗣回印又被拘禁五年，出獄後轉變，從事反共運動，為印度自由黨領袖。）其不滿於俄共及國際共產黨人之跋扈而決不能終始無間可知。所以陳獨秀一直被指斥為「投降主義者」，「右傾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者」、「取消派」等等罪名，到十六年中共舉行「八七會議」時，便把他從中共中央驅逐出去，使他失去領導的地位，最後且將他牽入俄共黨爭的漩渦，加以「託洛斯基派」的頭銜，而予以開除黨籍。照中共黨史製造家的說法，認為自武漢分共以後，陳獨秀即宣稱：「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因資產階級的勝利而終結，資產階級已經建立了並將鞏固它的統治，中國無產階級應當放棄革命鬥爭，轉入合法運動，以待將來舉行社會主義革命。」甚至提議「取消蘇維埃的口號，而代之以「國民會議」的口號。」但當時第三國際執委會則認為「中國革命現時的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無論從經濟的觀點看，或從反帝國主義民族解放運動的觀點看，或從政權底階級性觀點看，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都尚未完成。」並且指明中共當時的任務「應從事準備新的革命潮流的廣泛的高漲，這種高漲一定在黨的面前提出以組織和實行羣衆的武裝起義為直接的實際的任務。因為只有用武裝起義推翻現有政權底方法，才能解決革命底任務。所以目前整個工作的重心，在於奪取千百萬工農羣衆，在於政治上教育他們，在於把他們組織在黨及其口號（沒收地主土地，八小時工作日，中國底國家統一和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推翻現有政權，工農專政，組織蘇維埃）的周圍。」這是何等毒辣的策略，而陳獨秀不肯這樣幹，便祇有把他一脚踢開去。其實說穿了，

還不是由於他存着「中國人」的觀點，而非純粹俄國的觀點，不肯完全聽從第三國際的命令和指揮之故嗎？後來那些跟着陳獨秀自動脫黨或被開除的一羣書生們之所以不能與中共「同生共死」，這也未嘗不是最大的原因。

即如張國燾脫黨最遲，他在爲龔楚（中共瑞金時代高級將領之一，二十三年共軍突圍西竄時，以不滿中共措施而逃離蘇區）所著「我與紅軍」一書中作序說：「五四運動前後，一部份急進的學者和青年，就開始仰慕俄國革命，傾向社會主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不少青年陸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行列。那些參加中共的青年，實質上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對於馬克斯列寧的學說既無研究，更無所謂信仰。他們對於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理論和實際，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幾乎都是對於中國的積弱和腐敗，懷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他們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個獨立自由富強的中國。當時情形如此，而且三十年來都是如此。……中國一直被專制政權統治着，政治腐敗極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空虛的，外侮紛至，國亡無日。民國以後，此種情況，並未改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無論在理論上和行動上，已經具有急進的特色。然而孫中山先生窮畢生之力，仍未能撼動專制統治的根本，這就使中國這一代的青年更加偏激了。正在這個時候，俄國人來了！中國人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俄國人就告訴中國人如何去反軍閥和反帝國主義侵略，俄國人教育中國人如何組織革命政黨，如何組織工人和農民，如何組織青年和婦女，如何組織軍隊，如何進行地下工作，如何奪取革命政權。這一切的一切，大體上不違反中國革命的需要，尤其適合一般急進青年的口味。可是俄國人並不是爲完全無私的目的而來的。俄國的貨色，既不盡適合中國人的應用，也並非全是有益於人生的。其中鴉片一類的貨色，實在不少。……俄國所需要的是可靠的附庸，並非獨立的中國。因此，它不顧中國的民族的需要，扶持完全蘇聯型的共產黨，蘇維埃型的政權，包括鬥爭、清算和專政等特色，這才使投入蘇聯羅網的愛國青年一點一滴的覺悟過來。」這真能道出一般投

身中共而又脫離中共的個中實情，可見祇要本質上還有幾分人性理性和國家民族觀念的存在，遲早必有大澈大悟衝出羅網的一日！

陳獨秀和張國燾是創組中共的領導人物，他們迷途知返，證明共黨必敗。然陳、張之類，在共黨中有如生龍活虎，但他們知返以後，一則時間上固已嫌遲，二則一切反共勢力未能予以支持，或者沒有充分加以利用，他們孤軍奮鬥，其結果，未能發生大的影響。我們且看中共統治大陸已有八年，那些具有多年黨齡歷史的共幹和附共民主黨派人士在「鳴放運動」中所發表的爆炸性的言論，就可證明智識份子之澈底覺悟，雖可以受到一時的暴力壓抑，將來必然能與各地抗暴運動匯合成為一偉大無比的反共力量，一發而不可遏止。問題是在我們如何迅速作有效的「政治反攻」和實際的支援策應，而不是以幸災樂禍的心情，空喊口號，坐觀成敗，任其在「整風」「圍剿」「清算」「下放」之中，自生自滅，這是我們所必須認清的第四點。

五、思想中毒未能根治

今天大陸上所謂「人民民主專政」的赤色漢奸政權，實際上一切都由蘇俄牽着鼻子走路，亦步亦趨，唯命是聽。他們為什麼會如此汨沒本性，全無心肝，一味歌頌，阿諛無恥，甘願出賣祖國為蘇俄誓死效忠呢？這固由於奴才久受主子豢養的一種劣根性有以使然，而更重要的是蘇俄利用落後國家知識分子的政治熱情或野心，以及思想幼稚或偏見，在政治上精神上長期訓練操縱控制之結果。這也還有一段具體的訓練措施，值得敘述：

遠在中共成立之前，蘇俄既設有一國際性質的「東方勞動共產主義大學」——一名史達林大學（簡稱東大），內中招收的學生很複雜，有波斯、南美、高加索、阿富汗、土耳其、印度人；也有日本、中國、

朝鮮、蒙古人；並且專設有中國班，如瞿秋白、彭述之、張國燾，都是該校畢業生。據傳現在自由中國爲三民主義理論權威，而仍根據馬克斯主義來批評民主自由之某先生，亦在該校畢業者。及至中共成立混入國民黨以後，蘇俄又在莫斯科設立一個專收中國男女學生的「中國勞動大學」——一名孫逸仙大學（簡稱孫大）；其他如軍事上的基輔砲兵專門學校，步兵專門學校，高等射擊學校，伏龍塞陸軍參謀大學；政治上的列寧學院，馬克斯恩格斯學院，以及列寧格勒的軍事政治研究院，也都招收中國學生，惟人數不及「東大」「孫大」之多。此在蘇俄原爲有計劃的製造和推廣「邪惡的種籽」以從事於世界革命，而獨特別垂青於中國，就可知其處心積慮用意之深了！

大概在民國十四五年國共合作期間，所謂革命青年多以向蘇俄留學爲最時髦，極盛時留俄男女學生會達千人以上。這些人，一部份由中共自己秘密輸送或是從留法勤工儉學生中跑去的，後來多半成爲中共國際派的中堅，他們的良心和靈魂，業已被蘇俄全部收買，一舉一動都得接受第三國際的命令和俄共的指揮，並且倚恃蘇俄爲靠山，進而操持中共中央的領導權，永遠甘爲巨虜，可能至死靡他。雖然也未嘗沒有極少數轉向反共的一面，但大體上俄共運用這批赤色奴才殘害自己同胞奉獻自己國家淪爲蘇俄附庸的策略是獲致絕大成功的。

另一部份留俄學生，是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時期從廣東黨政機關及黃埔軍校中公開考選或是由各地黨部特別保送去的（到十六年七月，國民黨才通令各機關不得再送學生前往）。據說當初原是共產黨及共產主義青年團與國民黨各佔半數，到後來剩下的純粹國民黨，僅及十分之二。想不到經過蘇俄一番加工製造，竟回過頭來打自己。即如十六年春第三國際派一代表團到中國指導革命，由孫逸仙大學選派優秀學生四十名回國工作，代表團團長爲前述之印度人路哀，中國代表爲譚平山，四十名學生中，僅有三名是國民黨，其餘均爲共產黨。由此可見這中間雖然有的仍能保持國民黨的立場，始終不爲所惑，但畢竟是少數；

而有的原來本是跨黨份子，表面是國民黨而實際是共產貨色，到蘇俄去受「革命」洗禮，自更取得進一步的緊密聯繫；有的雖是國民黨而信念不堅，趨新驚奇，禁不起種種逼誘，遂走入歧途；有的在國內連中學尚未畢業，智識甚為簡單，思想上本是一張白紙，有的年齡不過十六七歲，可說天真瀾漫，自然就很容易先入為主的接受赤色理論的灌輸而成為共產黨，後來回國也有由於愛國的天性，以及看穿俄國的陰謀或其他原因一變而轉向反共陣營，有的多能徹底了解共產主義之罪惡，決心為反共奮鬥，有的因為一度受過共產毒藥的傳染，其反共理念乃至反共方法，仍然是從俄共那裏抄襲得來一點斷簡殘編，改頭換面而已，他們也許認為非如是不能反共，不知以共黨方法反共，事實上祇有大巫小巫之分，決嚇唬不了共產黨的。

大概凡是經過俄式訓練洗禮而後又轉向反共一面的有兩種情形：那意志堅強的，有智慧的，經過實際體驗或好學深思，乃能大澈大悟，不但根本擺脫桎梏，而且能從人性自由觀點，深知反共必根本反其道而行之。否則的話，難免拖泥帶水，猶如曾經吸食過鴉片毒品的癮君子，儘管口稱戒絕，仍隨時有舊癮復發或覓取代替品過癮的可能。譬如，俄式蘇維埃政制與戰前德意納粹法西斯政制，本是一對孿生兄弟。同一出於極權思想的根源。當慕沙里尼，希特勒叱咤風雲睥睨不可一世的時候，也正是我們厲行一黨訓政的時期，一面努力清剿共產極權的毒菌，方以遭遇頑強的抵抗為苦，一面亟圖倣效德意極權的政制，以為是阻遏乃至消滅共黨的最好武器，殊不知以同一肢體的右手來打擊左手，怎能發生效力？結果徒然造成左右兩極權政治思想的大合流，使若干職業革命家們由左向右，並得藉「右」之名，行「左」之實，而有左右逢源之樂。這樣一來，我們的反共變質了！我們的政治方向迷失了！也跟着攻擊民主自由是過時的，落伍的，往另外一個牛角尖裏鑽，鑽到慕，希二魔兵敗身死之後，事實證明法西斯納粹那一套也是照樣的有毒，才絕口不談，但多多少少還是有人不勝其戀戀之情的。

關於俄、德、意極權理論的一脈相傳，以及共同仇視民主自由制度為彼此相通之處，最好以陳獨秀「

搞通思想」以後的說法來做證明。他在未死以前（按陳於二十一年十月與彭述之同時被捕，二十三年七月以危害民國罪最後確定判處有期徒刑八年，二十六年八月出獄，三十一年五月病逝四川），曾明白宣告他「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並且發表他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包括論文和書信），他指出「民主政治真實的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都是大眾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鬥爭七百餘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這正是俄、德、意所要推翻的。」因為他認定「蘇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師」，故將其歸納為「俄德意的法西斯制」一類，他還特別指出這個法西斯制之所以與英美法的民主制有很大的區別，主要的就是由於前者是「①蘇維埃或國會選舉均由政府黨指定，開會時只有舉手，沒有爭辯；②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殺人；③一國一黨不容許別黨存在；④思想言論出版絕對不自由；⑤絕對不許罷工，罷工即是犯罪。」而後者則完全是。他並且指斥地說：「英美民主國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在那裏，在野黨、工會、罷工之存在，是現貨而非支票，除了納粹第五縱隊的爪牙，是不能用任何詭辯來否認的。：希特勒的納粹黨徒，則企圖以統治德國的野蠻黑暗的辦法統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許有牠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不容任何異己之存在。：希特勒黨徒之勝利，將使全人類窒息，將使全人類由有思想腦神經有自由意志的人，變為無思想腦神經無自由意志的牛馬機械。」另外又說到他「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所得到的結論是：「無產階級民主的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無產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劑，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

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麼社會主義。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祇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以上均引自「陳獨秀的最後見解」）

這是中共最初創始人所提出最後的根本意見，值得我們千萬珍視。此決不可「以人廢言」或以「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來看。因他對共產主義理解之深切，早已預言共產主義之必然發展。祇要看看今天大陸上的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幾乎是集所有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之大成，直到「人民公社」而極端化，其為「史達林式的官僚政權」的翻版，應無可否認的。其次，陳獨秀以中共之創始人而徹底反共，不僅象徵共產黨人，除少數冥頑不靈之徒外，都將走到陳獨秀最後見解之路上去，這將是中共的最後命運。更重要的，是陳獨秀認為民主主義才是共產主義消毒劑。假如陳獨秀這樣的「中共之父」尚且認為要以民主主義反共，則一切反共的人，應體會這一點警肅意義。當陳獨秀說此言之日，乃是一個無求於世的垂死之人，他一定以此為最後贖罪救國之赤忱來說這些話的。如果反共的人無接受誠意，他真死不瞑目了！所可惜者，若干反共的人，其根本覺悟，却趕不上這一最初的共黨領袖的最後見解。也更沒有能夠及早認清「俄德意的法西斯制」左右兩方面的思想毒菌，及早抵禦其侵襲，而不為其所惑，以致我們沒有用正當有效方法，亦即民主主義的原則來反共，才使反共救國之大業徒勞無功。否則，近三十餘年來的反共，就決不會有如揚湯止沸，沸愈甚而無濟於事，也更不會讓中共這個妖魔鬼怪得以猖獗於今日之大陸了！這是我們所必須認清的第五點。

十五、反共抗俄之道

然則反共抗俄之道如何呢？說簡明一點，即是要能夠做到事事與之完全相反，至少也得就若干觀念上

作風上先來個一百八十度的改變，然後「反」才有「效」，「抗」才有「力」。最近胡秋原先生曾經具體的指出一些必須改變的，是「民國十三年後由布爾塞維克，法西斯，納粹傳染來的許多不良觀念、術語、口號、作風。例如置黨於國之上，「民主集權」，「鐵的紀律」，「黨的細胞」這一套東西；「計劃經濟」，「統制經濟」，「五年計劃」這一套東西；思想統制，以及將政治上人物理論加以神權化教條化這一套東西；人與人間缺乏忠信，篤敬，道義與人格尊嚴的控制排擠，不必要的檢查，自清這一套東西；到處貼標語，口號，以及使用共黨許多肉麻名詞，如「反映」、「看齊」這一套東西；這都是不祥的陳腐的東西。又即使是不是共黨專利，却為他們偏愛的東西，如開會，如「革命」，如「鬥爭」，如「辯證法」一類名詞，亦總以盡量節約為佳。我們不僅要在實體上反共抗俄，尤要在精神上反共抗俄。反者抗者，即事與其相反，而反必須從根反全面反，例如，要反對馬列教條，決不是將孫中山主義變為教條，與其爭一日短長；而是根本肯定自由討論之權利，肯定教育獨立及學術自由之尊嚴。除憲法未經修改前不可反對外，沒有什麼不可以批評。孔聖人既可批評，孫中山先生的學說當然不是不可批評的。……」（引自四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自由人載胡著「復國希望的條件和限制」一文）這頗能針對着當前的政治畸形病態，作者甚具同感！因為要「解放大陸同胞」，我們就必須從束縛人性思想自由的枷鎖中，先行解放自己；要「打倒蘇俄帝國主義」，我們就得要先將俄國發明的那些有毒有害的東西，毫不吝惜的丟到毛廁裏去，如果還是視同珍寶，偏愛不放，那就不知道我們所要「反」的是什麼，所要「抗」的又是什麼了！

同時，胡氏又指出「今日大陸人民反共愈烈，即表示他們對自由民主要求愈高。他們不能容忍，敢於反抗共黨之暴政貪污和思想統制，便決不會容忍稍有失乎仁愛、廉潔、開明的政治傾向。他們反抗共黨的一黨政治，便不會再接受任何一黨政治。他們反抗馬列教條，便不會歡迎任何其他教條。」（引同前）這個看法是非常正確的。真正有效的反共抗俄之道，也就必須先從此處加以體認，才能把握住主要關鍵。可

是自從大陸淪陷之後，「革命民主」之說甚爲流行，認爲過去一黨訓政時期所沒有搞得通的，辦得到的，是一切失敗之根，今天必得重新搬演，從頭做起；而最有力的說法，就是將來回大陸，遷得需要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長期革命。照目前情形看，這個方向雖未正式確定，似乎很佔優勢。不過果能由此種方式而順利的回到大陸，並且一定可以受到大陸人民的歡迎，那真是天大的奇蹟！由於作者除了回到大陸以外，此生亦無其他奢望。現在，國家安危責任，仍在國民黨手中，作者雖爲青年黨員，深知必須國民黨抗俄有力，反共有效，我才有回大陸希望，因此，不敢不附於錚友之末，誠懇希望這一方向還應該重新考慮。

四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寫成

四十七年十二月廿八日修改

附錄

一、黃季陸先生：談當年容共一幕

（原載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台北聯合報）

總統於其新著「蘇俄在中國」一書第二十六頁第八節中曾述及「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容共情形，謂在大會中黃季陸等提議在黨章中加一條文，規定「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李大釗乃代表本黨內的共黨份子，提出「申明書」，陳述他們「加入本黨的理由」等情。

記者獲悉，黃季陸先生曾於前昨二日分在教育部和行政院動員月會中，對於其在當日會議中反對容共的經過，作簡要的報告，以印證總統之真知遠見。

黃氏說：我原在美國讀書，後來到加拿大主編興華日報，所以民國十二年元月間我是以加拿大區國民黨代表身份回國與會的，那天抵達廣州很晚，總理正在寓所同中央委員們在開會，聽見我們到達，便通知前往參加，並讓我報告美國黨務情形。散會後總理留我們談話，在談話中他表示，「目前革命工作情緒低落，需要新血刺激，所以這次黨中吸收了更多的智識青年共同從事革命工作。」當時我以為所謂新血是從五四運動中出來的一批青年學生。可是當總理告訴我是指共產黨員時，簡直使我大吃一驚，我立即表示反對。那時共產黨在中國尚無昭彰的劣跡，我之所以反對完全是基於思想上的分歧不同。總理告訴我他為什麼要容納共產黨參加到國民黨來，第一，蘇俄革命之後，對於中國侵略的威脅大見減少，同時他們需要人來同情支援他們國內的革命；第二，共產黨的那一套東西根本不適合在中國實施，中國共產黨無所發揮，

不如吸收到本黨來，共同爲革命工作。

總理和藹可親我們知無不言

那時我只有二十四歲，少年氣盛，而且總理對我們藹然可親，我們同他談話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所以我便力言容許共產黨員及跨黨之害。我舉出美國大西洋月刊所報導的一樁事實爲例，那報導中是敘述共產黨滲透進一個名爲「美國農民黨」內把持操縱的事情經過原委，我從那件事實中便對共產黨的作風和思想感到深惡痛絕，但是總理並不確信共產黨有如此惡劣，他說國民黨人多，共產黨人少，不會發生作用。我立即表示國共兩黨如砂與石之不能混合，共產黨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雖然他一時不能操縱把持我們整個的黨，但是他們挑撥離間，分化中傷，將使本黨永陷入混亂艱苦之中。反覆陳明利害，總理最後聞言默不作語。我以爲總理或爲我言所動。歸寓之後，乃奔走同志之間，力勸反對容共，林森、謝持、鄧澤如、方瑞麟等十餘同志都贊成我的意思，我們曾數度在廣州太平沙一個住宅中開會，並且作了一個決議案，但是都無人願意署名提出，若干老黨員顧慮太多，雖表反對，但是不願出名，我幾次奮勇表示願意出名，可是他們又認爲資望不夠，結果大會於元月二十日開幕，到了二十八日這個案子還因爲無人出頭沒有提出來。

我們提出建議不能一身兩黨

二十八日上午，大會的議程是「總章審查委員會報告」，胡漢民主席，汪精衛以委員會召集人資格提出報告，我們看見這是一個機會，便放棄提出決議案的原意，等汪精衛報告完了之後，方瑞麟便起立發言，建議在總章第一第二條之後增加一項條文：「本黨黨員不得加入其他政黨」。此案一提，附議之聲四起

。共產黨約李大釗馬上要求發言，他是早有準備的，他說：「我原是第三國際共產黨黨員，現在偕同中國共產黨員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參加國民黨的革命事業，完全是個人行爲。」他的話可以參考「蘇俄在中國」書中第二十七頁。說來感情豐富聲淚俱下，說完之後，並且把早已印好了一份聲明當場散發給各位代表，全場似已全爲李大釗的話所動。

汪精衛最奸滑竟替共黨辯護

接着葉楚傖先生發言，對於兩案並無強烈之支持與發言。汪精衛再度登台發言情形就不同了，他的一番話談來心平氣和娓娓動人，真是得了「態度誠懇，措辭委婉，罵人不傷心」的真傳。他大意是說：「從前吳稚暉、李石曾、張溥泉諸位先生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却承認他們是國民黨員，並且承認他們德高望重是本黨的骨幹。爲什麼今天要不許共產黨加入本黨來而革命而奮鬥呢？這不是我們前後的主張不一致嗎？」他又說：「或許有民族主義者不贊成民生主義或民權主義，豈有主張民生主義的不贊成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也沒有贊成民生主義不贊成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之理。所以依兄弟的看法，我們的黨章上既已有專條規定本黨的紀律，我們只應拿紀律來量度黨員的行動，合於本黨紀律的便承認他是黨員，不合於紀律的便予以制裁，有了這一武器，跨黨不跨黨的問題便勿須重視。而且我們對於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既然經過一番慎重考慮，今天似乎不宜另有變動，再者說，共產黨是一個國際組織，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不能分，我們容許共產黨員參加黨內共同奮鬥，不但不應反對，而且還應該熱烈的表示歡迎才對！」汪精衛講完之後，沒有一人起立發言，更沒有人表示反對，我環顧四週，知道事已無可挽回，但是話不能不講，我便要求發言。

大勢雖難挽回還是據理力陳

我說，「共黨份子既是爲擁護三民主義加入本黨，爲什麼還要保持他們原有的組織？一個黨中有雙重黨籍存在不是黨內有黨是什麼？他們雖然心中無他，可是一旦將來共產黨的紀律和國民黨的利害有所衝突的時候，他們又將如何選擇？遵守共產黨的紀律，就是違背了國民黨；若是服從國民黨的黨章，就是對共產黨不忠。這種情形如不加防止，是必然造成未來革命陣營中的混亂。」我繼之說：「退一萬步來說，就是容許帶有共產黨籍的共產黨員來入我們的黨，難道我們不能制裁本黨原有的黨員不得加入他的政黨嗎？因此我主張修正方瑞麟同志的提議爲「本黨所有的黨員只能有一重黨籍，不得加入其他政黨」。我的話說完，廖仲愷和胡漢民先生曾發言反對我的修正案。

三十九號發言他就是毛澤東

胡先生講完之後，忽然有一個湖南口音的人在後面大聲喊叫報號發言：「主席，主席，三十九號發言。本席主張本案停止討論，即刻付表決！」我回過頭去仔細打量這個粗魯無禮的發言人，只見他穿一件長棉袍，身材中等，面皮發青，態度倔強，一般蠻勁，像一個才到城裏的鄉下人，一點沒有君子之風，不像是個能登大雅之堂的人。我後來查知姓名，才知道他叫毛澤東。

最後主席交付表決「贊成本黨黨員不得加入其他政黨，不必用明文規定，僅照黨章申明紀律者，請舉手！」大多數人舉手，於是就這樣通過了。致使中共第一次笑臉出售成功，直到十六年四月清黨才收斂了他的笑臉。

記者按：總統於「蘇俄在中國」書中提到黃季陸先生這段故事，不過語文簡略，黃氏於上述兩個講演中把這段故事補充說明一番，他說：「我們不能以今日的感情來衡量當時的是非，當時共產黨在中國還是一張白紙，我只是在思想上覺得不能與它相合，故才力斥其妄而已！」黃氏並表示他將要根據總統新著

，來寫一本補充的東西，暫時定名叫「未了的戰爭」，敘述國民黨員與共黨艱苦奮鬥的種種史實。

二、羅家倫先生：談「邪惡的種籽」

（原載四十六年七月三日台北聯合報）

總統在其新著「蘇俄在中國」一書中第十五頁第四節，會提到共產國際來到中國組織中國支部之中國共產黨的事情。據新任國史館長羅家倫先生的記憶，在五四運動時中國根本沒有共產黨一詞，以後一兩年中才傳入中國。他記得最初共產國際派了一個人到中國來組織共產黨，來了好久得不到要領，那人希望從輿論入手，便去同許多雜誌和報紙打交道，但是都無結果，最後這人到了上海忽然發現一本刊物名叫「解放與改造」，覺得這名稱很合他們的口味，便前去連絡，那裏知道這個刊物是張君勱、張東蓀等人辦的，這些人是「吉爾德社會主義」信徒，根本同共產黨格格不入，這人著着實實碰了一鼻子灰。羅先生記不起這個人的姓名，他只記得當時有這麼一段事情。

所謂「新青年」

後文共產國際東方部長胡定斯基到中國才找到李大釗、陳獨秀這羣人。至於先前所說的那個碰了張東蓀的釘子的人是不是就是胡定斯基，羅先生却記不清楚？因為羅先生那時不在國內，正在國外深造。羅先生說，其實那時候一般所謂新青年們，一腦袋什麼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大堆主義，誰也鬧不清楚。尤其是馬克思的資本論，本來那本德文就已經很難令人索解了，等到譯成英文更是不容易看懂其中真意，所以當時沒有幾個人真對馬克思的那套玩意澈底了解。這時在日本却有一個名叫「河上肇」的

，他著了三大本書來註釋馬克思的資本論，李大劍他們都是從這部書中略得皮毛。

掛學校招牌

到了民國十年間，李大劍他們在上海辦了一個外國語文補習學校，另外成立了一個什麼研究會，這個研究會的名字羅先生記不清楚是叫馬克斯主義研究會，還是社會主義研究會了。這兩個組織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最原始的兩個組織。羅先生說，那所外國語文學校事實上其中全是俄文，他們設校招生不久，就舉行了一次會議，那時他們的組織設在上海法租界，開會的消息不知怎麼讓法租界巡捕房知道了，派了巡捕去抓他們，結果全體都跑掉了。一跑就跑到嘉興的南湖，在那兒他們在李漢俊的家中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會議。那個時期毛澤東還數不上，初期有名的共產黨員除去李大劍、陳獨秀等人以外，尚有劉仁靜、施存統、李漢俊、黃日葵、張國燾、瞿秋白、惲代英等人，後來作漢奸的周佛海也是那時的共產黨員。據說，總理當時選讓鄒海濱先生去參加他們組織一探真情實況呢。

馬林這個人

那個時候莫斯科便正式派馬林來，羅先生說，馬林是化名，他本名叫斯尼夫里葉，是個荷蘭籍的共產黨員，莫斯科原來派他在印尼一帶作共產活動的，後來調派到中國來，是個著名的陰謀策劃者。羅先生因之在這兒附帶指出「蘇俄在中國」第十五頁第六行有一個字排錯了，就是括弧中兩個英文字中間「又名」兩個中文字，應該是一「本名」兩個字。因為馬林根本是假名字。

魯迅的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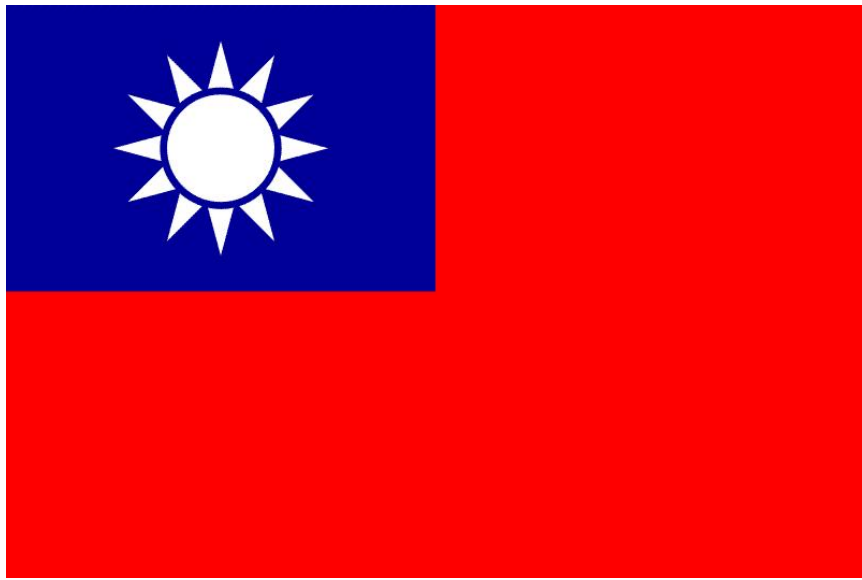
附錄：羅家倫先生：談邪惡的種籽

羅先生指出那時共產黨便施展出宣傳欺騙威脅利誘種種卑劣的手段來引誘青年們了，羅先生說，他們對於魯迅便是先剿後撫有計劃的圈套，「我同魯迅很熟。」羅先生說：「他那裏是共產黨呢！而且根本反對，共產黨是最初連絡他，他不理，共產黨便羣起而攻之，每天撰文把魯迅罵得一文不值，結果魯迅著的書一本也賣不出去，生活漸陷困境，於是共產黨又派人去招撫，用種種甜言密語去說動他。結果魯迅真的加入了他們的陣營，他們也就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灣，又大捧魯迅。雖然魯迅的書後來暢銷一時，可是版稅全受他們的控制，魯迅每月只能拿到二百元的生活費而已，所以後來魯迅鬱鬱以終。」羅先生又舉出魯迅前後期的作品，以證明魯迅的轉變，完全是受了共匪的圍攻壓力。

最後羅先生說，要真正的認識共產黨本來面目，那麼它的那些千變萬化的伎倆便無從使用了。

按上項談話發表後之次日，該報又作下列之更正：

昨日本報所刊「邪惡的種籽」專訪稿，據羅家倫先生來函說明，其中有兩點出入請爲更正：①當時解放與改造」雜誌的主持人張君勳和張東蓀兩先生，張東蓀先生當時頗提倡基爾特社會主義，但不能說是信徒；張君勳先生對於這派社會主義，據羅家倫先生記憶所及，很少論著，故不能說這些人是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信徒。②文中「據說總理當時還讓鄒海濱先生去參加他們組織一探真情實况呢」一句，是記錯了，羅家倫先生說他沒有提到鄒海濱先生的名字。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